**崇尚英雄模范 弘扬英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精忠爱国、勇敢担当、忘我奉献、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如一座座丰碑、一座座灯塔，记录着党走过的历史，照亮着党前进的道路。2021年5月初，中央媒体集中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专栏，讲述百年来100位重要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大力宣传英雄模范的使命担当、牺牲奉献和崇高品格，我们要从这些党史英雄模范身上不断汲取精神力量，强化示范引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学习英雄模范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赓续精神血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英雄模范是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重要缔造者和承载者。从“抗日英雄”杨靖宇到狼牙山五壮士，从“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到放弃国外优渥条件、毅然回国投身科研事业的新中国科学家们，从“牺牲我小，成功我大”的革命烈士杨开慧到用32年的无怨坚守诠释爱国情怀的守岛卫士王继才。无数英雄模范用炽热的报国志和爱国情谱写了中华民族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爱国精神作为凝心聚力的兴国、强国之魂，早已成为流淌在中华儿女精神血脉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不断激励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学习英雄模范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涵养初心使命。从古至今，英雄模范之所以成为榜样，总是与他们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密不可分。以李大钊、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为了救中国倾注了大量心血，一生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用生命践行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雷锋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克己奉公、舍己为人，用行动铸就了雷锋精神的核心和精髓；老党员张富清在革命战争时期英勇战敌，两获“战斗英雄”称号，新中国成立后又主动选择到祖国偏远地区工作，用奉献书写了初心与使命。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无怨无悔、为党和人民牺牲奉献的大爱情操和以身许国、人民至上的高尚品质。

学习英雄模范心中有责的担当精神，构筑民族脊梁。“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是无数英雄模范心中常怀有的责任和使命，这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构筑起了民族坚硬的脊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有一群被称为“最美逆行者”的凡人英雄，他们冲锋陷阵、担当有为；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有不忘初心、勇担扶贫大任，奋斗在脱贫战场，把最美的韶华留给大山的驻村书记黄文秀；有成就学生、擎起教育大旗，改变山区女童命运的“燃灯校长”张桂梅；有使命在心、担起军人责任，在边境扫雷中英勇负伤，失去双手双眼的排雷英雄杜富国。他们讲忠诚、重担当、肯尽责，用这份责任和担当为社会、为人民燃起了希望之光。

学习英雄模范勤勉尽责的敬业精神，汇聚前进力量。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离不开平凡工作岗位上忘我敬业的先进模范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誓言“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用自己身体当油井搅拌器的“铁人”王进喜；倡导男女同工同酬，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带领全村脱贫致富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不断求索、刻苦钻研、几十年如一日立足岗位敬业奉献，被称为“科研疯子”“拼命黄郎”的黄大年。他们将自己的热情洒向平凡的基层岗位，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勤勉尽责的敬业精神。，敬业精神不仅是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的优良美德，更是衡量高素质人才的价值准则，在经过历史的洗礼后，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基因，外化为中华儿女的行为指南。当每个人都能在平凡岗位上脚踏实地、勤恳尽责地工作时，敬业精神定会汇聚成一种无形的磅礴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勇往直前。

学习英雄模范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实现复兴梦想。“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百年党史中涌现出的无数英雄模范，都是怀揣远大志向，拥有百折不挠、拼搏奋斗精神的先锋人物。“最美奋斗者”焦裕禄，怀着“誓死要把沙丘治好”的坚定决心，身患疾病仍身体力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境界和情怀；“两弹元勋”邓稼先，不畏艰险，经过多达32次核试验，筑起了我国核力量的坚实盾牌；以杨利伟、景海鹏为代表的航天人，发扬载人航天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需要更多的奋斗者付出更为艰苦卓绝的努力，以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跑好民族复兴的接力赛，在实现中国梦的追梦路上再创佳绩。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模是时代精神的标杆，是普罗大众的榜样，是社会价值的引领。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目 录**

# **马本斋：卓越的抗日民族英雄……………………………………………………**

# **方志敏：坚定信仰铸就的英雄…………………………………………………**

# **毛泽民：中国金融史上的革命先锋……………………………………………**

# **王尔琢 ：立誓以身许国的“美髯公”…………………………………………**

# **王尽美：尽善尽美唯解放…………………………………………………………**

# **邓中夏：从富家子弟到人民公仆………………………………………………**

# **邓恩铭：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 **韦拔群：壮族人民的忠实儿子……………………………………………………**

# **叶挺：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

# **左权：“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 **刘志丹：“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 **吉鸿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 **向警予：不做“大小姐”，要做“革命人”……………………………………**

# **江竹筠：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

# **何叔衡：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青……………………………………**

# **张太雷：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 **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 **李大钊：中国革命的“播火者”………………………………………………**

# **杨开慧：“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 **杨靖宇：白山黑水铸忠魂…………………………………………………………**

# **苏兆征：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 **陈延年：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

# **陈潭秋：血沃天山的“一大代表”………………………………………………**

# **冼星海：“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

# **周文雍、陈铁军夫妇：爱情在战火中永生………………………………………**

# **罗炳辉：戎马倥偬滇之雄…………………………………………………………**

# **恽代英：进步青年革命征程的“明灯”…………………………………………**

# **赵一曼：不负巾帼志 热血沃中华………………………………………………**

# **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 **钱壮飞：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传奇……………………………………………**

# **黄公略：且缚苍龙征腐恶，但酬少时留侯志……………………………………**

# **彭湃：从地主少爷到“农民运动大王”…………………………………………**

# **彭雪枫：抗战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 **董存瑞：“为了新中国，冲啊！”………………………………………………**

# **董振堂：“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

#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

# **瞿秋白：“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 **刘老庄连：抗战烽火中的英雄连队………………………………………………**

# **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

# **马海德：在中国救死扶伤的美国医生……………………………………………**

# **毛岸英：领袖之子，普通一兵……………………………………………………**

# **王杰：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

# **王进喜：用生命践行誓言…………………………………………………………**

# **甘祖昌、龚全珍：并蒂莲花初心红………………………………………………**

# **申纪兰：处处以身作则 事事为了人民…………………………………………**

#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笔耕不辍 见证中国……………………………………**

#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

# **时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 **麦贤得：钢铁战士钢铁人生………………………………………………………**

# **孟泰：一座永远矗立在职工心中的雕像…………………………………………**

1. **茅以升：用一生奋斗，构筑共和国的坚韧之桥…………………………………**

# **容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

# **屠呦呦：青青蒿草 拳拳报国……………………………………………………**

# **常香玉：戏比天大 忠心报国……………………………………………………**

# **黄继光：舍身忘我 英勇无畏……………………………………………………**

# **焦裕禄：人民的好公仆…………………………………………………………**

# **雷锋：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 **“两弹一星”先进群体：精神之光 永不熄灭……………………………………**

# **“南京路上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

# **孔繁森：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

# **王伟：中国海空卫士………………………………………………………………**

# **王瑛：永远的巴山红叶…………………………………………………………**

# **包起帆：扬起创新的征帆…………………………………………………………**

# **叶欣：身先士卒的白衣战士………………………………………………………**

# **任长霞：一抹闪耀星河的绚丽彩霞………………………………………………**

# **许振超：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

# **许海峰：零的突破 为国争光……………………………………………………**

# **李向群：新时期英雄战士的生命凯歌…………………………………………**

# **70.杨业功：“导弹司令”的清风亮节……………………………………………**

# **71.苏宁：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

# **72.林俊德：永远盛开在罗布泊的“马兰花”…………………………………………**

# **73.杰桑·索南达杰：用生命守护可可西里…………………………………………**

# **74.胡福明：追求真理的思索者……………………………………………………**

# **75.袁庚：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

# **76.谢高华：勇于担当敢为先…………………………………………………………**

# **77.路遥：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 ……………………………………………………**

# **78.“863”计划倡导者：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

# **79.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 **80.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群体：为国出征叩苍穹………………………………**

# **81.毛相林：敢向绝壁要“天路”……………………………………………………**

# **82.王继才、王仕花：夫妻哨所 守卫海疆…………………………………………**

# **83.艾热提·马木提：用生命守护一方安宁…………………………………………**

# **84.张超：为祖国奋飞………………………………………………………………**

# **85.张桂梅：红土高原一枝梅…………………………………………………………**

# **86.张富清：深藏功名，初心不改……………………………………………………**

# **87.李保国——太行山上新“愚公”………………………………………………**

# **88.杜富国：一个英雄的“三十而立”………………………………………………**

# **89.邹碧华：司法改革燃灯者…………………………………………………………**

# **90.卓嘎、央宗：神圣国土的守护者…………………………………………………**

# **91.钟扬：一颗追梦的“种子”…………………………………………………………**

# **92.钟南山：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

# **93.黄大年：点亮爱国奋斗精神航标…………………………………………………**

# **94.黄文秀：以秀美人生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 **95.廖俊波：苦干实干 造福一方……………………………………………………**

# **96.樊锦诗：一生只为一事来…………………………………………………………**

# **97.中船重T载人深潜英雄群体：胸怀祖国 心向大海………………………………**

# **98.“硬骨头连”：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硬骨头精神”…………………………**

# **99.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英雄群体：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 **100.航天科技团队同心共圆飞天梦………………………………………………**

# **马本斋：卓越的抗日民族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回民支队驰骋于华北平原英勇杀敌，屡建奇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这支回民支队的创建者，名叫马本斋。[](https://news.cau.edu.cn/picture/0/42def793885744cea8b086076ebcc6f4.jpg)

1902年，马本斋出生于河北献县东辛庄一个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他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身为军人的马本斋。深感空怀壮志、报国无门的马本斋，毅然辞官，解甲归田。1937年，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军侵占了马本斋的家乡献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马本斋遂组织本村青壮年举起回民抗日义勇队的大旗，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马本斋率队参加八路军，将回民抗日义勇队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就在这一年的10月，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在马本斋的带领下，改编后的回民支队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仅在1940年2月到1941年1月近一年的时间里，回民支队即连续作战30余次，打开了深南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冀中军区为回民支队颁发锦旗，表彰他们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主席也亲笔题字，称赞马本斋带领着一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在这些辉煌的战果中，又属回民支队在康庄和保定两地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1940年2月初，回民支队奉命赴深南开展斗争。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马本斋精心策划了一场“引蛇出洞，围点打援”的经典战斗。5月29日深夜，马本斋与政委率主力埋伏在康庄附近，拂晓时派兵佯攻安家村据点。待据点敌人通过电话向衡水据点驻军紧急求援后，回民支队设法割断了敌人电话线，断绝了两地敌人间的联络。上午8时许，日寇援军途经康庄村。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马本斋一声令下，霎时伏兵四起，火力漫天。仅用40余分钟，便歼敌100余人，俘虏伪军5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而回民支队因为组织严密、指挥得当，无一人伤亡。之后，马本斋按照冀中军区的命令，率领回民支队直逼敌人在冀中的心脏——保定。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在敌人的心腹地带忽隐忽现，上岸能打，下淀能藏。数月之间，作战27次，打得盘踞河间的山本联队胆战心惊。队长山本还给周围据点下了道命令：“百人以下的队伍，不准走出据点大门。”

彼时的马本斋和回民支队，已然成为日军的心头大患。1941年，日军抓捕了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企图以白文冠作为人质，逼她给马本斋写劝降信，以此诱捕马本斋。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白文冠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拒绝敌人：“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她绝食7天，以身殉国，时年68岁。白文冠牺牲的噩耗传来后，回民支队指战员纷纷请战，要为马母报仇。马本斋也沉痛地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伟业。”马本斋在入党申请书里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部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但因长期转战，加之缺少医药，马本斋的身体每况愈下。1944年1月，在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报告，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日，马本斋病逝于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终年42岁。

马本斋病逝后，对他的纪念一直没有停止。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办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题写“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题写“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同年，献县抗日民主政府将东辛庄改为本斋村。新中国成立后，马本斋的故乡被改名为“本斋回族自治县”。

马本斋是回族人民的一面旗帜，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英勇奋斗者。在他和他所带领的回民支队队员身上展现出的是艰苦奋斗、舍生忘死、坚忍不拔的抗日精神和民族气节。这种伟大的精神，跨越岁月的长河，一直留存在人们心中，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 **方志敏：坚定信仰铸就的英雄**

邓小平曾经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英雄方志敏，在狱中文稿中曾多次谈到共产主义信仰，并初心不移、坚定地践行着自己的誓言。坚定的信仰是方志敏崇高革命精神和坚强革命意志的坚实基础，铸就了这位英雄气壮山河的不凡一生。

1924年，方志敏经赵醒侬介绍，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初，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共产党，但共产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纲领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

他还记下誓言：“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从入党的第一天起，方志敏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无论个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工作，理想和信念从未动摇过。

1935年1月底，陷于绝境的方志敏不幸被俘。自被捕之日起，方志敏就没有指望活着出狱。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他写道：

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都下决心就义。只是很短时间的痛苦，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就完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常是这样笑说着。我们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

这样“笑说着”“心平气静”地谈生死，只有树立了坚定信仰的人才能达到如此的境界。

方志敏身系囹圄，心里却日夜惦记着党与革命事业。他说：“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他还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

自觉时日不多的方志敏，决心用“写作”将未竟的事业推向永恒。他利用敌人要他“写点东西”的纸和笔，进行废寝忘食的写作。方志敏早年染有肺病，入狱以来，脚戴重镣，饱受折磨，身体极度虚弱，写作时间稍长，头就发晕，全身无力。他咬紧牙关，靠着桌子坚持写，或者拖着铁镣在室内移动几步，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在床上躺一会，起来再干。

狱中的写作十分艰辛。方志敏写道：“不管怎样，祥松还是天天在暗中努力着，为着这，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他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面对死神，方志敏信念如磐，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用手中的笔作战斗武器，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文稿和信件，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13万文字，用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在他的笔端流淌着对自己一生清贫岁月的总结、对革命的坚定信仰以及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不仅如此，他还殚精竭虑保存与传递文稿，并将文稿一次又一次地从监控严密的国民党监狱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并大部分交到地下党手中，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奇迹。

方志敏始终坚信中国革命事业必然成功，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一定能够建立，对于革命成功后的中国充满着憧憬。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他写道“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如今，方志敏心中美好的愿景已经成为现实。“可爱的中国”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亲历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变，都是共和国大厦的建设者。

方志敏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不忘初心，始终坚定地践行着自己的誓言，他心甘情愿地为“信仰的主义”流血牺牲，信仰的旗帜造就了英雄的传奇！

# **毛泽民：中国金融史上的革命先锋**

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东17岁就离开家乡，三弟毛泽覃13岁时也前往长沙读书。只有二弟毛泽民在家乡韶山种地。他从十三四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务农，父亲去世后，他就靠种地的收入供养哥哥与弟弟读书。

毛泽东曾对别人说：“我到长沙去读书，是泽民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他定期到长沙来，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喔。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泽民，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

毛家三兄弟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张合影，是1919年春天三人同母亲在长沙照的。在这张照片里，人们看见，哥哥毛泽东身穿长衫，已是青年才俊；弟弟毛泽覃则是学生模样，他俩穿着新式布鞋。唯独毛泽民身着乡下的粗布短袄，剃着光头，赤脚穿一双草鞋。这个草鞋弟弟，后来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红色金融鼻祖。毛泽民的名字，两次印在中国金融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出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毛泽民，1896年生，湖南湘潭韶山人。1921年参加革命，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毛泽民辗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从1921年在毛泽东的引导下投身革命，到1943年牺牲，短短22年，毛泽民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许多个第一，真可谓波澜壮阔，有声有色，生的精彩，死的壮美。

1931年初，毛泽民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长。1931年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他在短时间内解决了金融人才严重缺乏、没有准备金、苏区内多种货币混乱流通等困难和问题。

1933年5月，毛泽民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第15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先遣团副团长、总供给部副部长。时人称15大队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在长征中解决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艰巨任务。1936年2月，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战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令人痛心的是，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在新疆捕杀共产党人。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

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坚定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牺牲前他曾对战友说：

“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于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是毛泽覃的哥哥！”。

### **王尔琢 ：立誓以身许国的“美髯公”**

石壁双立，观之如门，遂称石门，石门县位于湖南，1901年，王尔琢出生在这里，21岁那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自此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期间，他表现优异，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他也颇为赏识，年底，王尔琢在周恩来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夏，王尔琢在北伐战争中，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王尔琢写信给他满心牵挂的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女儿，让母女俩到武汉团聚。没想到，还没等到团聚，全国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一家人终究没能见上一面。

1927年，王尔琢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战斗中，他率领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一口气冲进敌人的指挥部。起义后，王尔琢同朱德、陈毅一起，带领起义部队的余部转战湘南，将革命的火种保留了下来。也就从那时起，他蓄须明志：革命不成功，不剃头、不刮胡子。毛泽东曾对人笑称：“别看他长发长胡，可他还是个20刚出头的英俊小伙子呢！”日后，王尔琢随朱德转战闽赣边界。

1928年1月，朱德、王尔琢带领起义部队开进宜章县城，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王尔琢以出色的军事才干，为朱德出谋划策，在郴州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一举取得了“湘南暴动”特大胜利，紧接着，王尔琢又与时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联系，及时促成宁岗县砻市“朱毛”会师，使中国革命进入大转折。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简称“红四军”，王尔琢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一任参谋长。王尔琢从提任参谋长到1928年8月25日牺牲的短短4个月，是他生命军旅生涯中最灿烂的一页。

王尔琢善治军、会打仗，协助毛泽东、朱德先后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二、三、四次大规模“进剿”，他率领的28团因行动迅速、作战英勇，被誉为“飞兵团”，王尔琢也被称为“飞兵团长”。

1928年，在江西崇义县思顺圩，刚编入二十八团的二营营长袁崇全裹胁士兵叛逃，王尔琢认为跟着袁崇全叛逃的大部分人是受了蒙蔽，主张“喊回来”，自告奋勇率队去做叛逃官兵的工作，“我是他们的团长，还是我亲自去把他们接回来”。8月25日晚，王尔琢快马追上叛军，不顾危险，不断喊话:“同志们别怕，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反复喊了几遍后，山上的士兵逐渐下来了，就在此时，气急败坏的袁崇全突然开枪射击，王尔琢躲闪不及，中弹倒在血泊之中。最终，被袁崇全胁迫走的五个连全部归队，王尔琢却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牺牲时，他仍是长髯飘飘。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来，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将士们将他葬在江西省崇义县思顺圩外虎形岭上，在追悼王尔琢大会上，一副由毛泽东起草、陈毅书写的挽联格外醒目:“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王尔琢短暂的革命生涯中，鼎立协助毛泽东、朱德巩固部队、指挥作战，在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创建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初期，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常德有一面石墙，刻有一首长诗歌颂王尔琢，诗曰：“尔琢拔刀起，血誓效讨伐。革命不成功，此生不理发。新婚方五月，大义割柔肠。致书慈父母，泪落沾衣裳。……红旗闪耀处，须发自堂堂。”

# **IMG_256王尽美：尽善尽美唯解放**

1925年8月19日，山东青岛，一位年仅27岁的青年躺在病榻上，弥留之际，他留下了庄重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为党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领导者王尽美。

1898年6月14日，王尽美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市大北杏村的一个佃农家庭，原名叫王瑞俊。王尽美在出生前4个月，父亲突然暴病身亡，还未成人爷爷也病故了。为生活所迫，王尽美的奶奶只好去地主家当佣人，母亲则在家里日夜纺线挣钱糊口，艰难度日。贫苦的家境、地主家的盘剥和压迫，使王尽美产生了改变命运的渴望。

辛亥革命爆发后，进步的精神和思想吹拂着神州大地，王尽美学到的知识增多了，眼界开阔了，对周围的环境有了新的认识，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次辩论中，王尽美陈述己见：杀死一个袁世凯，还会有另一个袁世凯，在中国还有比炸弹更厉害的武器，那就是劳苦大众，如果唤起他们、依靠他们，就能战胜反动势力和外国列强。这一年，王尽美16岁。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波及全国，身在济南的王尽美，带领山东的学子与北京等地的活动遥相呼应，成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人物。他号召和组织同学罢课游行，进行示威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虎狼之心和北京当局丧权辱国的行径，号召各界民众誓死力争，奋起救国。暑假期间，他回到家乡，发动诸城各个学校中的活跃分子，联络组织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印发传单，限期禁绝日货，禁运内地物资出口资敌。

1921年春，在李大钊的秘密帮助和具体指导下，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齐鲁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6月底，王尽美与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王尽美汇报了山东党组织组建的过程，并对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思考和观点，谈吐儒雅从容，年轻充满朝气，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这是王尽美参加“一大”后写下的诗句，还将原名王瑞俊改为王尽美，以此彰显自己的志向。

党的“一大”闭幕后，王尽美回到山东，他常常是白天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工作和学习，夜间到外面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因为在学校的壁报栏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饭碗问题》的文章，抨击教育制度的腐朽和教师的麻木，学校当局开除了王尽美的学籍。从此以后，王尽美脱离了学生生活，转而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时年23岁。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指派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参加。对于王尽美来说，苏俄一直是他向往的革命圣地，为了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王尽美想去亲眼看一看革命后的苏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会后，王尽美和其他代表留在苏俄，进行了近半年的参观学习，他从耳闻目睹的事实中，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中共二大后，王尽美被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分工专做职工运动工作，他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负责人之一，参与制定《中国劳动法大纲》，随后王尽美被秘密派往山海关开展工人运动。山海关没有党组织、没有工会，这里的工人按地域划分帮派、四分五裂。王尽美化名刘瑞俊，来到山海关铁工厂，成为一名最底层的学徒工，白天他勤劳务工，晚上就开办工人夜校，一边为工人补习文化，一边向工友宣传革命道理。王尽美用浅显易懂的道理，说出了工人们的心声，很快与工友们拉近了距离。接着他开始逐步地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大家破除狭隘的帮派成见，团结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没过多久，听王尽美讲课的人越来越多。1922年10月，王尽美发起成立了秦皇岛矿务局工友俱乐部。至此，山海关和秦皇岛地区的工人，在王尽美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为京奉铁路工人运动的高潮，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终日奔波与艰苦的生活中，王尽美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那时肺结核几乎是一种不治之症，其死亡率高达65%。当时即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只能实施保守疗法，前提是病人要保证良好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但是王尽美不但没有治疗，还依然奔走于胶济铁路沿线，深入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7岁风华正茂的年龄。

丹心永在，浩气长存。王尽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孜孜以求的高贵品质，他对革命理想笃定求索、不懈追寻的执着勇气，他在艰难困苦面前百折不挠、奋不顾身的革命斗志，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 IMG_256**邓中夏：从富家子弟到人民公仆**

邓中夏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年少时的邓中夏没有沉溺于安逸生活，从小关心国家大事，喜欢阅读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报刊，崇拜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1917年，邓中夏随父进京，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很快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唤醒民众，他积极参与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国民》杂志，组建北大平民教育宣讲团，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被推举为北京联合会总务干事，成为革命青年的代表人物。

1920年夏，邓中夏从北京大学毕业，他的父亲在北洋政府给他找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差事。当聘任书送来时，邓中夏却明确拒绝了。面对严词质问的父亲，邓中夏认真回答道：“做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我不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众的长工……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

1920年10月，邓中夏协助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上来。这年冬天，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把长辛店作为工人运动的重点。邓中夏发起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讲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知识，告诉他们“大家抱个团，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是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邓中夏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此后，他领导了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人斗争。1923年2月，他参加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和苏兆征一起组织发动了省港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大大启发了工人觉悟，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中夏不仅是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还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注重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邓中夏就写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领导权、工人运动、同盟军等问题，都进行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论述。1922年7月，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邓中夏坚决拥护并写了大量理论文章进行阐发。1923年后，邓中夏先后发表《解惑》《论劳动运动》等文章，明确指出：“过激派的口号是‘推翻资本制度’和‘劳农专政’”；“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内外压迫，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他在1923年至1924年间先后发表《论工人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认为：“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做国民革命”，但是“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1923年10月，邓中夏在团中央机关刊物《团刊》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中国农民不仅占人口大多数，而且富于革命性，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援军”，因此必须尽可能地联合农民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斗争，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1928年中共六大后，邓中夏还写作完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最早总结了中国职工运动的经验和规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参加了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而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他坚决拥护会上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邓中夏被党中央派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秋，邓中夏被党中央调回国后，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1931年冬，邓中夏被调到上海，并很快担任了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面对上海白色恐怖的危险，他不顾自身安危日夜奔走，努力恢复互济会的工作。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革命活动中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叛徒出卖，邓中夏被国民党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后又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他以坚定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顶住了国民党的利禄引诱和严刑拷打，他写道：“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邓中夏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献出了年仅39岁的宝贵生命。

# **IMG_256邓恩铭：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董必武同志1961年8月21日在纪念王尽美的一首诗中写道：“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后人有诗赞之曰：能歌且善吟，烈士邓恩铭。对敌斗争很，反腐不容情。临难不苟免，憾望南雁行。水家山川秀，奋斗育诗人。

邓恩铭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从小就能体会百姓的疾苦。上小学时，邓恩铭曾编唱一首歌谣：“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对于这种不平等的社会，邓恩铭深恶痛绝，曾作诗一首赞扬当地发动农民起义的水族英雄潘新简：“潘王新简应该称，水有源头树有根。总为清廷政腐败，英雄起义救民生。”从这两则事例可以看出，邓恩铭从小就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并萌生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7年8月，邓恩铭动身前往山东济南投奔堂叔求学。临行前，他慨然挥毫赋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这首诗激情满怀，虽然是仿写，但体现了少年邓恩铭离开家乡时胸怀天下、踌躇满志的心情。当送别的亲友问他何时返乡时，他以诗言志：“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当时，他年仅16岁，却已明确表达出为天下百姓谋求解放的远大志向，甚至表示不惜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置个人生命安危于不顾。

来到济南后，邓恩铭开始真正接触新思想新文化，逐渐成长为一名学生领袖。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分析社会。他尖锐地指出：“就是因为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才有灾民。”并疾呼：“改造社会这种事情确乎是我们中国的一线生机了。”很快，他把改造社会的愿望付诸行动，并坚定跟随中国共产党，投身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践行了共产党员的社会担当、民族担当精神。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让邓恩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认识到只有组织发动群众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坚决斗争，才是救国的唯一途径。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使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1年，他与王尽美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参加中共一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时也使他开阔了眼界，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24年，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家人把他送到外地求学，原期望他读书做官，光宗耀祖，谁知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其所“志”是他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

邓恩铭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突出地体现在他三次被捕入狱上。1925年，邓恩铭在青岛先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5月4日，邓恩铭第一次被捕，关押几天后被驱逐出青岛。11月，时任中共山东地执委书记的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1926年春被保释出狱后，仍带病坚持到淄博矿区领导工人斗争。1929年1月，邓恩铭第三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脖子上的淋巴核病发作，溃烂流脓，致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尽管如此，他依然斗志不减，把监狱作为与敌人斗争的另一战场，成立了狱中党支部，有计划地领导狱中党员和难友开展斗争。曾先后组织两次绝食斗争，争取到阅读书报、接近狱外探监人的权利。还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斗争。第一次只有一人逃脱成功。但邓恩铭不屈不挠，又谋划组织第二次越狱。由于这次部署细致周密，相当一部分同志成功逃出监狱，但邓恩铭由于身体虚弱，没能逃脱。在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时，他强撑病体，给母亲写下最后的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邓恩铭与其他21名烈士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邓恩铭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政治品质，鲜明地映照着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党汲取精神动力的源泉。在全党全国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今天，邓恩铭同志的精神将如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我们前进的征途。



**韦拔群：壮族人民的忠实儿子**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里, 在祖国南疆木棉花盛开的地方, 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就是壮族人民忠实的儿子、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韦拔群．韦拔群自幼就是个出类“拔群”的孩子, 常为受富家子弟欺负的穷孩子们打抱不平．长大后, 他又成为一个憎恨反动统治阶级、同情劳动人民的热血青年。

1916 年, 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 云南护国将军蔡锷 起兵讨伐袁世凯． 青年韦拔群立即变卖了自己的部分田产, 购买枪支, 在家乡招募了100多名有志青年, 投奔了反袁军．后来, 由于他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 受到反动势力迫害, 就脱离了旧军队, 去上海、广州寻访他最仰慕的革命者孙中山．虽然他没有见到孙中山, 但他并不灰心。

回到家乡东兰县武篆区后, 韦拔群立即扎到穷乡亲们中间, 重新拉起一支农民武装, 反抗地主的压迫．他率领农民自卫团三次攻打东兰县城, 最后一次一度攻占了县城, 赶跑了反动县长．不久, 他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参加了共铲党人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习有关农民运动的理论．在那里, 他还结识了彭湃等党的负责人, 树立起了为穷苦人求解放的远大理想．当他再一次返回东兰县时, 已经是一个有了明确斗争目标的成熟的农民运动领袖了。

韦拔群很快就建立起广西最早的县级农民协会——东兰县农民协会, 还创办了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先后培养了壮族、瑶族和汉族的农运骨干600 多人, 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

敌人对农民运动恨得要死, 怕得要命, 迫不及待地派军队前来镇压, 杀害乡民700 多人．可是东兰等地的各族人民并没被敌人的凶残吓倒, 他们宁死不屈, 跟随他们最信赖的“拔哥”, 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东兰农民揭开了广西农民运动的序幕, “拔哥”也成了广西远近闻名的人物。

自从韦拔群加入中国共铲党并当选为广西农民协会的副主任后, 他像上足了弦的发条, 更加起劲地为革命工作．这时候, 党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来广西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29 年12 月11 日, 他们发动了“百色起义”, 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张云逸任军长, 邓小平任政委, 韦拔群任第三纵队司令．不久, 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珉主政权也建立起来了。

1930 年秋, 红七军奉调北上, 韦拔群被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为了加强北上红军的力量, 韦拔群毅然把从东兰带来的1000 多名精壮战士和好枪, 全拨给了主力部队, 自己只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和30 多支破枪．张云逸非常感动, 分别前, 他紧紧地握住韦拔群的手, 说: “拔群同志, 你留下, 往后的工作会更加艰巨, 斗争会更加残酷, 要多依靠群众, 依靠党! ”韦拔群充满信心地回答: “不怕! 这地方我熟, 走了一千, 还会有一万, 有人就会有枪．我们一定坚持到红军主力打回来! ”

红军主力一撤走, 敌人立即反扑过来．韦拔群早有准备, 他一面迅速地扩充自己的队伍, 一面向山区转移．然后再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 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为了鼓舞根据地群众的斗志, 韦拔群编了一首《革命到底》的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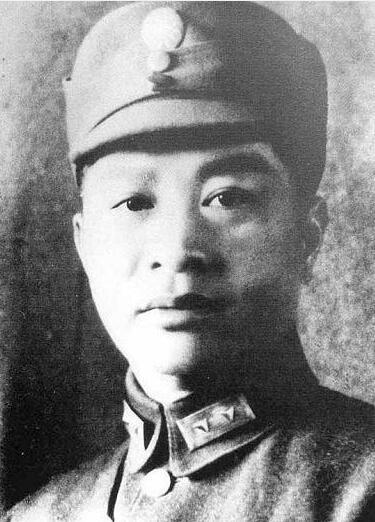
“穷人闹革命, 众乡亲, 雄心要坚定．那时灭土豪, 吃穿好, 饭饱衣又新．今日处恶境, 但相信, 雾散天会晴．”

这首诗, 充分表现了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乐观态度．在斗争最艰苦的日子里, 韦拔群始终和各族群众血肉相连, 和他们睡山林, 钻岩洞, 吃野菜, 嚼树皮．为革命, 他一家20 口人中有10 多人被反动派杀害, 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和儿子。

敌人无法消灭韦拔群的队伍, 就悬赏一万元捉拿韦拔群, 但仍然达不到目的．可谁也想不到, 敌人做不到的事却叫一个内奸做到了, 这个内奸竟是韦拔群过去的警卫员．他被敌人收买后, 于1932 年10 月18 日夜, 乘韦拔群发烧昏睡的机会, 用驳壳枪朝他的头部连开了两枪．年仅38 岁的韦拔群就这样不幸遇难。当韦拔群牺牲的消息传来，广大军民无不万分悲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背回韦拔群的尸体，将他安葬在特牙山上。毛泽东曾多次深切地谈起：“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拔哥”离开了生养他的土地和各族人民, 但他的战友和乡亲们并没有停止战斗, 他们一直把斗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直到今天, 许许多多关于“拔哥”的故事, 仍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在右江各族人民中间传颂着。

# **叶挺：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

叶挺，原名叶为询，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1918年，22岁的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只身投奔孙中山，次年加入国民党。1923年，中国共产党着手帮助改组国民党，叶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24年，叶挺赴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同年12月，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叶挺参与创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通称“叶挺独立团”)，任团长。这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由周恩来抽调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

湖北省咸宁市汀泗桥是北伐的必经之路，素有天险之称。1926年5月初，叶挺率独立团兵临武汉，吴佩孚急调3万兵力，死守武汉的门户天险汀泗桥。8月26日，北伐军6个团对汀泗桥发起了猛烈攻击，双方均投入主力殊死作战，北伐军连续冲锋10多次，死伤无数。午夜时分，叶挺带领部队强行军100多里，翻越三座高山两条河流，乘夜色迂回到敌人背后，发起猛攻，前后夹击，突破敌军阵地，占领了汀泗桥。汀泗桥之战后，吴佩孚又集中了4万多人的部队，在贺胜桥布下三道防线，亲自坐镇指挥。而叶挺独立团奉命担任夺取贺胜桥战斗的第一线主攻，经过激烈的白刃战，独立团一举突破敌人的防线，吴佩孚仓皇逃跑。

叶挺独立团由此成名，被人们称为“铁军”，而年仅30岁的叶挺荣膺“北伐名将”殊荣。

1927年8月1日，叶挺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指挥。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曾被迫流亡海外10年，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但叶挺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坚定，他不愿与反动派同流合污，看到自己的侄子在国民党里混饭吃，他批评说：“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挺迅速结束异国流浪生活，投入到抗日事业中。1938年，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的首任军长。毛泽东曾当面对叶挺说：“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被国民党军队围剿7天7夜，大部分新四军战士壮烈牺牲，少数被俘，叶挺下山谈判时被关押。一开始，蒋介石派出了叶挺的老同学顾祝同来做说客，让叶挺造谣皖南事变是共产党发动的，被叶挺坚决拒绝了。当叶挺听说有很多新四军战士被俘，遭受着严刑拷打时，他立刻给蒋介石写信，表示只要释放其他新四军战士，自己愿意接受“死刑”或“无期徒刑”。周恩来为叶挺悲愤地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蒋介石还曾派多位叶挺的老同学和部下前来劝降，都被叶挺狠狠拒绝。1942年，蒋介石亲自游说叶挺：“共产党和国民党你自己选一个，没有中立的说法，跟我走你可以成功，否则你完了。”叶挺平静地回答：“我早就决定我已经完了。”五年两个月的牢狱生活，叶挺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被囚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1942年，叶挺被囚于重庆，一心抗日却又身陷囹圄，悲愤之下他在牢房墙壁上写下了《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在共产党不懈谈判下，蒋介石释放叶挺。出狱前，国民党保密局的沈醉问他出狱以后最想做什么，叶挺回答：“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入共产党。”

果然，次日叶挺就写下了自己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同年3月7日，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重新入党后，叶挺感慨万千，他说，那次脱党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事。

1946年4月8日，叶挺一行人乘飞机前往延安，在黑茶山坠机不幸遇难。举国悲痛，人们在延安、重庆、上海、北平等城市自发举行悼念活动。周恩来发表悼文：“希夷(叶挺字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10年流亡，5年监牢，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

中国共产党员叶挺的一生正如他在入党申请书上立下的誓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

# IMG_256**左权：“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朱德手书的挽词诗联，镌刻在左家老屋厅堂“太行魂——抗日英雄左权生平业绩陈列”的红色方柱上。厅堂里，左权将军铜像栩栩如生，背负双手站立的军姿沉稳刚毅，望向老屋门外的目光泛着铁骨柔情……

左家老屋位于醴陵市左权镇将军村，占地约530平方米，是一座一厅两厢民初砖木结构的湘东民居，2020年5月修复开放，开放项目包括左权将军起居室、生活区及其生平业绩陈列室。今年，左家老屋被列为我省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场地。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于醴陵市一个贫农家庭，直至1923年12月投笔从戎，他在左家老屋生活了18年。其间，读书时断时续，17岁时在叔父左铭三资助下进入县立中学学习，并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研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的子弟，其责任更大。”1924年3月，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从此踏上追求真理的奋斗征程，再没有回家。1924年9月，左权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同年11月赴苏留学，初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归国，到中央苏区工作，12月调任红军新12军军长。1931年12月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第26路军举行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任该军团15军政委，旋任军长兼政委。1933年后任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二总队司令员，辅佐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展抗日战争。1937年12月3日，左权给母亲写信，“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秉承“吃草精神”，左权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他和彭德怀在清漳河畔组织展开大规模的军民生产自救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我军粉碎日寇“扫荡”的重要保障，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创建并巩固华北根据地。1940年8月，左权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1941年11月，左权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与日寇血战8昼夜，毙敌千余，创造“以少胜多、敌我伤亡六比一”的成功战例，被中央军委赞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左权总结我军作战经验，撰写《埋伏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40余篇军事著作，在我军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方面均有建树，被誉为“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毛泽东赞扬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1942年5月，日寇向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麻田疯狂进犯。为掩护总部突围转移，左权冲在前沿指挥，25日在十字岭壮烈殉国。“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彭德怀说。

“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这是左权牺牲前3天写给妻子刘志兰的第11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

醴陵城区的西山上，左权将军纪念碑巍然耸立，与左家老屋相呼应，不断激励后人，迈向新时代的奋斗征程……

**刘志丹：“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他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的“现代侠盗罗宾汉”，他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赞誉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是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心中的“好导师、好领导，好朋友、好兄长”。在33岁壮烈牺牲后，他的家乡以他的名字命名。即使过去了80多年，在陕北、在陇东，在他战斗过的红色热土，他的故事仍在传颂，他的精神仍被继承，他的影响依然深远。他就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

刘志丹1903年生于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1925年，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从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并领导渭华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和谢子长等人开辟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领导陕北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西北根据地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将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建立西北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1936年春节过后，刘志丹率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打通抗日道路。4月14日，在与敌人的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刘志丹烈士陵园里，有两块镌刻着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的石碑，一块刻着“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另一块刻着“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出自他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出生在陕北农村的刘志丹，自幼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十分同情穷苦大众，萌发了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受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常常激动得彻夜难眠。

东征出发前，刘志丹对妻子同桂荣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愤恨卖国贼，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这是刘志丹的入党誓言。“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理想。

刘志丹参加革命后，与家人聚少离多，女儿刘力贞与他相处时间很短，“在日常的细微小事中，刘力贞看到了父亲如何心怀人民、顾全大局，这对她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刘力贞生前回忆，母亲刚到根据地不久，父亲就让她给红军战士缝补衣物、烧水做饭、照顾伤兵，他自己也常把马让给走不动路的小战士或伤员骑，把棉衣给在战争中丢了衣服的战士穿。打仗缴获的粮食、衣物，大部都分给了穷苦群众。根据地的战士和百姓都亲切地称呼刘志丹“老刘”，称呼同桂荣“刘嫂子”。

“他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的物质财富，但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宽广无私的坦荡胸怀。他使我懂得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一切奉献给了我们的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壮丽事业。”刘力贞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1935年，在“左”倾的路线影响下，根据地展开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也成了“肃反”的对象之一。刘志丹坦然接受组织审查。身处险境、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闻知此事，下令“刀下留人”。刘志丹后来劝告其他蒙冤同志：“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坚持革命意志，我们的一切是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

“如此光明磊落，又如此委曲求全，刘志丹是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看到党的分裂，更不愿因此给敌人可乘之机，给人民带来伤害。”刘志丹的女婿张光回忆说。

提出“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安定、南梁、照金创立三个游击区相互依托、相互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打开了新局面；实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的方针，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军事才能，取得了辉煌成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36位杰出军事家之一。

“刘志丹短暂的一生，驰骋于西北黄土高原，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几经风雨，几多磨难，领导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志丹县刘志丹红军小学，师生们在激情讲述刘志丹的事迹；“生而益民，死而谢民”的共产党人精神，在那片红色的土地上传颂、承续。

# **IMG_256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在英烈的故乡，刘胡兰烈士的英名与事迹深深铭刻在当地干部群众心中，她信仰坚定、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几代人，并同毛泽东主席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起，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励精图治，奋勇前进。

1932年，刘胡兰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从此，刘胡兰开始接触到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人怎样才能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她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伤员包扎伤口，而且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这时的刘胡兰才13岁。后来，刘胡兰当上了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她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刘胡兰在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于1946年6月被正式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她才14岁。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了。在敌人威胁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没有办法，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她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在陕北转战途中，亲笔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出决定，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英雄浩气传千古，胡兰精神照后人。“刘胡兰精神就是忠诚、责任与奉献。”为了纪念刘胡兰，宣传刘胡兰精神，文水县南武乡南明阳村村民吕庆和骑着摩托车奔波万里，完成了百场刘胡兰革命电影走遍全国义映活动。吕庆和告诉记者：“几十年来，刘胡兰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工作、生活，在别人眼里，我是赴疆勇士、单骑英雄，可在我看来，我只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当年刘胡兰被捕、就义的文水县云周西村观音庙附近，已建成刘胡兰纪念馆。高大的纪念碑矗立在广场中央，刘胡兰雕像气宇轩昂。这里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IMG_256吉鸿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1895年10月18日，吉鸿昌出生在河南扶沟县。1913年秋（18岁），冯玉祥在河南招兵，吉鸿昌投军当了兵。他个子达1米9，高大威猛，又性格直爽，爱打抱不平，被称为“吉大胆”。冯玉祥将他选入模范连，非常赏识。1917年（22岁），冯玉祥将吉鸿昌调到手枪队，成为自己的贴身警卫。1921年（26岁），吉鸿昌升任营长，成为冯玉祥手下的一员干将。1926年（31岁），冯玉祥响应北伐，“五原誓师”，吉鸿昌升任旅长，率部从兰州出兵，解救了在西安被围困了8个月的杨虎城。1927年，吉鸿昌升任19师师长，出潼关，占洛阳，奔袭新乡、安阳等城，势如风卷残云，打得奉系军队大败而逃。吉鸿昌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声名大震。正在这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北伐中止。吉鸿昌率部退防甘肃天水，依旧和共产党人保持秘密来往。1929年，吉鸿昌平定甘肃匪乱后，进入宁夏，升任第10军军长兼宁夏省主席。吉鸿昌遵从父训“做官即不许发财”，为民兴利革弊，加强民族团结，使得宁夏迅速安定下来。他还提出了 “开发大西北” 的口号，自任总指挥，深受民众拥戴。

1930年（35岁），冯玉祥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吉鸿昌任第3路总指挥率部出潼关，于陇海路正面大败陈诚。然而最终，冯玉祥战败下野。吉鸿昌接受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22路军总指挥，担任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任务。吉鸿昌给鄂豫皖苏区写信，表示“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决不与红军打仗，还随时准备弃暗投明。1931年9月，吉鸿昌试图发动起义失败，被迫交出兵权， “出国考察”。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吉鸿昌抗日心切，立刻秘密回国，与中共联络。同年11月，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38岁），日军进逼华北，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这时，日军扶持伪军占据有“小上海”之称的多伦（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试图煽动蒙古自治。而负责华北的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封锁抗日同盟军一切经费补给。吉鸿昌毅然变卖家产，拿出6万元支持同盟军购置军火。7月5日，抗日同盟军兵分三路进攻多伦。经过一周激烈战斗，抗日同盟军攻占了多伦、康保、宝昌、沽源4座县城，将日满伪军驱逐出境。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赢得第一次大胜利！

然而，蒋介石认为抗日同盟军“妨害统一政令、破坏国策”，命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10多万人进剿抗日同盟军。在巨大压力下，冯玉祥被迫辞去同盟军总司令，再次下野。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纷纷被收编。只有吉鸿昌和方振武的两支军队，约1.5万人，两人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继续抗日反蒋。吉鸿昌任同盟军总指挥，与国民党军、日伪军苦苦周旋，甚至反攻北平。但最终陷入层层包围，寡不敌众，吉鸿昌只好同意部队被收编，躲入天津租界。

1933年10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吉鸿昌秘密联系“围剿”部队中自己的旧部，试图策反。蒋介石极度不满，下令惩治。1934年11月9日晚，一个特务闯进吉鸿昌的房间，连开数枪，结果误杀了吉鸿昌的一个朋友。随后，法租界竟以“杀人嫌疑”逮捕吉鸿昌，并移交给了国民党政府。经何应钦亲自审讯后，蒋介石下令“立即处决”。1934年11月24日行刑时，吉鸿昌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他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随后，他坐在椅子上，怒睁双目，迎着呼啸而来的子弹，结束了一生。

他的妻子闻讯，卖掉房子，贿赂监狱，领回了吉鸿昌的遗体。在贴身小褂的口袋里，妻子发现了一张小小的香烟纸，第一行写着“不要告诉我太太知道”，顿时泪如泉涌。

取得抗日第一胜的吉鸿昌，还留有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向警予：不做“大小姐”，要做“革命人”**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生于湖南溆浦县一个富商家庭，内忧外患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她，少年时就充满求知渴望，关心国家兴亡。1912年秋，17岁的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又转入周南女校。在此期间，她将原名“向俊贤”改为“向警予”，提醒自己对封建思想和势力要高度警惕。

向警予早期抱定“教育救国”的理念，她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溆浦创立了溆浦女校，并担任校长。她给学生讲述国家大事，宣传爱国主张，号召大家发愤图强，将来为苦难同胞服务。这一时期，向警予的思想还未完全成熟。她在写给哥嫂的信中提到：“事业一层，不必太求急进。平常人之所视为荣辱得失者，自吾辈视之真不值得一笑。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虽然“真事业”的面目还比较模糊，但她已把自己的事业同祖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9年，向警予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思想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她与蔡和森、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人。在当年12月7日欢送第八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上她演讲道：“吾人之求学，宜抱供献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亦吾人应注意也。”带着“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的初衷，同年底向警予亦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她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几个月后便能读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1920年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献身革命的情怀：“总要不辱你老这块肉与这滴血，而且这块肉这滴血还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正是在法国期间，向警予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从此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中，积极投入到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党的二大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创立妇女部，开展妇女运动。向警予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明确了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在此期间，她起草了妇女运动的一系列文件和决议，并亲自担任《妇女周报》的主编，在《妇女周报》以及《向导》《前锋》等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作干部。向警予还直接领导了上海丝厂女工联合大罢工和上海南洋烟厂工人大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局面，使女工们的阶级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被捕。向警予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在狱中，敌人用尽一切手段也不能从她口中得到党的任何机密。她坚定地表示：“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无上光荣！”由于向警予是工人们敬爱的领袖，在群众中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反动派专门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杀害向警予，想达到“以儆效尤”之目的。在去刑场的路上，她向人们高唱《国际歌》并呼喊口号，敌人慌忙向她嘴里塞石头，并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向警予被杀害于余记里空坪刑场。就义前她曾留下这样的遗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慷慨慨。”

诗人柳亚子以沉痛的心情，写下诗句寄托哀思：“雄词慷慨湘江向，情话缠绵浙水杨。长痛汉皋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蔡和森听闻噩耗，悲痛不已，撰文悼念：“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怀抱坚定的信仰，并用激越的精神去践行，至死不渝，这是向警予的真实写照。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造真学问储真能力，这不是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对自身的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吗？”“我为这惟一光明惟一希望而不孝不友之事竟躬犯之，如无所建白，扪心何以自安。”为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这“惟一光明惟一希望”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是向警予铭刻进生命的誓言，她也是这么做的。

1939年三八妇女节时，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 **江竹筠：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

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随处可见以小说《红岩》中江姐命名的地名：江姐小学、江姐中学、江姐村、江姐广场。这里是江姐人物原型，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烈士江竹筠的故乡。

1920年8月20日江竹筠出生在四川富顺县一个普通农家。10岁时，她的母亲想方设法省下钱，把她和弟弟送到了重庆道门口一所教会小学。为减轻家庭负担，江竹筠辍学进袜厂当了童工。好在这样的日子不算太长，在三舅的帮助下，12岁时她重新走进小学校园。童年的苦难经历，给江竹筠年幼的心灵划下了深刻的痕迹，养成了她踏实、独立、倔强、敏感的性格。读小学时，她成绩优异连跳三级，也在这一时期，她萌生了追求真理的渴望。

抗战爆发的时候，江竹筠正在上中学。“要做斗士，不做装饰！”是那个年代知识女性中流行的一句话，江竹筠非常喜欢。后来，她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受到学校党组织的注意。1939年，经中共党员戴克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更加坚定了人生的理想信念：“为党、为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此，她开启了坚定的革命之路，并且迅速投身到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中。

1939年之后，国民党反共趋向越来越明显，不断在国统区镇压进步运动，抓捕共产党人。此时的江竹筠按照组织的要求，转入地下工作。在学校读书时，沉心静气当好学生，并团结同学，凝聚力量。从事社会职业时，她既要正常上下班，还要顶着日机的轰炸，警惕特务不时的跟踪，去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很快，她便崭露头角，并于1940年秋有了第一个党内职务——中华职业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在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的《红岩》中，记述了一个澄清皖南事变真相巧撒传单的故事。

那时，新四军被诬蔑为“叛军”，所有报纸、媒体都不得发表为其辩白的报道，普通人根本不知事变的真相。重庆地下党员都被动员起来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等传单，江竹筠所领导的党组织也接到了这一任务。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都在抓人，江竹筠也不能暴露自己，就和同学何理立商议深夜将传单放到教师办公室和教室里。可她们的宿舍在二楼，二十多人睡两排地铺，一个挨一个，两人又睡在中间，半夜醒来惊动众人怎么办？恰好当时流行跳交谊舞，两人便商定睡前教大家跳舞。女生们对跳舞劲头十足，最后个个累得腰酸腿胀，熄灯后很快便进入梦乡。夜半时分，二人轻手轻脚地下楼。教室的门锁着，她们就用石块把传单压在门口和过道上。第二天早晨，中华职业学校师生们看到传单，全校哗然，纷纷同情新四军，谴责国民党妄图发动内战的不义之举。

大浪淘沙始见金，正是经过长期隐蔽生涯的熔炼和摔打，江竹筠才成为人们所熟知的稳重大方、沉着机智的“江姐”。1946年，江姐完成学业，回到重庆继续投身学生运动。在中共重庆市委大力推动下，《挺进报》顺利发行，江姐在校对和整理电讯稿以及报纸发行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引起反动派势力的极大恐慌。1948年4月，伪装后的特务悄悄潜入《挺进报》发行机构获取重要信息，并以此为线索打击了中共重庆市委。同年6月，江姐不幸被捕，被押送至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到老虎凳、吊索等诸多酷刑的折磨。但她始终坚守信念，保守党的秘密，与敌人做着顽强的斗争，不断激励监狱中的战友坚决同敌人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特务秘密枪杀，年仅29岁。

位于重庆的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着一封弥足珍贵的信件，这封信是用筷子磨尖做成的笔、以旧棉絮烧成灰做成墨写在粗糙的毛边纸上，信只有巴掌大小。这封源自江姐牺牲前给家人的托孤遗书，信中有一段这样写到：“……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江姐想到的是伟大的革命信仰、党的事业，新中国的解放、独立、富强。她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寄托于后人，希望下一代也能继承其毕生之遗志。

江姐为了革命理想与民族独立，用行动书写了极不平凡的一生，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诗篇，树立起一座屹立不倒的精神雕像。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精神，犹如傲雪红梅，永远傲放在世人心中，激励着人们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不断努力奋斗。

# **何叔衡：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青**

“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生前写给家人信中的一句话，字里行间饱含真情，传递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

何叔衡，1876年生于湖南宁乡一个农民家庭，1902年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虽被人讥笑为“穷秀才”，却也因其正直和嫉恶如仇而颇受乡里称道。

不久，因清廷行“新政”后办新式学堂，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外界新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

1913年何叔衡进入长沙，虽已经37岁，却报考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第一师范）当新生。校内主事颇为惊诧，他却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

这位校内年纪最大的学生，一向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并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市内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五四时期的著名青年团体“新民学会”，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7月间，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化装去上海，翌年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此时他年过五十，仍学通了俄语，以此研修革命理论。1930年他回国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又进入江西瑞金，在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中任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因他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地判死刑，被诬为右倾而被撤销全部职务。

1934年秋，红军长征，何叔衡连夜编了两双草鞋主动申请参加，但是被王明等人拒绝了。因为组织已经决定让他留守苏区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他心里虽难过，仍每日扶一根拐棍，口无怨言地早出晚归。

1935年初国民党军杀声四起，中央苏区陷落，组织上派便衣队护送何叔衡向闽西突围，在赶往闽西的途中被包围，且战且走，冲到村南的大山上，匪兵紧追不舍。何叔衡气喘吁吁奔跑困难，又不愿拖累同志，面色苍白地向带队的邓子恢喊：“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特务员（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了下去，享年59岁。

临死前，何叔衡对同志们发出最后的誓言：“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青。”诗人萧三如此评价何叔衡一生的光辉事迹。

# **张太雷：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我们须给青年学生明白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使不致无所适从。只有以各种他们能见得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义，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们的主义。”1927年12月12日，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身中数弹牺牲在战斗第一线，遗体不知去向。后来每到祭奠时，他的后代都会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向全体牺牲的英雄们鞠躬。这是先辈葬身之地，也是理想寄托之地。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字泰来。“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张曾让在投身革命后选择以“太雷”为名。在短短的一生中，张太雷确如一声“惊雷”：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为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在广州起义的战场上，背水一战为革命寻找出路。

张家本为常州世家，到张太雷父亲时家道已中落，只能寄居在岳父家中。1898年6月17日，背负着“否极泰来”、复兴家业的期望，张太雷出生了。在亲属的资助下，他就读于西郊小学、常州府中学堂，并先后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法科。他成绩优秀，英语尤其突出，且擅长踢足球、打乒乓球、踢毽子。十余年寒窗苦读，一份律师的职业、丰厚的收入已在眼前。然而，1921年2月，他发回家书：“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所以我决计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信中他劝慰妻子：“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我并没有一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家书中无法言明的“学问”“幸福”，正是张太雷多年求索的共产主义理想。

1918年，为抵制《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张太雷成为天津“学生救国会”骨干。不久后为勤工俭学，他以北洋大学法科三年级学生的身份加入《华北明星报》，并担任俄共（布）党员鲍立维的翻译。同学们发现，每日自修时间，张太雷都在秘密翻译社会主义革命文献。他对好友李子宽说道：“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中，张太雷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骨干，奔走在演讲、游行的队伍中。1920年6月15日，北洋大学为张太雷签发了毕业证书。此时，张太雷已经自觉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他奔走于京津沪，为来天津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当翻译，随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后又赴沪参加革命活动，返津推动天津革命工作。1920年10月，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初，张太雷穿过茫茫西伯利亚雪原前往伊尔库茨克，身份是新组建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位红色使者。

1921年7月12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23次会议中，张太雷获得5分钟发言机会。他旗帜鲜明地将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提醒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并发问：“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呢？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年轻的张太雷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他的青春与才华也蓬勃绽放。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曾回忆道：“张太雷同志不囿于中国问题和事务的小圈子。国际性的工作吸引了他。他也力求从中汲取‘更多的组织经验’。”而在召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张太雷同志的卓越才能和他那组织家和实干家的天才，又得到了施展和发挥”。

1927年11月底，一艘邮政船漂在广州沙面白鹅潭里，帆布将两丈来长的船舱包裹得严严实实，20余人在舱内挤得满满当当。张太雷跨进船舱，盘腿坐下，说：“同志们，好事近！咱们决定在广州举行工农兵大暴动！”话音刚落，大家都凑上前去，不敢放大声音，只把拳头捶在船舱板上，或是拳对拳地笑着。这一声号令，人们已等了很久。八七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动提出到广东工作，后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对广东，张太雷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曾作为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在广东工作数年，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一起被称为广东“四大忙人”。

敌我力量悬殊，任务艰巨，但起义的火焰势不可挡。12月11日3时许，张太雷发布“暴动，夺取政权”的口令，3声来复枪响击破了城市的寂静，起义部队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枪声、呼喊声、口令声越来越密，火把和车灯照得城市一片血红，队伍像暴怒的猛兽，攻下观音山，拿下公安局，迅速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天亮后，公安局大门口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字样。张太雷身穿“草黄色亚丝绒军装，腰系开岔皮带，打了绑腿……十分英武地坐在当中”，向同志们发表宣言：“工人群众夺取政权，组织了苏维埃政府。”“你们的胜利，对于帝国主义是很大的打击。”

此后，张太雷一直穿着这身黄色军装奔走在起义前线。12月12日，敌人向起义军发起反扑，张太雷按计划在西瓜园广场召开大会，以激昂的声音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宣讲声夹杂着群众的掌声，持续了1个多小时。会议刚结束，张太雷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车行至半途，他遇袭牺牲。人们赶到时，“只见汽车弹痕累累，轮胎打穿泄了气，车已不能启动。张太雷的遗体靠在车厢内，头部中一弹，仍戴着眼镜，胸侧中一弹，血水流淌在车内外”。

壮志未酬身先死，张太雷在29岁的年纪，成了中国共产党为数不多牺牲在战斗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得知挚友的死讯，瞿秋白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1938年，在张太雷牺牲11年后，他16岁的女儿张西蕾只身穿越沦陷区，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装扮成难民前往温州，步行几十天抵达安徽新四军军部。1年后，张太雷16岁的儿子张一阳也成为新四军的一员。皖南事变中，张一阳不幸被捕，在上饶集中营患上“回归热”。敌人一手拿着特效药，一手举着自首书，高烧不退、米水未进的张一阳始终拒绝投降，不幸去世。临终昏迷之际，他仍高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呀！杀呀！消灭敌人呀……”时至今日，父子二人的遗体仍无迹可寻。

张太雷的外孙冯海龙也投身军队，多年研究外公的经历。他说：“发起广州起义，张太雷和其他共产党人几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孤注一掷，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唤醒革命。作为起义的总指挥，他不需要战斗在一线。但那一代年轻的共产党人，尽管缺少军事经验，却已拥有坚定的信仰，坚信自己应该身先士卒，应该去最危险的地方，这是他们珍贵的信念。”

**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1944年9月8日，在延安各界为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演讲，号召全党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从此，张思德的名字就和“为人民服务”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15年，张思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家里没米下锅，母亲便借来谷米捣碎熬成糊当奶给他吃，因此为他取名“谷娃子”。“谷娃子”7个月大时，母亲去世，他的养母刘光友收养了他。张思德从小吃“千家奶”穿“百家衣”长大，为了不让他忘记乡亲们的养育之恩，养母为他取名“思德”。从小苦难的生活，也磨砺出了张思德坚忍的性格。

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北，解放了仪陇县。张思德积极参加了少先队，认真协助红军和民兵站岗放哨。不久后，他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张思德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他数次爬雪山、过草地，屡立战功，多次负伤，但从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还经常帮战友补洗衣服、编织草鞋……在战斗中，张思德曾冒着枪林弹雨和战友搭成人梯攀上寨顶，炸开寨门，为部队打开了通路。在一次战斗中，他先后两次负伤，依然强忍剧痛冲入敌阵，缴获了敌人两挺机枪。张思德参加革命后作战十分勇猛，被战友们亲切地誉为“小老虎”。

1937年，张思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张思德被调到云阳八路军某部留守处警卫营担任班长。1940年，张思德被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减下派，张思德被调到中央警卫团1连当战士。不久，他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

1944年，张思德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当时在安塞石峡峪荒山里建农场，走的路需要战士开，吃水的井需要战士挖，住的窑洞也需要战士掏……对于这些，张思德都积极参与，没有一句怨言，还在战前动员会上带头发言，“当兵的，打仗都不怕死，挖这些丛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有不怕苦的精神，没有什么能吓倒我们的。”当时规定每人每天半亩的定额任务，张思德总把最难挖的地段留给自己，每天还要超额一倍完成任务。张思德在工作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影响了很多人，他所在的枣园机关取得了生产劳动大收获。

1944年7月，张思德进安塞山中烧木炭。“救命啊，窑塌了！”1944年9月5日，天空下着小雨，张思德跟往常一样带着生产队战友进山赶挖炭窑，没想到炭窑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不顾个人安危将战友推出窑口，战友得救了，他自己却被埋在了坍塌的土里，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噩耗传来后，毛泽东心情格外沉重，嘱咐要在延安为张思德举办追悼会，他要参加并讲话。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在枣园西山脚下广场为张思德举行了千人参加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

**李大钊：中国革命的“播火者”**

1927年4月16日，段祺瑞刚刚垮台，奉系军阀张作霖就占领了北京。看到满大街耀武扬威的东北兵，以足智多谋而被北京大学同仁戏称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悄悄把正在听课的李葆华叫了出来，神色凝重地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

李葆华父亲就是沈尹默原来在北大的同事、时为国共两党北方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父亲因病去世6个月后李大钊才出生，一岁半时母亲又不幸病故，是慈祥的祖父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将他抚养成人。李大钊自幼勤奋刻苦，成绩优异。1899年，按照当地的风俗，10岁的李大钊与16岁的邻家姑娘赵纫兰结婚。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预科读到正科，直到1913年毕业。从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回国后，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生活才安定下来。

留学三年，李大钊痛感国家危亡，开始寻求救国之道。1918年冬，他参与主编《新青年》，还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激情澎湃的呐喊，影响了一大批时代青年，许多人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韶山的青年，作为北大图书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经常向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请教，深受其影响，他就是青年毛泽东。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通过与维金斯基的深入交谈，两人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壮举。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叫共产党。

中共一大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李大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会后，李大钊到广州去会见孙中山，同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经过频繁接触，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友谊。

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和李大钊5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很快就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北洋军阀愚昧无知，他们害怕“赤化”。因为国共合作，他们也不分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笼而统之，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反动军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还派兵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夫人赵纫兰很是为李大钊的安危担心，李大钊写信对她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

1926年3月初，奉军不断以军舰运送军队在天津大沽口登陆，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于是，国民军封锁了港口。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其后跟随着数艘奉系军舰。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并发空炮警告。蓄意挑衅的日本军舰突然炮击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事后，日本又纠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内答复。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国人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组织发动下，3月18日，北京各学校、工会等两百多个团体共十多万群众聚集到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公使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去请愿。段祺瑞大开杀戒，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一时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死伤枕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不久，国民党方面的徐谦、顾兆熊、陈友仁等和共产党方面的陈乔年等人，先后被调往广州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1926年4月，在直、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皇帝”———安国军总司令。沈尹默很为自己的老友李大钊担心，于是匆匆找到李葆华，要他转告自己的父亲注意人身安全，最好能暂时离开北京。

李葆华回到家中，向父亲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后平静地对李葆华说：“你再见到沈叔叔时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果然，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京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李大钊是反动军阀的眼中钉。根据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京师警察厅为了探寻李大钊下落，派出大批特务化装成人力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门口窥视。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特务秘密逮捕的。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吴郁文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他们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北郊警察署长告诉王景有和杨恩华，这个人是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当场抓住的，经过王景有和杨恩华的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这个人终于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叛变投敌，“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

在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串通密谋之后，1927年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0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开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李大钊在《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敌人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他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大压力，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就在这时，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推波助澜，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为了博得帝国主义支持，和蒋介石携手言欢，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凶残卑鄙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

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9岁。他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浙寺整整6年后，1933年4月初，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4月23日，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1949年3月，当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城时，曾十分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杨开慧：“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这是一位年仅29岁的共产党女战士在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时作出的坚定回答。她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妇女解放运动倡导者和实践者杨开慧。

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7岁时，杨开慧进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读书。作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杨开慧不仅成绩优良，常受老师夸奖，而且性情谦和，深受同学们喜爱。她的父亲杨昌济为人正派、笃志嗜学，是一位满怀爱国热忱的学者。受家庭环境影响，杨开慧早年就树立起了崇高的人生理想，将“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13年春，杨昌济去往毛泽东所在的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杨开慧随父亲迁居长沙，转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书，继续接受教育。这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和好友蔡和森等人到“杨寓”求教，讨论治学做人之道，探求救国救民之理。杨开慧在一旁倾听，深受启发，开始懂得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

在参与讨论的学生中，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最为钦佩，后与其相知相恋，最终结为伉俪。1918年夏，杨昌济到北大任教，杨开慧又随之迁居北京。同年秋，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这期间，杨开慧与毛泽东接触较多。在相处的过程中，杨开慧与毛泽东志同道合，感情日深，互为知己。杨开慧曾在回忆中谈到：“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我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1920年的冬天，19岁的杨开慧和27岁的毛泽东在长沙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结为革命伴侣。

与毛泽东成家之后，杨开慧开始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旅程，尽自己之所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1921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毛泽东任区委书记。杨开慧负责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她还投身于地下工作，收集秘密情报，并且深入工人运动，接待各地来访的工人代表，热情地向他们宣扬党的主张。1923年，杨开慧随毛泽东到达上海，以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为掩护积极参加妇女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按照党的安排，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并在间继续为革命奋斗。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她与敌人开展地下斗争，坚持了三年之久。

1930年8月初，红军被迫撤离长沙后，湖南军阀何健在长沙疯狂进行“清剿”，并悬赏1000银元捉拿杨开慧。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在老家板仓被捕。面对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队”的种种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并表示：“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在得知杨开慧被捕的消息之后，中共地下党和杨开慧的亲属们曾多方设法营救，许多知名人士也出面保释。何健迫于压力，对杨开慧提出条件：只要同意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放，其他问题也可不再追问。然而，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次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年仅29岁。

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满心悲痛。在寄给杨家的信中，他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解放后，毛泽东仍时常怀念杨开慧。1957年，他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诗句，深情缅怀杨开慧。而后又用“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的回答，表达对杨开慧的敬佩之情。

历史无言，精神永恒。巾帼英雄杨开慧用她的行动诠释了“牺牲我小，成功我大”的大无畏精神。她高尚的风骨和坚韧的品质正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峥嵘岁月中，还有着无数杨开慧式的革命英雄，他们的崇高信仰和英雄气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行，为我们奋进新征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杨靖宇：白山黑水铸忠魂**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生，河南确山人。1932年赴南满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时，改名杨靖宇。1923年，18岁的杨靖宇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纺染工业学校后，曾参加罢课斗争，21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受中共组织的派遣，从开封回家乡确山县开展农民运动，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杨靖宇领导了确山农民起义。1928年秋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9年春赴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杨靖宇曾对人说，他上过两个大学，一个是“社会大学”，一个是“监狱大学”。杨靖宇先后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积极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1932年秋，他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市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日伪军连遭打击后，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同时对杨靖宇悬赏缉捕。

当年，东北抗联不但得不到内地的支援，甚至在诺门罕战役之前都得不到苏联的相应支持，整个东北在失去与组织联系下的情况下与数十万日伪军拼死一搏，能够得到的军事援助仅仅只有从报纸上搜集而来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所以，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疯狂围剿下，在东北的寒山冻水之间，杨靖宇将军率领着曾经鱼龙混杂的部队与日本侵略者奋起搏击，他取得过大捷，也经历过失败——然而，在全国颓败的情况之下，杨靖宇将军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于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最黑暗时期的前夜，杨靖宇将军的部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日军的“讨伐”力度也越来越大，一些眼看胜利无望的动摇者纷纷叛变，就连发起土龙山战斗抗击日寇、身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军长的谢文东都投降了日本，更何况一些小兵小卒？一系列的叛变让杨靖宇将军陷入了重重危机，曾经率领数千人的杨靖宇身边，竟然只剩下了区区数人，而日本人依旧不断加大讨伐的力量，面对余下众人“死在一起”的要求，杨靖宇将军拒绝了，他说这样死了也没有意义，于是他命令其余几个人在树丛灌木之中藏好，自己则不断领着日本在树林之中“兜圈子”，这一转就是五天五夜——在这五天五夜之中，杨靖宇将军一个人在数百日伪军的追击中艰难辗转，最终还是被日本人包围了，而其后的场面我们就非常熟悉了：体力尽失的杨靖宇背靠着一棵大树，双手持枪向包围过来的日军疯狂射击，日本人退了下去，又涌了上来，杨靖宇将军右手中枪，但依旧骄傲的拒绝了日本人的劝降，最终身中五弹，英勇牺牲，时年35岁。

杨靖宇生前和死后都受到了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曾派叛徒向他劝降，杨靖宇说：“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他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看到后无不感到震撼。在日本人的报道中，他们写道：“是杨啊，于是所有的讨伐队员都发出了男儿之泣。”所谓“男儿之泣”，应该就是他们感到杨靖宇这是真正的一个男子汉，一个大丈夫，所以这些日本的讨伐队员也为中国的将军而哭泣。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曾率部参加围攻杨靖宇将军的战斗，在得知杨靖宇将军腹中颗粒不存之后，这位日本人在日记中写到：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在此之后，岸谷隆一郎穷余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也越来越深。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他自杀了。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他的遗书中，竟然有这么一句话：“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岸谷隆一郎在剖腹自杀之前残忍的毒杀了妻子儿女，也许他这是用极端的手段逃避抗日将士对他心灵上的折磨。

据说，日军在清理杨靖宇将军身边的遗物时，除了发现手枪、怀表等物之外，还发现了有一支口琴。据抗联老战士回忆，杨靖宇将军经常在休息的时候给大家吹口琴，甚至教小战士们吹口琴——也许，若非山河动荡，杨靖宇将军未必会成为一个将军。这个口琴的存在告诉我们杨靖宇将军从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而为了这个他所热爱的祖国，他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反抗的道路，明知身死，义无反顾。

在西方名著《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我的丰功伟绩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时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即到来”——这句话是多么的适用于杨靖宇将军。

杨靖宇，用生命诠释了中国人反抗侵略者的决心和勇气。抗日战争时期，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烈士，奏响了为民族存亡而战的凯歌。

## **苏兆征：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 IMG_256他曾领导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曾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广州起义时，他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分工担任工委书记。他，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苏兆征。

1885年11月11日，苏兆征出生于香山县（今珠海市）淇澳东溪坊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苏兆征18岁那年，跟随乡亲往香港谋生，开始海员生涯。恶劣的劳动条件，磨练了苏兆征坚毅的意志，长期漂洋过海更使苏兆征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更养成了宽广的胸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苏兆征与其他中国海员一样感到振奋。他憧憬着中国工人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后来，他随船到东欧，与苏联海员接触，倾听他们介绍关于十月革命的经过，渐渐领悟到十月革命胜利的真实意义，受到鼓舞和启发，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

1922年1月12日，香港中国海员为反对英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奴隶待遇，要求增加工资，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为“海总”)的组织领导下，全面发起罢工。同时，香港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也相应成立。在苏兆征的带领下，罢工海员陆续返回广州。此时，香港当局一面虚伪地表示船东已答应考虑海员提出的加薪要求；一面又威胁参加罢工的海员必须于当月16日正午前回船复工。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海员准备返港复工，更多的海员情绪激动，纷纷到罢工总办事处提出质询。苏兆征深感事件的严重和复杂，一面派人调查真相，一面呼吁大家坚持抗争，在未获资方应允增加工资条件前，决不返港复工。香港当局见工人抗拒，便采取高压手段，派出军警实行戒严。为还击香港当局及轮船资本家的高压政策，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由于香港的粮食和大部分副食品都是靠内地供应的，实施禁运使香港的供应顿时紧张起来，香港当局甚为惊慌，遂派华民副政务司活雅伦赴穗，请求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出面干预。陈炯明旋即召集海员代表陈炳生、苏兆征、冯永恒以及广州工团代表与港英当局会谈。英方提出要求派海员代表跟他们回港谈判复工。苏兆征严正表示：我们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已数月之久，资方却置之不理，得不到解决绝不复工。活雅伦又把话题一转，提出希望罢工总办事处允许香港开来的“金山”、“香山”两轮运粮食回港。苏兆征巧妙回答：“本会同仁绝不出面阻止，若工人激于义愤，有所举动，则本会概不负责。”结果，活雅伦和“两轮”的广州之行一无所获，仅载着8袋邮件姗姗而回。为表示海员工人的诚意，争取社会上更多的同情，海总与总办事处之后决定派苏兆征等为代表，前往香港与对方谈判。谈判破裂后，香港当局和资方指使香港名流绅士罗旭初用金钱收买代表，被苏兆征断然拒绝。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最后以香港海员获胜而结束。这次罢工锻炼和造就了林伟民、苏兆征等工人骨干，不久，他们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亦从广州迁到武汉。时任委员长的苏兆征，也于翌年3月底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工作，出任劳工部长和武汉市政府市政委员会委员。苏兆征抵汉时，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1927年4月3日，武汉各界群众50万人，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苏兆征。就在同一天，日本水兵仗势欺负中国百姓，在汉口日租界逞凶殴伤讨付车钱的人力车夫。武汉人民纷纷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日本领事馆竟下令日本水兵登陆，用枪扫射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当场打死九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挑衅，苏兆征挺身而出，与刘少奇、李立三等发动和领导武汉人民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日本水兵屠杀中国人民暴行的斗争。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要求下，国民政府组成了以苏兆征、谭平山、陈公博为首的“四˙三惨案失业工人救济会”，处理有关事宜。5日，又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各工会联合会议，号召工人与各界民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杀中国同胞的罪行。6日，武汉各界群众代表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和武昌阅马场举行追悼“四˙三惨案”死难者大会，严正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公民的罪行。苏兆征、谭平山等又带领“四·三惨案”失业工人救济会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群众中调查失业工友人数，积极筹备、组织生产自救场所，解决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再三敦促下，国民政府拨了一笔款项救济失业工人。

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留在莫斯科的苏兆征突患阑尾炎。苏联医生建议他留在苏联疗养一段时间，待身体好些再考虑施行手术。虽说是疗养，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苏兆征始终坚持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还抓紧时间撰写关于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小册子，该书由国际运输工人委员会出版。身在异邦的苏兆征，时刻挂念为革命牺牲的战友和正在受苦受难的同胞，多次向组织要求立即回国工作。1929年2月上旬，经过半个月的舟车劳顿，风尘仆仆的苏兆征回到了阔别一年的上海。回国后，他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连家人也一直不知其已返上海。直到春节来临，同志们一再催促，他才在春节前夕回到家中。春节一过，苏兆征化名为黄先生，忙于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精神。终因劳累过度，会议结束不久又病倒。但苏兆征不愿将病情告诉同志们。一天深夜，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妻子钟荣胜几经周折才把他送进了一家私人医院。待办妥住院手续，苏兆征已陷入昏迷状态。经医生抢救，苏兆征没有苏醒过来，生命已处于垂危时刻。

1929年2月25日，在党中央机关做具体工作的龚饮冰找苏兆征汇报工作，始知他病重住院。当日下午4时左右，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赶到医院。此时的苏兆征已处于弥留之际。下午6时20分，苏兆征逝世，终年44岁。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沉痛悼念苏兆征逝世。通告说：“兆征同志在这么多年的工作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世纪最好的指导者”；“兆征同志的革命精神，真是全党的模范，中央号召全党要一致地继续着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要记着他的遗言，‘大家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 **陈延年：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

1898年，陈延年出生于安徽安庆，是陈独秀的长子。在其父的影响下，陈延年从小就自食其力，立志“自创前途”。1919年12月，陈延年与一批热血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等人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被选为旅欧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之一，担任宣传部长，负责编辑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的旅欧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1923年春，党中央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陈延年学习勤奋、思想活跃，每逢开会议论，尤其是在辩论一些政治原则问题时，他总是慷慨激昂、出口成章。当被问及为何在理论争辩时与平常的沉默寡言判若两人时，他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在原则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于是，同学们都敬佩地称其为“小列宁”。

1924年夏，党中央决定抽调留学的同志回国工作。同年10月，陈延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赴广州，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担任领导职务的陈延年为了能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到广州之初便去黄包车夫馆与黄包车夫交朋友， 学说广东话，谈人生和社会革命的道理，丝毫没有领导人的架子。他和车夫一起拉黄包车，了解他们的疾苦。他身体结实，拉起车来强劲有力，活像个老练的黄包车夫。他替年老病弱的车夫出车赚回的钱全部交给车夫。因此他在车夫中威信越来越高，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称呼他为“老陈”。人力车工会也因此很快组织起来，发展了大量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陈延年生活清苦，认为“铺张浪费是最大犯罪”。这句话是1924年12月25日， 陈延年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上说的。那时， 区委刚在黄国樑与全国总工会协调下， 租得了文明路75号至81号二、三楼为党团区委地址， 经济来源全靠党团员每月上缴的月费维持。陈延年领导下的区委能省就省， 每次政治示威大游行所用的横额和标语，都由负责人出钱买红布和纸张，自行解决。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他却又因同事结婚无房而主动让出，自己和另一位同志挤进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阁楼居住。他的卧室常年只有一套床板、一张席子、一条很粗糙的毛毯和一床被子。即使是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之时，他仍坚持除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一切工资交予党。他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多次为此捐赠经费，自己则过着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由于陈延年处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因此被称为党内有名的“六不”干部，即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做私交。

早在留法期间，为便于秘密活动，陈延年就培养了极强的情报意识，为日后推动情报保卫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陈延年任书记期间，广东区委曾向苏联为中方举办的情工培训班选送工会会员、农民组织成员、罢工者。1926年春，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合作。陈延年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建立情报小组，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情报小组的成立，为我党此后专职情报机构建设作出了重要尝试。接受任务后，小组成员奔波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有时西装革履，出没于茶楼酒肆;有时一身戎装，进出于军港要塞;有时青衣小帽，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在陈延年的部署下，小组成员充分发挥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和集体智慧，搜集到许多有关方面的情报，为区委正确判断形势和确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对此坚决反对，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报告党中央，要求中央坚决抛弃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并表示陈独秀和自己虽然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4月，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时，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后，全国形势风云突变，在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不顾危险，有条不紊地部署工作，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积极展开斗争。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得知他身份后，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的党组织。但陈延年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7月4日晚，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行刑前，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昂首挺胸， 视死如归。敌人喝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毫不理会。敌人将他强行按倒，正要行刑，他猛地一跃而起，使刽子手的刀砍了个空。最后，恼羞成怒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将他乱刀杀害。

他离去时是少年身，归来时是英雄魂。

# IMG_256**陈潭秋：血沃天山的“一大代表”**

陈潭秋，生于1896年湖北黄冈人。1916年，陈潭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学习，开始接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1年7月，陈潭秋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陈潭秋兴奋地欢呼：“我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全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福建省委书记、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等职。

1942年，陈潭秋在新疆工作时，军阀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同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

中共中央获悉陈潭秋等被捕后，立即组织营救。陈潭秋则在狱中与敌人做坚决斗争。敌人初则动用“坐飞机”“压大杠”“灌辣椒水”等酷刑，妄图通过肉体折磨逼迫他低头，但陈潭秋始终铁骨铮铮。一计不成，敌人又采用“车轮战术”展开连续数十天毫不间断的疲劳审讯，意图使他精神崩溃；为了防止极度劳累的陈潭秋合眼，丧失人性的敌人竟使用烈性阿姆尼亚不断刺激他，但陈潭秋始终坚贞不屈。残忍的折磨不起作用，敌人又换上假惺惺的面孔，企图劝诱陈潭秋签署所谓的“脱党声明”，被他严词拒绝。陈潭秋的坚贞不屈，令敌人大出意外，他们难以想象一个人何以在如此非人的折磨下坚持信仰毫不动摇。狱中看守也不得不对陈潭秋发出赞叹：“你们共产党员亚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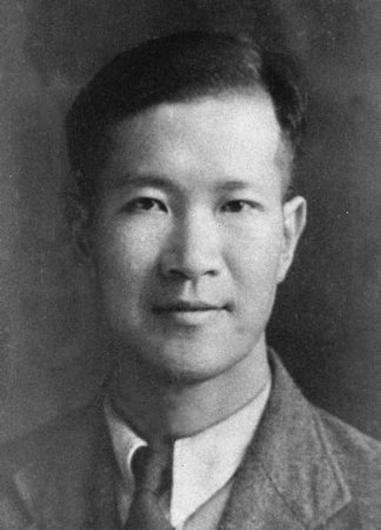
坚贞不屈的陈潭秋让敌人束手无策。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签发了对陈潭秋的秘密处决令。当日深夜，陈潭秋被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陈潭秋同志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代表们没想到，陈潭秋早已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2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舍生忘死、奋斗不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和崇高精神。周恩来称赞他“胸怀坦荡，始终坚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对党一心一意，从不动摇对革命的信念”。可以说是对陈潭秋最为贴切的评价！陈潭秋曾说：“我死后要化作一抔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路上。”诚如斯言，他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奉献给了人民，他的感人事迹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 **冼星海：“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

****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番禺一个贫苦的家庭，珠江畔的渔歌是他人生最初的音乐绮梦。纵观他的成长，求学路坎坷曲折，天赋却也锋芒渐露。这位“南国萧手”辗转于新加坡、岭南大学附中、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音乐学院，又蕴纳了塞纳河畔的浪漫、黄土高坡窑洞的豪放，他的艺术才华释放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著名电影作曲家、音乐家，中国电影音乐创业史上的先驱者。

1929年，冼星海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他心怀愤懑，毅然决定到法国巴黎留学。1930年，冼星海靠在船上做苦工，辗转到达巴黎，跟随法国著名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学习，并曾先后追随巴黎著名作曲家德印第学习作曲，跟巴黎音乐学院著名教授加隆学习“对位”和“赋格”。随后，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正式成为保罗·杜卡斯的学生。1935年，学有所成的冼星海选择从塞纳河畔回到黄浦江边，迅速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冼星海深深感受到民族的危亡与人民的困境，他常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冼星海开始探索、创作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反映工农大众心声的新歌曲，他先后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工人运动会歌》，谱写了著名电影《夜半歌声》主题曲、插曲《热血》《黄河之恋》，并为电影《壮志凌云》谱写插曲《拉犁歌》等作品。后来，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苏文化协会，与诗人塞克合作创作了《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赴战曲》等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八一二”事变之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以戏剧、音乐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7年10月，冼星海在武汉发动了十余万人参加的长江火炬歌咏大游行，将《在太行山上》《起重匠》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谱写在祖国大地上……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同年11月，他携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接任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翌年春天，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冼星海和鲁艺的师生们一起上山开荒，在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中，冼星海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大型歌舞话剧——《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好风光……”“酸枣刺，尖又尖，敌人打到黄河边……”等歌声载着中华儿女在陕甘宁广袤大地上的奋斗精神口口相传。1938年10月，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队三队赴吕梁山地区工作。黄河的惊涛骇浪、船工们搏风击浪的英姿以及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激起了他的创作灵感和热情。1939年初，光未然创作出长诗《黄河吟》。当冼星海去看望手臂受伤的光未然时，听他朗诵《黄河吟》，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冼星海深受感染，决定全力为这首长诗配乐。在简陋的窑洞里，靠着借来的两斤白糖提神，冼星海连续创作6天6夜，不朽之作《黄河大合唱》横空出世。犹闻战鼓声声，犹见万马齐鸣，《黄河大合唱》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一经演出，便以其排山倒海的雄壮奔放，势如破竹的恢宏气势，展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丽图景，深情赞颂了不屈不挠顽强抵抗、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华儿女。冼星海曾这样评价《黄河大合唱》的曲与词：“在歌词本身，已尽够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的黄河的历史了。”

1939年5月11日晚，在庆祝延安鲁艺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晚会上，毛泽东对《黄河大合唱》给予了高度评价。冼星海在日记中记录，“今天是个空前的音乐会，毛主席还叫了三声好”。同年7月，周恩来自重庆回延安，听了这部作品的演出后，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抗战烽火中，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国际舞台广为传唱，成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面“有声”旗帜，激励着亿万英雄儿女挺身而出保家卫国，被评价为“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与此同时，延安锻造的风骨与革命精神成为冼星海的创作源泉，除了谱写出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之外，更有《九·一八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百余部作品流传。在党的关怀与感染下，在与人民大众的朝夕相处中，冼星海从一个爱国主义作曲者，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39年6月14日，冼星海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这天在日记中记录为“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

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多年的贫困生活加上积劳成疾，让他的肺病日益严重，1945年10月30日，这颗中国南海升起的音乐之星陨落于苏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1945年10月，毛泽东为他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时至今日，这位“人民的音乐家”的作品依旧广为流传；《黄河大合唱》已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浩气长存的歌声中，屹立于国家舞台的每次抒情赞颂，都是对中国人爱国精神的一次又一次鼓舞。

**周文雍、陈铁军夫妇：爱情在战火中永生**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空前绝后。而这刑场上婚礼的主角，就是革命烈士、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周文雍和陈铁军。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05年8月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改为铁军。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准备工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与准备广州起义。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震撼中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广州起义给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部长。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与10多倍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顽强拼搏，不怕牺牲，奋勇死战，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广州，辗转到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

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敌人逮捕。

由于周文雍在广州起义时亲自率队攻打过公安局，曾经爬墙而逃的公安局局长朱晖日提出要亲自出面审讯，以获取广州市内共产党的组织机密。刚开始，朱晖日还装出一副笑容，对周文雍声称：“按你指挥暴动的罪论处，枪毙十次都够了。不过只要你把知道的共产党组织关系都交出来，不但可以免去一死，政府还可以量才录用。”面对利诱，周文雍毫不动摇。朱晖日见此情景，马上凶相毕露，下令施刑。在经受了“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一系列酷刑折磨后，周文雍几度昏厥，但仍坚不吐实。随后，他又被架到桌子前写“自首书”，然而纸上的落笔之言全是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并表示坚定革命信念的话。朱晖日在气恼之下只好让人把周文雍架回牢房。回到牢房后，周文雍知道自己的生命不长了，就用手指上被钉竹签流出的鲜血，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一首诗：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被关押在女牢的陈铁军同她“丈夫”一样坚贞不屈，国民党当局决定公开审判和处决周文雍、陈铁军。在法庭上，法官宣读了周文雍“组织暴动，焚烧广州”的“罪状”。在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他想了一下，回答道：“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求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张相。”这是周文雍一直以来的心愿。在他和陈铁军扮成假夫妻后，两人逐渐萌生了爱情，曾想着照一张“夫妻合影”来对外掩护，但因工作忙一直未能去照。如今到了为革命献身的时候，也应该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在得知周文雍的要求后，陈铁军非常高兴。在那张留存于世的合影上，这对“夫妻”昂然并肩站立。周文雍表情严肃，大义凛然，只是由于遭受酷刑，手势有些不正常。站在他旁边的陈铁军则披着当时妇女流行的那种长四五尺的宽围巾，温柔地把头侧向自己的“丈夫”。许多看到这张照片的同志都为之深深感动。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曾带着怀念之情谈起此事，说这张照片表明了“他们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这对革命夫妻神态自若，毫无惧色，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此时，周围涌来大批围观的老百姓，陈铁军大声向人们呼喊道：“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这一年，周文雍年仅23岁，陈铁军24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的婚礼，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 **罗炳辉：戎马倥偬滇之雄**

1897年12月22日，罗炳辉出生于云南省彝良县角奎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怀着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寻找光明出路的愿望，罗炳辉跋涉千里来到昆明，加入滇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27年，罗炳辉随北伐军驻防南昌期间，聆听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讲述的革命道理，深受启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和前途。在旧军队黑暗腐败的现实面前，他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红军才能为劳苦人打天下。经中共赣西特委的引导，1929年7月，罗炳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1月，罗炳辉率靖卫大队千余人举行了著名的“吉安起义”，这次起义给“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对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发展壮大红军作出了杰出贡献。毛泽东给予罗炳辉高度评价，称赞吉安起义是“英雄壮举”，罗炳辉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

1930年，独立第五团改编为黄公略领导的红六军第二旅，罗炳辉任旅长。4月，闽西地方红军6个独立团合编为红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12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犯。罗炳辉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率部将敌主力引诱至龙岗，一举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9000余人，活捉师长张辉瓒，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围剿”，，毛泽东称赞他是“牵牛鼻子的能手”。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罗炳辉率部机智灵活地在敌军缝隙间穿插自如，红军主力利用罗炳辉调动敌军出现的有利形势，连打五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赢得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七八月间的第三次反“围剿”，罗炳辉率部佯装主力，牵敌“游行”半个月，敌军完全丧失进攻能力。主力红军抓住战机，发起猛烈攻击，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反“围剿”中的突出表现，使罗炳辉获得了“神行太保”的美称，苏区群众称他为“罗炳飞”，红十二军则被称为“双脚骑兵”。1933年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九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罗炳辉率红九军团担任主力部队的右翼掩护任务，在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付出惨重牺牲。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九军团担任警戒任务。3月下旬，罗炳辉受命率红九军团在黔北地区诱敌，独立作战50多天，牵制敌中央军和云贵川三省军阀部队10万人，经历大小战斗20多次，斩关夺隘20余处，不仅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还壮大了自己，在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红军夺取泸定桥后，罗炳辉因劳累大病一场。然而，战争没有给他歇息的时间，他带着病体，以顽强的毅力率部直插天全河，连夺两座铁索桥。激战中，罗炳辉病情加重，呼吸困难。深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给他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他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夺取天全县城，为主力红军渡过大渡河打开通道。罗炳辉带病率部与敌激战至天明，夺下天全县城。这时，罗炳辉再也支持不住了，倒地昏迷不醒，生命垂危。经过三个小时的抢救，方才苏醒。九军团成功夜袭天全，为掩护主力红军通过大渡河立下奇功，中革军委专门通电嘉奖，并赞誉九军团为“战略轻骑”。1935年6月，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九军团改为红三十二军，隶属红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罗炳辉带领三十二军指战员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三过草地，最终率部于1936年10月参加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

1939年1月，罗炳辉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5月，罗炳辉随新四军军长叶挺北渡长江，抵达皖东敌后，与皖东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战斗，为巩固和发展淮南（1942年之前称皖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不朽功勋。在淮南战斗的戎马岁月中，罗炳辉的足迹踏遍皖东的山山水水，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他用实际行动践行“做人民的儿子，为人民尽孝，为革命尽忠”的诺言，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根据地群众称他为“罗青天”。

1946年6月，蒋介石向苏、皖、鲁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罗炳辉带病奔赴战场前，自知身体不支，交代家人：“我受党长期的培养和爱护，这次重上前线，为党为人民捐躯，也是完全值得的。……我毕生没有打过败仗，在我牺牲以前，我还要再打一个胜仗，作为我对党的最后的一个献礼！”6月9日，罗炳辉带病指挥部队发起枣庄战斗，歼敌3300余人，俘敌1400余人，战斗取得胜利，枣庄人民获得解放，罗炳辉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次战斗也是他戎马生涯的最后一仗。6月21日，身患重病的罗炳辉被送往临沂后方医院治疗，至峄县兰陵镇时，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逝世，时年49岁。

# **恽代英：进步青年革命征程的“明灯”**

恽代英，原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1915年，进入中华大学学习。1921年年底，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恽代英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事迹广为流传，许多青年在他的教育和鼓舞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5月，恽代英来到黄埔军校，为了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在恽代英的领导下，黄埔军校特设政治科，安体诚、肖楚女、张秋人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政治教官。经过他们的努力，学校形成了较完整的政治教育体系。恽代英为此写了题为《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的文章，一方面充分肯定广大革命青年投考黄埔军校的热情，另一方面指出，不要抱着黄埔军校如“天国”的幻想，更不应抱着到黄埔军校是“找出路”的念头。他告诫青年，最要紧的精神，是要与命运奋斗，要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解决自己乃至于中国的问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后，恽代英便和肖楚女一道，成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凭着才智和风骨，恽代英在黄埔军校赢得了学员们的爱戴。蒋介石想拉拢恽代英，每顿饭都让副官给恽代英特别送一份，以示“垂爱”，但恽代英不为所动。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后，恽代英奉令留守广州，以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北伐战争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基础，引起了他们极度的恐慌。他们一方面用军事力量企图遏制北伐洪流，另一方面与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相勾结，妄图分裂革命阵营。在黄埔军校内，分裂分子散布谣言制造摩擦，进行破坏活动。恽代英和熊雄、孙炳文、肖楚女等同志领导学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员同他们进行坚决斗争。他提醒学员：必须预防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及其他恶势力借北伐时期摧残农工的行为，必须预防他们借一切题目来进行多年梦想的破坏两党合作的阴谋。

1927年11月17日，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委着手积极准备在广东实行总暴动。12月11日凌晨一时许，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营房吹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声。队伍很快在大葵棚集中，举行起义誓师大会。3时30分，起义的号炮、枪声响起。曳光弹在夜空划过，炮弹的红光四处闪烁。冲锋号声、枪声和战士们的呐喊声响彻云霄。教导团的士兵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如猛虎下山，冲向沙河营盘、伪公安局、敌十三军留守处……第二天，起义军占领了大部分市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庄严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恽代英在会上宣读了《告民众书》，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苏维埃政府主席为苏兆征(未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恽代英担任秘书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恽代英组织由青年学生和妇女组成的宣传队，巡回各马路，高呼口号和散发传单。他主编的《红旗》号外，刊登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告全国工农兵群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等文件。这个宣言阐述了为广大工农兵利益而奋斗的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疯狂地扑向红色政权。张太雷在前往大北门指挥战斗时，遭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12日晚上，敌人援军汹涌而至，从西、北和珠江南岸三面包围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恽代英身上。他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直到14日清晨，恽代英才随最后一批起义战士撤离广州。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恽代英坚信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他神情坚毅地对周围的同志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不承认失败的人，才有再战的勇气。

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上海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等待接头的革命同志时被捕。恽代英咬定自己叫王作林，是做临时工的。敌人见什么也问不出来，便将恽代英从上海公安局转押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1931年2月，又将他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关在“星”字号牢房之中。4月28日，恽代英面对劝降嗤之以鼻，敌人见阴谋失败，当天晚上就给他带上了重镣，并将其单独关进了“智”字号重犯牢房。恽代英心里明白，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写下了气吞山河的《狱中诗》：“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蒋介石见劝降失败，便下了手令：立即将代英就地处决。”恽圻苍说。1931年4月29日中午，监狱里的难友们正在吃饭，忽然听到过道里响起了《国际歌》，这歌声是那么的悲壮和震撼，每一位难友不约而同地望着过道，只见恽代英神色坦然，昂首挺胸，拖着沉重的脚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在监狱的菜园地旁边，恽代英慷慨激扬的演讲，使敌人惊恐万状。王震南急令行刑，可是执刑者两手哆嗦，好久也扣不动扳机，执刑官无奈，只得换了另一个看守开枪。“砰，砰……”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6岁。

**赵一曼：不负巾帼志 热血沃中华**

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至珠河（今尚志市）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特别列车呼啸而过。在这列火车上，有一间临时牢房，里面关押着一位即将被押送刑场的“女囚”。此刻，这个年轻的女人正忍受着严刑拷打的剧痛，给远在千里的儿子写下两封绝笔信。百余字中，她先后六次深情呼唤“我的孩子”，道尽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眷恋，以及一位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坚定信仰。

她就是抗日女英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赵一曼。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于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读私塾时，赵一曼在进步青年、大姐夫郑佑之的引导下阅读了《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新书刊，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1923年冬，赵一曼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6年，赵一曼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共青团地委妇女委员、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1927年初，赵一曼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中国军事学校的第一批女学员。在学校的军事化管理下，赵一曼和其他女兵们一起，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理论学习。在训练场上，赵一曼既学习了指挥作战，也能够手持步枪冲锋在山道和树林；政治课上，李达、许德珩、恽代英等教官的理论讲授，则更加坚定了赵一曼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同年9月，为了保存和培养优秀干部，党组织派赵一曼等同志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开往莫斯科的轮船上，赵一曼结识了同为黄埔军校学生的陈达邦，在相处中两人互生情愫并坠入爱河。1928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他们在学校教堂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相互扶持、共同学习，度过了一段甜蜜幸福的时光，不久，赵一曼便怀孕了。当时赵一曼患有肺病，身体虚弱，党组织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决定让她先期回国。陈达邦后来在《忆一曼》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同一曼同志在莫斯科分别时她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我建议解怀以后再回国，她坚决不同意，她说党的决定，不能还价。为了照顾她，我又建议我俩一同回国，她认为夫妻离别事小，求学的任务重大，劝我莫作此想，她的党性和原则性多么坚强……”临行前，陈达邦把一只戒指和一块怀表送给赵一曼留作纪念。赵一曼对丈夫深情道：“我看到这两件东西，就如同见到了你。” 就这样，这对新婚夫妇在结婚几个月后，便异域相隔，从此再未相见。回国后，赵一曼诞下一子，取名“宁儿”，希望儿子安宁健康。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赵一曼按照回国前与丈夫商量的办法，将宁儿送到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中抚养。临别前，赵一曼抱着宁儿在照相馆拍下了母子二人的唯一一张合影。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寇占领。为了挽救陷民族危机，赵一曼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抗战前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时的她才化名为赵一曼。1933年，赵一曼在海伦地区率领游击队作战，以两百人的兵力击溃伪自卫团五百余人，并将敌方伪团长击毙。后来，赵一曼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她领导游击队让日伪军接连退败，敌人惊恐地称她为“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密林女王”。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春秋岭战役中身负重伤，养伤期间被日军发现，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伪军将赵一曼押送到珠河县公署，关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牢房里。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听说捕获到抗联游击队员，专程从哈尔滨赶来，连夜严刑拷打两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为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又把赵一曼转送到哈尔滨关押，进行了更加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为了击垮赵一曼的意志，从她嘴里套出有用信息，敌人轮番使用鞭打、吊拷、竹筷夹手指脚趾等酷刑。面对敌人的轮番审问，赵一曼怒斥道：“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敌人希望用酷刑摧毁她反满抗日意志的企图没能达成，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往黑龙江珠河县。在去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知道此行实为赴死，她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她的孩子宁儿。她向押解她的日本宪兵要来纸和笔，写下了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高高举起呀！血红旗帜，誓不战胜，终不放手……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这就是我们的告别的歌……”行刑前，赵一曼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南国女儿的一腔热血喷洒在了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上。

战友朱新阳曾问赵一曼：“你为什么叫赵一曼呢？”赵一曼答道:“我喜欢‘一’字，所以给自己起的名字都带个‘一’字，一超，一曼，意思指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绝不改变……” 她曾在诗中写下自己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兴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生为女儿身，不比男儿弱。1962年郭沫若为了纪念革命先烈赵一曼，写下了一篇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章：“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尤存良玉踪。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

# **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由知识分子出身，投笔从戎，而最终慷慨赴死的烈士数不胜数。在这些烈士中，有一人注定因绝命诗而格外耀眼，他就是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对所信仰主义的深重之爱，对革命道路的必胜信心，都纯粹得不能再纯粹，坚定得不能再坚定，一如他勇毅决绝的革命生涯。

夏明翰，字桂根，祖籍湖南衡山县，1900年出生。夏明翰出身名门望族，自幼酷爱读书。夏明翰在很小的时候，就颇有些不平则鸣的“硬骨”。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清朝进士，从小生活优渥无忧；他又生逢大变革时代，耳闻目睹种种黑暗之现象，对新社会满怀向往。

“洋船水上漂，洋旗空中飘。洋人逞淫威，国耻恨难消。”

夏明翰小时候，跟随母亲乘外轮从武汉到九江时，亲眼目睹船上洋人对中国乘客的横蛮叱责，愤而吟就此诗。本该无忧无虑的纯真童年，却因见识到种种社会不公平，使他早早地便显露出忧国忧民之心。14岁，夏明翰的父亲突然去世，母亲陈云凤带着他投奔公公。夏明翰的祖父一心想让他读“孔孟之道”，而思想开明的陈云凤却鼓励孩子上新式学校。三代人，两种思想，纠缠交错间，也让夏明翰养成了喜欢探寻思索的性格。1917年，夏明翰不顾祖父劝阻，毅然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时隔一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攻陷衡阳城，夏明翰对吴恶行愤慨已久，便顺势写了首讽刺画配诗：“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多捞名利，身矮好屈膝叩头。”

当时，夏明翰的祖父颇有盛名，引得吴佩孚来访，并获吴亲笔手书字幅。夏明翰得知后，怒火中烧，直接撕成碎片，扔入水沟。“五四”运动风潮吹至衡阳后，夏明翰与胞妹夏明衡又将祖父收藏的日货烧了个精光，勃然大怒的祖父要将夏明翰“沉塘”，后因母亲从中周旋，才得以安然无恙。说来，夏明翰做这些事不过十八九岁，但面对大义，他血气方刚，即使与祖父公然决裂也在所不惜。

追求新世界的路，往往是最艰难的路。夏明翰与祖父决裂之后，母亲陈云凤也离开了夏家大院，另寻民房居住。夏明翰的决裂与母亲的离开殊途同归，他们抱定了信念去追寻自己的路，为不理解甚至阻碍他们的人留下了决然的身影、奋进的呐喊和酣畅的不屑。与一般革命者不同，夏明翰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因走投无路，而是完完全全地发乎追寻光明的心。他是以一个纯然决然的革命者形象屹立于历史长河中的。时移世易，当我们轻轻扫开岁月的烟尘走近他时，他的炽热如火和纯净透彻仍撼人心魄。

夏明翰从1919年组织焚烧日货到1928年被杀害，革命生涯短暂而绚烂。时间虽短，但他因认准了共产主义而生爱，并因爱而义无反顾。他太执著于所追求的主义了，以至当白色恐怖弥漫整个中国时，夏明翰仍轻蔑藐视反动派：“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1921年，夏明翰在毛泽东、何叔衡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以党员身份行走在革命道路上的7年间，他当过教员、带领过示威请愿、搞过农民运动、组织过秋收起义，工作类型繁杂多样，来回调动更是频繁无章。可他每得到一次机会，都格外尽心尽责，格外执著地工作，恨不得将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追寻理想的赤子之心把他烫得热血澎湃。

1923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指派夏明翰到湘江中学任教员，并担任学联的干事长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刊》第一编辑。对于夏明翰该段时间的工作，中共元老谢觉哉曾评价道：“党办湘江中学没有教员，调他去教数学，他没有教过数学，但为了对学生负责即是对党负责，他用心钻研，创造新教法，大受学生欢迎，成为很好的算术、代数的教授者。”

1924年，夏明翰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他把刚从广州农讲所和长沙政治讲习所毕业的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都派去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使衡阳的农民运动成为湖南农运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同湖南省委商讨秋收起义计划。夏明翰当时任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收到计划后，他第一时间投入行动，向各级党组织宣传和组织秋收起义行动。会攻长沙的计划受挫后，毛泽东率起义队伍转向井冈山，寻求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夏明翰被省委指定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以平、浏为中心，继续组织起义，配合井冈山的斗争……哪里最艰难，哪里就有夏明翰，这就是他踏入革命道路后的基本节奏，更是他革命生涯的主旋律——为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别看他出身士绅家庭，可从来没有为此而消停不前，所以，毛泽东称夏明翰“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强多了”。

不幸的是，这个比贾宝玉强多了的斗士，却终究没能逃脱无耻的背叛。1928年初，中共中央调夏明翰去湖北省委工作。同年3月18日，夏明翰从谢觉哉处得知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当他返回汉口东方旅社准备转移时，叛变的宋若林带着反动军警将夏明翰逮捕。

短短两天，夏明翰便接受了多次审讯。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庭审记录：

主审官问：“你姓什么？”夏明翰答：“姓冬。”

“你明明姓夏，为什么说姓冬！简直是胡说！”

“我是按国民党的逻辑讲话的。你们的逻辑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你们把杀人说成慈悲，把卖国说成爱国。我也用你们的逻辑，把姓‘夏’说成姓‘冬’，这叫以毒攻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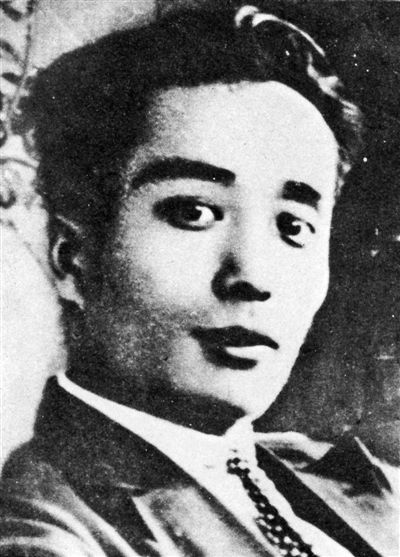
一番话,把审讯者驳得哑口无言。最终，失去耐性的敌人在两天后对夏明翰执行枪决。1928年3月20日，武汉汉口余记里，一声枪响，年仅28岁的革命者就此陨落，给人留下无尽的遗憾和难抑的悲愤。夏明翰的一生是在追求光明和真理的路途中度过的。出生于官宦家庭的背景，为他的毅然决然做了更为深刻的注脚。家庭的决裂，正义的追求，主义的执著，情感的投入，一切都在他的心中贪婪地生长着、奔涌着，孕育了那响彻时间轮轴的绝命诗句，焕发了一个纯粹革命者永恒的耀眼光芒。

惨失爱子，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创巨痛深。然而，夏明翰的死，却仅仅是痛苦的一部分：同年2月28日，夏明翰的七弟在衡阳游击斗争中英勇牺牲，时年不足20岁；夏明翰牺牲的第二天，五弟夏明震又在郴州起义运动中英勇牺牲，年仅21岁；而夏明翰的四妹夏明衡在1928年6月也光荣牺牲，年仅26岁。接二连三的噩耗，怎能不让陈云凤九曲回肠、摧心剖肝……

在狱中，夏明翰曾给母亲写了封遗书。为了安慰陈云凤，他在遗书中写道：“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当年，悲痛欲绝的陈云凤迁居衡阳礼梓山，拿出所有积蓄自建了一座学堂，培养的学生有的上了井冈山，有的走向了抗日战场。而她，则在1946年逝世，没有看到红旗飘扬的那一天……

斯人已去，缅怀依旧，历史深处的阵阵回响，恍如夏明翰烈士的含泪呼唤：“妈妈啊，我们举过的红旗正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钱壮飞：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传奇**

钱壮飞，男，浙江省湖州市人，1896年出生，1926年入党。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为党获取大量重要情报。1931年4月，他及时提供重要情报，保护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随后，他按党的要求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4月牺牲。

1931年4月25日，霏霏黄梅雨像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笼罩着南京城。华灯初上，中央路305号的“正元实业社”大楼，没有了平日的忙碌，静悄悄地矗立在夜雨中。和往常的周末一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早已无影无踪，其他人也纷纷开溜了。除了门卫，只有钱壮飞和几个机要人员留在这个中统大本营值班。钱壮飞正紧张地伏案处理着公务，突然一个年轻的机要员推开他的房门，轻轻走进来，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在桌上，又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钱壮飞搁下手中的工作，翻开卷宗瞟了一眼，里面是一份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发电处写着“武汉绥靖公署”的字样。他的眉头稍微耸动了一下，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卷宗，耳朵聆听着门外的动静。沉思片刻，钱壮飞站起身来，正打算走出办公室看看外面的动静。门外又一次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那个年轻的机要员再次送来一份卷宗。同样，还是一份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绥靖公署。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竟在半个小时内接连发来两封密电？钱壮飞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了。可是，还没等他想出个眉目，机要员又推门进来了。这次送来的卷宗里放着两封电报，信封上的字样和前两封一模一样。在以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机要员又两次送来卷宗，仍然是从武汉发来的标着“徐恩曾亲译”字样的绝密电报。钱壮飞心想：武汉那边肯定出了什么大事，才这样紧急！他赶忙插上门，取出密码本，翻译起密电来。

第一封电报刚刚译完，钱壮飞面色陡然变得煞白。映入他眼帘的是这样一行字：共匪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特务活动的黎明在汉口被捕。钱壮飞知道，“黎明”是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化名，更清楚顾顺章出事的严重性。如果顾顺章仅仅是被捕，用得着接连发来6封电报吗？钱壮飞开始加快译电的速度。译着译着，他的脸上、背上和手心都被冷汗打湿了。后面5道电文的大意分别是这样的：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押解黎明赴南京。”

“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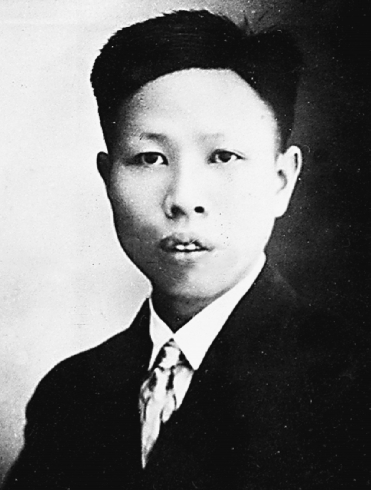
“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的消息让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中共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要落空。”

每一封电报都标着“特急”的字样。钱壮飞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

译完电报，钱壮飞让自己冷静下来。开始考虑该怎样应付这一突发事件。如果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给上海中央“特科”，党中央驻上海的秘密机关就会遭到破坏，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也将面临极大危险。钱壮飞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今晚还有一趟南京到上海的特别快车，23时开，明晨6时25分到。这是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现在已是22时，离这趟火车发车只有一个小时了。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他小心翼翼地将6封电报按原样一一封好，锁在抽屉里，又将密码底本藏到贴身的口袋里，轻轻拉开房门，走出办公室。他疾步走回隔壁自己的家。女儿钱椒椒和女婿刘杞夫正准备睡觉，钱壮飞径直推开他们的房门，没有理会他们诧异的神色，把刘杞夫叫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今晚立即坐火车赶到上海，带一个口信给舅舅：“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钱壮飞所说的“舅舅”，就是李克农。“天亮”即黎明，也就是顾顺章，“已走”隐喻顾顺章已叛变，“速转院”就是要中央立即转移。交代完之后，钱壮飞又回到“正元实业社”。坐在办公室里，钱壮飞神情凝重、忧心忡忡。明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刘杞夫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一点把握也没有。如果刘杞夫不能在明天找到李克农，顾顺章一到南京，中央各机关再转移就来不及了。何况最后一封密电已经写明：此事千万不能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这个“身边人”不正是我钱壮飞吗？看来自己的身份很快就要暴露。

必须当机立断，自己亲自赶往上海，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李克农或陈赓。想到将要失去党组织和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这个情报渠道，他不禁有些惋惜。他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和儿子。一起走吗？不，如果都走，一定会引起怀疑，应一切照常。当然，孩子是要受委屈的，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这些已经顾不得了……钱壮飞从容不迫地收拾好办公室，走出“正元实业社”，来到通讯社的发报室，让报务员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潮病重速返”。“潮”即钱潮，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只有胡底知道。他和胡底早有约定，这种明码电报是极紧急情况下通知胡底迅速转移的警报。做完这一切后，钱壮飞不再停留。马上雇了一辆车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车。虑事缜密的钱壮飞担心徐恩曾识破他的意图，会派上海方面的特务在火车站守候逮捕他，便在上海近郊的真如站下了车，绕道进入市区。长期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曾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1934年10月，钱壮飞随部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4月在贵州金沙牺牲，时年39岁。



#### **黄公略**

#### **且缚苍龙征腐恶，但酬少时留侯志**

黄公略，1898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农民家庭。黄公略的父亲黄秀峰是当地一位私塾先生，他对黄公略从小就进行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然在晚清余晖中，黄公略却偏好兵书演武，嫉恶如仇的任侠理想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少时黄公略是一个爱憎分明、两眼带刀的热血青年，当地一直流传着他见义勇为的轶事趣闻。传说少年黄公略曾见一个税警欺压民女，一时不平竟当街将其踢翻在地。面对性情如此刚烈的黄公略，父亲黄秀峰便令他抄写背诵苏轼名篇《留侯论》:“……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黄秀峰称他目前所做之事只是“小勇”，即绿林好汉的匹夫之勇。真正的“大勇”应是如留侯张良一般胸有韬略，行无双国士之所为。自此，黄公略便以张良为榜样，精习韬略，不再好勇斗狠。虽然父亲希望他能子承父业，但在民族危亡之际，黄公略内心深处仍然渴望能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业中。1915年，在新派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年仅17岁的黄公略投身入伍，参加湘军护法运动，并凭借自己出众的文化底子成为部队中的国文教员。1922年，他与彭德怀同期考入了湖南陆军讲武堂。顺利结业后，黄公略担任湘军第二师第三旅六团连长。不久后，黄公略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中。

在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前，黄公略就已经接触过湖湘学派所宣传的新学，但彼时的他只有一腔孤勇，不知革命的真正前途究竟在何方。直到北伐围攻南昌的战役，黄公略率部英勇突围，率先攻上城头。此役过后，这个尚存三分书卷气的湖南伢子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第三十团少校团副。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共产主义ABC》等共产主义译著。在教官段德昌的引导下，黄公略的脑海中开始浮现一个全新的、属于中国的赤色轮廓。1927年，黄公略考入黄埔三期高级班深造。这一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加紧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在浓重的白色恐怖氛围中，黄公略目睹了许多共产党员的变节。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国民党队伍中右派官兵麻木不仁、克扣粮饷的腐朽情状，逐渐认识到中国只有进行最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找到光明前途。因此，在革命的低潮期，黄公略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广州暴动失败后，他与同乡挚友彭德怀一同返湘组建救贫会。作为随营军校副校长，他还在军队中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练兵整备，为下一次革命起义蓄势。黄公略与彭德怀相识相知于湖南陆军讲武堂。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有着同样的满腔报国热忱。1927年，迫于白色恐怖压力，两人在相见时进行了一番试探。过程中彭德怀误以为黄公略叛变，险些将其绞死。所幸在最后关头，黄公略后鞋跟里的中共广东省委介绍信被一旁的邓萍取出，黄公略这才得救。一番寒暄后，两人对诗一首 ——“欣谈时局喜春风，柳絮飞舞庆重逢，锦绣洞庭八百里，四江精粹在湖滨”，以此表达知己相逢之喜和对中国革命前景的无限希望。

1928年，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一同发动平江起义，组织起一支力量可观的革命队伍。经此一役，彭德怀与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所率部队汇合，共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黄公略则一人指挥第二纵队留守平江，在湘赣边境开展游击斗争。黄公略率部留驻平江、浏阳一带，创建湘鄂赣苏区，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曾先后组织了毛田、鲁家湾、老乌塅、金坑等地暴动，成功消灭大量国民党驻军和挨户团，并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境内开辟了数块根据地。

在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这位素有儒将之风的红军将领依旧坚持每天读书。据当年黄公略的副官高书官回忆：“黄军长每次转移阵地带的东西里，除了离不开的辣椒，再就是一大箱子书。”除了广泛阅读外，黄公略还会总结每次大小战役的得失。他撰写的《游击战术》，是红军史上第一本游击战术理论的军事著作。1929年4月，黄公略任湘鄂赣边境红军支队支队长。其支队又于9月初与彭德怀所率部队重新合编为红五军，由黄公略任副军长。他协助指挥红五军向北开辟鄂东南地区，向南打通与湘赣苏区联系的作战行动，扩大了湘鄂赣苏区。1930年1月，黄公略调任红六军军长。他率部在赣西南地区领导发动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分散的游击区连成大块的革命根据地。在他的组织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渐成气候，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曾为此赋诗：“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黄公略彻底展现出军事指挥才能还是在第一和第二次反“围剿”。在第一次反“围剿”中，黄公略指挥部队在龙岗战役中击溃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并俘获师长中将张辉瓒。毛泽东笔下的“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这一战役的真实写照。而在第二次反“围剿”的白云山战斗中，黄公略更是以一次漂亮的伏击战赢得了毛泽东诗歌中“飞将军”的美誉。

蒋介石苦于黄公略灵活机动的指挥能力，为此不仅挟持了他的妻子与母亲，还收买了黄公略的大哥黄梅庄，让他带着1500银元和一张委任状到苏区进行所谓的“招安”。黄公略毅然拒绝了这份来自兄长的“天大好处”，并请求将大哥处死，以大义灭亲之举为全军做出了表率。在苏区革命党员的共同努力下，黄公略将怀孕的妻子刘玉英接到了苏区。黄公略向妻子嘱咐道：“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都叫岁新。”岁新，岁岁新，日日新。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黄公略寄托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念。可惜，命运的捉弄让黄公略没能与孩子相见。1931年，在一次转移行动中，为避免前方大部队被敌军空军发现，他率部主动出击，吸引火力，最终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党中央在全军范围内为黄公略召开追悼会。毛泽东用这样一幅挽联总结其一生：“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彭湃**

**从地主少爷到“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是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出身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才华横溢的他对革命事业充满热情。1922年，彭湃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海丰组织。同年，他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也因此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

 1922年6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广东海丰县的一个村庄里，来了一位陌生人，头戴白通帽，足蹬运动鞋，身着一套白学生装。这身打扮在乡村中是极稀罕的，农民都认为是收捐税的，远远地躲着他。这个陌生人就是彭湃，这是他第一天下乡向农民作实际宣传。和大多数参加农民革命的人不同，彭湃出身于富有的工商业大地主家庭，他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目睹了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1917年彭湃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希望寻求解决问题的真理。在早稻田的政治经济科，彭湃读到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到启发，认定找到了解决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钥匙。

 彭湃从日本回到家乡广东海丰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彭湃曾试图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革命，却遭到失败。这使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工农方面来。但彭湃不久便发现，虽然他们以“工农群众的喉舌”自居，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影响极为有限。为此，他感到要唤醒工农，发动工农，必须到工人、农民中去，尤其是要到占人口80%的农民中去进行实际工作。他向农民说明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帮助农民算细账，引导他们认识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他告诉农民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家团结起来与地主斗争……农民开始与彭湃接近了，但家庭的阻挠、反对与地主豪绅的攻击升级了。他号召农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示愿意拿出家产来支持农民。母亲知道后十分伤心，边哭边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家里特地花了一笔钱送他出洋留学，他回来不但不去挣钱，反而说要拿家产去运动什么社会革命。彭湃回到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他说话，好像对着仇人一样。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他入骨。大哥也以分家相威胁，但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的彭湃认定家里的财产都是从农民手中抢来的，应该归还给农民。堂兄代他领回了分得的田契，彭湃便亲自将田契送到佃户家里，可是佃户们却不敢接受，他决定采取一个更激烈的行动。1922年11月的一天，彭湃请来许多农民，当众烧毁了属于他的全部田契。这样，贫苦农民开始跟彭湃一条心，海丰的农民运动很快就发展起来。通过搞农会的实践，彭湃积累了丰富的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担任了海陆丰总农会的会长。

彭湃领导农会，从农民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入手，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让农民不受地主的骗。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农会规定学生读书不用钱，学校经费由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力、人工则由入学学生的父兄合理负担。所收粮食除去田租外，其余的作为学校经费。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中总结：这方法实行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十余所农民学校，夜校也有数间”，“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五百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

 1924年春，彭湃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赴广州领导农民运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他作为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与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随后亲临前线参战。1927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广东省海丰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马上着手进行土地革命和镇压反革命。彭湃主持制定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最早的一个土地法规。随后苏维埃政府公布《征兵条例》，颁发《妇女问题案》保护妇孺权益，并建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这个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最早的银行，它发行的货币是红色政权通过自己的银行发行的第一种货币。

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叛徒白鑫告密，彭湃被捕。在狱中他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事发后，周恩来召开了中央特科各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彭湃等人。中央特科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扮作过路人，其他人都扮成拍电影的外景摄影队，用一辆大卡车，车上装有摄影机，关键时刻用大卡车挡住囚车，再下手营救。可惜负责运枪的人没有及时把手枪上的润滑油擦去，等大家找来煤油将枪洗净，再装扮成拍摄电影外景的队伍赶到预定地点，已经错过了时间。 8月30日，敌人对彭湃施以酷刑，将他的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让党组织停止营救，让“兄弟们不要因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行刑的时间到了。彭湃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们作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声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走向刑场。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33岁的生命。

# IMG_256**彭雪枫：抗战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彭雪枫，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的指挥员、军事家。参加过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淮北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创建了豫皖苏边敌后抗日根据地，为革命立下卓著功勋。

1907年9月，彭雪枫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离开家乡，先后在天津和北京就学。求学期间，彭雪枫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等进步书籍，积极投身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在北京育德中学读书时，他号召学生以实际行动支援五卅运动，被选为育德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1926年，他转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于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北京东城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1927年春，彭雪枫参加北京南苑农民暴动，后辗转于北京、烟台、上海等地从事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尽管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彭雪枫抱着“革命是顾千家万家，不能只顾一家”“既革命就不怕危险”的坚定信念，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经受了复杂严峻斗争的锻炼和考验。

在中央红军进行的历次战斗中，彭雪枫无役不从、身先士卒，多次担任红军先锋部队的指挥员。1930年7月，在会攻长沙的战役中，彭雪枫指挥的部队首登长沙城，并两次突入敌人包围圈拯救被围在城里的部分同志。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彭雪枫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的硬仗、恶仗。1931年9月，彭雪枫担任红3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时任师长的郭炳生在我军由江西的宜黄、乐安地区撤退时，他挟持第5团和特务连迟迟不归，妄图趁机叛变投敌以逃避第四次“围剿”。彭雪枫为了挽救被挟持的战友，不顾个人安危，连行5日跟踪追赶，成功挽救了部队。为此，彭雪枫荣获“红星奖章”。

1933年，在抚州八角亭突围战中，由于意外情况，一股敌人突然冲到了师指挥所附近。彭雪枫临危不乱，仅带领一个通信排，用反冲锋打垮敌人的猖狂进攻，挽回了战场的被动局面。1934年10月，彭雪枫随中央红军长征，先后率部参与四渡赤水、夺取娄山关、吴起镇阻击战等重要战役战斗。尤其是在攻取娄山关和第二次攻占遵义城的战斗中，他率领的红13团担任主攻任务，20多个小时攻下12座山头。他还指挥部队执行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地等作战行动。彭雪枫屡建奇功，被誉为中央红军中“优秀的青年将领、模范的政治委员”。

1936年9月，奉党中央、毛泽东之命，彭雪枫以特派代表身份先后辗转西安、兰州等地，对国民党高级将领开展统战工作。他随叶剑英等秘密前往西安接洽张学良、杨虎城等巩固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不久后，彭雪枫携毛泽东亲笔信赴兰州面见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51军军长于学忠，传达我党西北停战议和、合作抗日、救国救民的殷切期望。彭雪枫与于学忠的会晤，达到了预期目的，为后续红军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10月，党又委派彭雪枫为全权代表赴晋，秘密与阎锡山谈判，争取他与我军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彭雪枫向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联合抗战主张，促使阎锡山的态度从反对到中立再到“共维大局”的转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卓越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后，彭雪枫利用其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公开身份，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党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同时用耐心和智慧说服阎锡山，使其不仅同意八路军入晋，还共同商定东渡黄河渡口和行军路线等，并提供一定的军需等物资，打开了我党华北抗战的局面，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铺平道路，开拓新的战略空间。

1938年夏，在中原告急、武汉告危的紧迫形势下，为创造苏鲁豫皖边新局面，彭雪枫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奔赴豫东，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并建立根据地。1938年9月，彭雪枫在确山竹沟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并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豫东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游击支队就发展成1.7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并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完成了初创豫皖苏敌后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彭雪枫的中原艰苦抗战，不仅率部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打退和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浪潮，创建、巩固和扩大了豫皖苏边、淮北抗日根据地，有力配合和掩护支援了陇海路北的八路军和苏北新四军的抗战工作。

1944年8月，彭雪枫率部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任务。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同敌人作战指挥时牺牲，时年37岁。彭雪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本色，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彭雪枫牺牲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哭彭雪枫同志》中深情地写道：“淮北哀音至，灯前意黯然。生平供忆想，终夜不成眠。”中共中央挽词：“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的共同挽词是：“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山河破碎，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董存瑞：“为了新中国，冲啊！”**

在河北省隆化县城北郊，有一座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他出身贫苦农家，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董存瑞参加了八路军，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灵活果决，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和1枚“毛泽东奖章”。

1948年3月，董存瑞所在连队被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十一纵队三十二师九十六团六连，董存瑞被任命为六班班长。随后，部队开展了为期50天的大练兵运动，因为训练成绩突出，六班被授予“董存瑞练兵模范班”，他本人也被授予“模范爆破手”称号。此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刚刚结束，为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和华北战场杨罗耿兵团东进，董存瑞所在纵队奉命以迅速果敢的行动，消灭国民党十三军，解放全热河，以此割断东北敌军与华北的联系。

隆化是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国民党军在此修筑碉堡群，构筑防御工事，与隆化城依托的苔山、龙头山地形相结合，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而隆化中学又是国民党军防守隆化的核心工事。要拿下隆化，必须拔掉这颗“钉子”。

攻打隆化的战斗打响了！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起进攻隆化中学的任务，董存瑞担任爆破组组长。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

战斗开始后，董存瑞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作战之前上级交付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却突然遭到来自敌军桥形暗堡猛烈火力的压制。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连续两次对暗堡的爆破行动也均以失败告终。

此时，距离发起总攻仅剩15分钟！千钧一发之际，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连长同意后，他便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敌军暗堡。前进中，他左腿负伤，但仍然顽强地冲至桥下。由于桥形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就在后续部队准备发起强攻之际，为保护战友、帮队伍杀出一条血路，董存瑞从容镇定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毫不犹豫地拉燃了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在弥漫的硝烟中，暗堡被炸毁，后续部队成功突击，董存瑞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19岁……

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的英雄壮举，点燃了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树立了一座永远的历史丰碑，正如朱德总司令的那句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 IMG_256**董振堂：“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新河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聪颖，1917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年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长逐级递升至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任第26路军第73旅旅长。1931年，董振堂被调到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思想日益倾向革命。同年12月14日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领第26路军1.7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当时红一方面军实际上只有2.8万余人，第26路军1.7万余人，比红一方面军一半兵力还要多。加之当时又处在第三次反“围剿”后的关键时刻，这一前线起义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意义十分重大。

起义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除了对国民党军队造成心理打击外，也鼓舞了中央苏区干部群众的精神士气。1.7万余人，1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2万余件轻重武器、8部电台以及大批装备物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力量得到极大加强，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人，2万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红军装备，各种物资也使处境艰难的中央苏区得到了及时补给。更为珍贵的是，起义部队带来的8部电台和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使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后来，董振堂亲笔撰写了《宁暴经过》。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董振堂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不贪恋随手可享的富贵荣华，却选择了一条“吃苦受累”的艰辛之路，坚定追随中国共产党，誓将工农劳苦群众解放到底，在这条人间正道上奔走向前。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带头撕掉了国民党军的帽花、胸章、领章，先后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屡立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旗勋章。作为土地革命时期标志最高荣誉的一种奖章，红旗勋章所嘉奖的是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而作出突出贡献的红军指战员。由此可见，董振堂为革命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功绩。1932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多年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交。捐出这么多钱的行为，在红军中传开，也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让他给自己留些钱，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在毛泽东的百般劝说下，他才留下300块银元，其余全部作为了党费。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长征。董振堂所率红5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有6.4万余人，而在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5万人左右。经过湘江战役，红5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作为红军后卫的红5军团，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一个师不足5000人。军团长董振堂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长征路上，董振堂亲率红5军团殿后。面对敌人重兵围堵、步步追击，董振堂的压力与艰难可想而知。1935年5月，在金沙江阻击战中，因缺乏渡船，为掩护兄弟部队过江，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3天3夜，到6天6夜，一直到9天9夜。不足5000人的红5军团，硬是把1万多名敌人，死死地拖在阵地前。董振堂下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在战火的洗礼中，董振堂与他指挥的红5军团，逐步形成了善打防御战、阻击战的作战风格。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红5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董振堂戎马一生，历经多次恶战，一直随军战斗，与家人分离。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5军团改称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红5军被编入西路军，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发。1937年1月12日，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敌人浴血苦战九昼夜，战至最后一人一弹。最终，董振堂和3000多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

董振堂牺牲后，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曾深情地说：“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追忆先烈，崇敬英雄，正应其时。董振堂对党忠诚，他的精神和事迹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向前，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



1895年3月，蔡和森出生于上海，后随母亲回到家乡湖南[双峰](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5%B3%B0/83086"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_blank)。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4%B8%80%E5%B8%88%E8%8C%83"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_blank)读书，期间，同[毛泽东](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B%E6%B3%BD%E4%B8%9C/113835"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_blank)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B0%91%E5%AD%A6%E4%BC%9A/1619567"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_blank)，创办《[湘江评论](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8%E6%B1%9F%E8%AF%84%E8%AE%BA/314336"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_blank)》，参加[五四运动](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5%9B%9B%E8%BF%90%E5%8A%A8/291670"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_blank)。1921年10月，蔡和森从法国归来，在中共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并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E5%A7%94%E5%91%98/12574682"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_blank)、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1017851"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_blank)秘书长。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在[广州](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B7%9E/72101"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_blank)军政监狱，终年36岁。

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周恩来同志曾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邓小平同志曾说：“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

1918年4月14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14位青春焕发、风华正茂的青年，踏着轻松的脚步，兴致勃勃地来到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里。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了。会议确定学会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章程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青年时代的蔡和森就以改造社会为初心，立志做新民、新青年。这与当前国家提倡的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行动有着惊人的相似。

1919年12月，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女友向警予一起，举家赴法勤工俭学。抵达法国后，蔡和森则以顽强的毅力，如饥似渴地阅读上百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废寝忘食地“猛看猛译”。在到达法国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不忘追寻真理的信仰初心，先后译出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一批马列著作的重要章节。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党主张：“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又给毛泽东寄去第二封6000多字的长信。这一次，蔡和森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收到他的来信后，毛泽东更是热情回复：“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蔡和森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他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0年，杨昌济临终前，给友人章士钊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人”。这“二人”指的就是毛泽东与蔡和森。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蔡和森不仅注重对书本知识的研究，而且注重社会调查，向社会广求知识。他们把向书本学习叫读有字之书，把向社会学习叫读无字之书。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这是蔡和森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蔡和森投身革命以后，就把全部精力和热忱奉献给了党的事业。他自小生活艰辛，并患有哮喘病，参加革命后，长期处于艰苦的工作和紧张的斗争环境中，经常陷于贫病交加之中，但他任劳任怨，不知疲倦地工作，通宵达旦地写作。工作累了，写作倦了，就直接横倒在床上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写作、继续工作。他的著作就是这样呕心沥血地拼出来的。

蔡和森时刻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当革命遇到挫折，个人因受到错误处分被撤销领导职务时，他也没有任何怨言，依然赤胆忠诚，忘我工作。他严守党的纪律，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1931年，他从莫斯科回国后，曾提出去中央苏区工作的申请，但还是无条件服从了组织上派他去香港就任两广省委书记的决定。当时，广东党组织遭到破坏，香港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曾有人劝他不要去香港，他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蔡和森同志一到香港，就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他冒着危险出席香港海员的一次重要会议时，不幸被捕。

蔡和森被敌人从香港引渡到广州关押。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信念坚定、壮志凌云。尽管受尽严刑拷打，但依然从容镇定地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百般折磨其肉体，摧残其筋骨，但其革命意志却愈加坚定。他鼓励狱中的同志坚持斗争，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蔡和森同志的壮烈牺牲，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坚贞的革命气节。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蔡和森用智慧和激情表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共产党人的使命。他那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永远镶刻在鲜艳的党旗上，永远激励着我们担当与前行。他，永远是共产党人的伟大楷模。他，正是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辉典范。

**瞿秋白：“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899年，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18岁时，他随堂兄瞿纯白来到北京，后考入免收学费的北洋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中，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前的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并成为冲锋陷阵的中坚分子。他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的评议员，参与学联的组织领导工作。瞿秋白与俄专同学耿济之、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郑振铎、汇文大学的代表瞿菊农商议，将3所学校组成北京学联的一个单位。瞿秋白成为他们之中主要的“谋主”，带领3校学生经常活跃在人口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

6月3日上午，瞿秋白等带领3校学生一起参加由北京20多所学校组织的大型上街讲演活动。来到内城一条街道的预定讲演地点后，瞿秋白便让同学们围成一圈，他信步站在路边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台子上，开始向过往的行人讲演：“各位先生，父老姐妹们，同胞们，我来给大伙报告一件事。这次在巴黎万国和会上，我们中国是战胜国，理应得到战败国德国的赔偿，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获得赔偿，还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青岛继续割让给日本人……同胞们，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但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但绝不可以低头！”

瞿秋白的讲演通俗易懂，鼓动性很强，很快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不少人跟着喊起口号来：“打倒卖国贼！”“团结起来，反对列强！”“……”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大批军警把讲演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气势汹汹地挥舞着警棍，驱散群众，殴打学生。这一天，他们逮捕了瞿秋白等178名参加活动的学生。爱国学生不仅没有被残酷的镇压所吓倒，反而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第二天，第三天，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被捕学生。狱中的斗争也未平息，瞿秋白被推举为学生代表，领导大家继续与卖国政府做斗争。他大声质问看管的警察：“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你们难道不是中国人吗？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警察们自知理亏，无言以对。瞿秋白鼓励同学们“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北京学生的爱国壮举，迅速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爱国运动如燎原之火席卷神州大地。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瞿秋白进一步看清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一个个令人思索的问号，一串串难以解决的问题，纷纷摆在他的面前。“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这些促使瞿秋白进一步去思考和探索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出路。

在瞿秋白心中，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使人们从彷徨走向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1920年秋，还在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听说北京《晨报》公开招聘3位懂俄语的记者去苏俄考察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到苏俄去！这个抉择立刻遭到亲友们的一致反对。亲友们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有动摇瞿秋白去苏俄的决心。他要去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10月16日这一天，是瞿秋白出发的日子。他告别同事和亲友，风尘仆仆踏上赴苏俄之路，几经辗转，历时3个月，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艰苦。不久，瞿秋白老毛病又犯了，“夜夜虚汗，咳嗽吐血”，友人力劝瞿秋白回国。但他觉得重任在肩，必须坚守阵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在苏俄2年多的时间，瞿秋白采访众多人物，上自苏俄领袖，下至平民百姓，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情况，撰写出60多篇通讯报道（其中遗失10多篇），在《晨报》《莫斯科通讯》专栏发表了40多篇约16万字，还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著作。瞿秋白用闪光的作品让国人看见了一个真切的社会主义社会，自己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2月，由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3年1月，根据党的指示，瞿秋白返回国内。他受中央委派，先后担任《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刊物的主编或编辑。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做出了有益探索。1927年，他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在湖北汉口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35年2月，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奉命从瑞金转移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在向闽西突围时不幸在长汀梅迳村被捕。当时，驻扎在长汀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负责审讯瞿秋白，他表示在中学时就拜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并心怀敬意，但对这种“攻心术”，瞿秋白直言打断：“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宋希濂的审讯无突破，南京后来多次派专人前来游说，瞿秋白最后岸然回答：“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年6月18日，从长汀中山公园往罗汉岭的路上，一位中年男子昂首徐行，沿途用中文和俄文高唱《国际歌》。行至一片草地时，他席地而坐，挺直腰板，微笑着向刽子手点头道：“此地很好！开枪吧！”这是一个革命者留给世界最后的形象：双手后置于背，目光平视于前，嘴角带着一丝从容的微笑。生命的尽头，对于他来说，只是“伟大的”休息。

他是瞿秋白，牺牲时年仅36岁。毛泽东是这样高度评价瞿秋白的：“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 **刘老庄连：抗战烽火中的英雄连队**

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决不给我们党丢脸，决不给中华民族丢脸！”这句话，出自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连部通信员的火线入党申请书。这个英雄连队的82名官兵，在1943年的淮北刘老庄战斗中全部壮烈殉国。战后，第7旅重新组建第4连，并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

刘老庄连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老红军连队：北伐战争时期，该连是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该连成为红四军主力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该连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一营一部，参加过平型关战斗，其后转隶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连长白思才，16岁加入红军，参加了长征，全国抗战初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政治指导员李云鹏，青年学生出身，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政工干部。该连战士大多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军的贫苦农民，政治素质好，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养成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定的战斗意志和熟练的战斗技能。

1943年春，侵华日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扫荡”。为掩护党政机关转移，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在刘老庄一带奉命组织防御。全连82人凭借村前交通沟，英勇抗击日伪军攻击，掩护了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全连却陷入日伪军重围。日伪军集中炮火对四连阵地进行毁灭性炮击，并以大队骑兵实施冲击。密集的炮弹呼啸着飞向连队，阵地几乎变成了火海。

然而，四连官兵在强敌面前，坚定沉着，不惧牺牲，浴血奋战。工事毁了，立即修复好；掩体塌了，马上用背包填上去；人员负伤了，包扎起来，继续战斗。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坚决拖住敌人，确保人民群众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他们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伤日伪军百余人，苦战至黄昏时，四连只剩下20多人。一整天的战斗，战士们没能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喉咙干得冒火，话都讲不出，全靠打手势。眼看最后的恶战就要来临，他们销毁机密文件，步枪上刺刀，准备与敌人展开肉搏。当敌人从四面八方向阵地蜂拥而来，战士们端起刺刀，与敌人展开搏斗。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小锹砍；小锹砍断了，就用双手掐；双手负伤了，就用牙齿咬……一场惨烈厮杀后，82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对82位烈士作出了很高评价：“全连八十二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指出：“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

# **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厅里，有一座真人比例大小的铜质群雕。群雕主体是五位八路军战士，他们衣着褴褛，手握武器，眼神中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是狼牙山五壮士雕像。

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那要从华北敌后反扫荡战斗说起。1941年9月23日，日军分三路向易县进发，妄图包围晋察冀一分区领导机关。24日，350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将分区一团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围住，形势十分严峻。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邱蔚团长根据此作战方案，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交给一团七连的两个班。

邱蔚团长说：“这么多人的队伍能否脱险，全靠你们了。你们必须在明天中午12点以前，把敌人紧紧地拖住，不让他们越过棋盘陀。希望你们利用狼牙山的有利地形，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一定要拖住敌人，保证部队和民众突围脱险。”

连长作了安排，留下六班负责掩护，他带二班去了另一个阵地。主力撤走了，黑夜的棋盘陀上只剩下六班的五名战士，他们是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

天色暗了下来，六班战士在月色下做着战斗准备，他们把留下的几箱手榴弹一束一束地捆在了一起，埋在山腰上。第二天清晨，日伪军以为一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不一会儿，上山的敌人踩响了埋下的手榴弹，随着几声巨响，一些鬼子被炸得飞上了天。硝烟散尽，鬼子又爬上山来。离阵地只有二三十米了，马宝玉一声雷吼：“打！”手榴弹一齐朝敌群投过去，炸得敌人东倒西歪。敌人的第一次冲锋打退了。

几个战士心里高兴，敌人彻底被吸引住了，这样大部队就可以脱险了。“还得把敌人往山上引。”马宝玉命令大家先分散，用冷枪吸引敌人。敌人不了解山上的情况，不敢大部队往山上冲，只是一会炮轰，一会扫射，再派小股部队往山上冲来。战士们守住要道，敌人冲上来，就被战士们打了下去，几个战士的枪法还真准，一枪一个，一颗子弹也不落空。几个战士的干粮袋已经空了，肚子饿得直叫唤，山上又没水。眼看已到中午了，敌人还是没有攻上棋盘陀，在通往棋盘陀的路上，日军已丢下了一具具尸体。战士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在中午12点以前，他们拖住了敌人，现在，他们可以去找大部队了。站在通往大部队转移的路口，马宝玉有些犹豫了。这条道自然很安全，但敌人见他们从这条路走，如果发兵追赶怎么办？这样会使大部队陷入敌人的追击之中。在他眼前还有一条道，这条路通往狼牙山的峰顶，路的尽头是悬崖峭壁。

鬼子又一次发起进攻。为了大部队安全脱险，马宝玉果断提出继续上山决定，于是带着敌人向山顶爬去。果然鬼子中了计，跟着来到悬崖峭壁上，有的被战士们一枪射过去，送了命，有的踩落岩石滑下了山崖。可是敌人已经把他们包围在山顶，敌人还在往上爬，而背后是万丈深渊。马宝玉瞄准敌人一扣扳机，枪里已没有子弹了，葛振林也对准敌人击发，也是空枪。敌人还在往上逼近，葛振林急中生智，抱起一块大石头向敌人扔了过去，石头翻滚着冲向敌群，砸得一个鬼子呼地一声就下了山崖。“用石头砸！”葛振林喊着，战士们都抱起了石头往敌群抛过去。敌人被石头砸得鬼哭狼嚎，摔下了山崖。

鬼子见战士们不开枪，知道他们是没有子弹了，又疯狂地冲了上来。六班的战士们再也没有了武器，石头也没有能搬动的了。这时，马宝玉和葛振林商量一下，就蹲下身，拿出一个小本子放在膝盖上写了起来。写好后，几个人围在了一起，马宝玉说：“同志们，我和葛振林同志都是共产党员。以前，我和葛振林同志对你们几个的照顾都不够，这次战斗证明你们已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今天，我们都要牺牲了。将来，如果战友们能找到我们，他们会在我的衣袋里，找到我们俩介绍你们三位入党的介绍信。现在，我们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党表示忠诚吧。”说完，他转身大步走向悬崖，挺起胸膛，纵身跳了下去。

战士们也跟着班长跳下去。

跳下悬崖之后，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但葛振林、宋学义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这五名八路军战士的英雄壮举迅速传遍中华大地，被赞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 **马海德：在中国救死扶伤的美国医生**

1910年祖籍黎巴嫩的马海德在美国出生。马海德的父亲是一位钢铁工人，母亲是全职主妇。马海德8岁那年，兄妹4人都感染了流感。这种流感致死率高，更是在那一年感染了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人。由于该流感致死率高，感染人数多，所以医治价格十分昂贵。

马海德家境普通，且有兄妹3个，面对高昂医药费，马海德父母十分发愁却又无可奈何。这时，一位善良的医生愿意免费为他们治病。正是这位老医生的善行让马海德有了做医生救死扶伤的念头。

带着这个梦想，马海德留学于瑞士，并在1933年从日内瓦医科大学毕业并成功取得博士学位。马海德父母得知这一喜讯喜极而泣，为自己儿子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为人父母，自豪之外还有一份安心。因为在美国，医生的地位很高，收入非常可观。

23岁的马海德已取得博士学位，如果此时返回美国，他的人生一定富足而平顺，并且他的家人父母也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满心盼儿归的父母几个月后等来的却是一封信。信上写道:我暂时不打算回国，我准备和同学一起去中国，那里东方热带流行病盛行，我要找出原因，医治病人……

谁成想，这一打算就是几十年。1933年马海德来到中国上海，刚开始在一家慈善医院工作，但是慈善医院本就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工资少的可怜。马海德为着生计着想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每天都很忙，除了治病救人他要还给医学院的学生上课。

当时的中国时局动荡，各方势力纠缠不休，社会不稳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社会环境让马海德的同学仅呆了一年便选择返回家乡。此时的马海德心里也很迷茫，他为中国当时的国情感到心痛和无力，不知道自己应何去何从。

在马海德思考人生前路之时参加了一次聚会，正是这次聚会让马海德选择坚定地留在中国。在这次聚会上，马海德认识并熟识了宋夫人和路易·艾黎等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马海德知道了自己的前进方向。

心系受苦民众的马海德意识到自己作为医生能救的中国人十分有限，他在救治病人的同时，每天都有更多的中国人失去生命。于是他选择暂时放下手术刀，决定从思想上拯救这个正在受苦受难的古老国家及其人民。

在1936年，马海德几经辗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见到了主席和总理。与两位伟人的深切交谈后，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人民生活的曙光。延安生活条件艰苦、住窑洞、吃粗粮，马海德采访期间出现了胃溃疡等状况。采访时间结束时，马海德却决定留在这里！他要参加红军，加入我国的革命队伍，在这里为当地百姓服务。

慢慢的他从乔治·海德姆变成老马，从海外友好人士变成为衷心新中国改革建设做贡献的优秀党员。革命队伍、当地农民、甚至地上跑的娃娃都知道这里有一个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马大夫。

马海德坚信不能让病人找医生，于是他在窑洞里，大树下，田间地头，甚至水井旁边为病人治病。马大夫大病小病都能治，还会接生娃娃。马海德除了医术了得还为人热心善良，有人钢笔坏了他给修，眼镜出毛病了也找他。

他还翻译英文新闻，当广播员，积极寻求国际帮助以改善延安当地的艰苦医疗条件。他的善良和热心还成就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1939年冬天，有一个女孩子高烧不止，马海德知道了背起药箱就跑，积极为病人治疗。这个病人就是周苏菲，后来成为了马海德的妻子。周苏菲自幼读书，思想进步，15岁时就作为女主角出演《海葬》。

由于周苏菲长得很漂亮，电影一面世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直以来周苏菲的追求者都很多，之后她到了延安更是被称为"延安第一美女"！

马海德对周苏菲一见钟情，开始积极追求。一年后，二人结婚。马海德称妻子为"妹子"，周苏菲叫丈夫"马"。1943年周苏菲诞下二人的爱情结晶，马海德感念妻子生育辛苦，为儿子起名周幼马。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完完全全的中国人！

马海德同志加入中国国籍后，更加不辞辛劳的在新中国医疗领域工作着。他一直致力于消灭性病和麻风病。梅毒和麻风病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一旦染上从神经到皮肉都十分痛苦。面对如此疾病，人人避之不及，就连医生也难免心存害怕。马海德却从来不怕，他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尽可能多的接触病人，并告诉医生，歧视比疾病本身更可怕。他把病人当亲人，主动抓握因患病几十年没人愿意接触的病人双手！他用一己之力对战两大传染病，医治了无数的中国病患。除了治病救人，当他知道病人家庭苦难，生计艰难，还热心帮助病人申请补贴。知道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有限，他主动活跃在国际舞台，为中国麻风病医治募集援助经费。即使在生命尽头，他依旧在病床上口述信件，寄给病人。

这样一位从心里热爱中国，并将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中国人民的中国人，在1988年10月3日永远的闭上了双眼。他的骨灰一份返回故土，一如他55年前一样漂洋过海；一份葬在他日思夜想的延安；一份被作为英雄遗骸葬在八宝山。

# **毛岸英：领袖之子，普通一兵**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安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1922年的10月，在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湖南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毛泽东亲自为其取名“岸英”，希望他能像“湘江边苍劲伟岸的大树”一样，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之材。毛岸英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虽身为领袖之子，但他从来都是以普通一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那短暂而朴实的一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耀眼的光芒。

在毛泽东所有亲人中，毛岸英无疑是遭受苦难最多的人，8岁那年，杨开慧被湖南军阀逮捕，他一同被送进了监狱，见识了牢狱的凄惨杀戮，也见证了自己母亲的死亡。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被亲友从监狱中接出，不久，便同自己的弟弟一起被送往上海，安置在由党的外围组织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在幼稚园里，毛岸英和弟弟们度过了短暂的快乐时光。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幼稚园遭到了破坏，致使毛岸英流落街头。在这期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切身体会到中国贫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也使得他比同龄的孩子早熟许多。  
 1936年底，毛岸英被送到苏联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时光。不同于儿童院的其他小朋友热衷于玩耍，毛岸英热爱看书，总是思考与军事、政治和时事相关的问题。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德战争爆发，战事的蔓延催生了许多少年的从军梦。当时在儿童院，能够上军事学校、上前线与法西斯一决高下，是许多孩子的梦想，当然也包括毛岸英。1942年5月，毛岸英带着昂扬的激情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爱好和平的人们报仇。”终于，毛岸英的愿望实现了，1942年的下半年，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毛岸英上了6个月的军事速成班，随后又转到士官学校学习。1943年毛岸英从军校毕业，被授予中尉军衔，一腔热血的毛岸英坚决要到前线去，并随部队转战欧洲战场，参加了解放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在苏联的近十年时间里，毛岸英从一个儿童成长为具有高尚革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战士，不仅学到了许多的军事知识，更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让他对战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1946年1月，24岁的毛岸英回到了祖国延安，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毛泽东身边。父子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安排他到当时陕甘宁著名的模范吴满有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毛岸英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安排，迅速整理好行李，步行去了30里外的吴家枣园。在这里，毛岸英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吴满有虚心请教各种农活，手上的水泡、身体的疲惫都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实践中，毛岸英对于中国农民和农村有了深刻认识，也是在这一年，他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毛泽东又安排毛岸英去山西临县参加土改，他写信报告父亲说：“两个月的收获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此后，毛岸英又陆续到冀中、山东搞过土改，但无论走到哪里，他从不以领袖的儿子自居，而是扑下身子努力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身为领袖之子，毛岸英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权，对于亲属他也能做到“不近人情”。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毛泽东已故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请毛泽东安排职务，被毛泽东拒绝后，杨开智又给在北京工作的向三立写了封信，由向三立向毛岸英求情，却遭到了毛岸英的拒绝。他在给向三立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帝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此外，毛岸英还向他们阐述了共产党的“人情”观，对于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人情”，共产党要发扬光大使其更加有利于人民，但是对那些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人情”，共产党坚决站在人民利益方面，即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身为领袖之子，毛岸英常在日记中这样问自己：“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去朝鲜前，他也曾问过父亲，毛泽东说：“等你回来，爸爸给你个答复。”没想到，这一去就是永无归期。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立即向准备挂帅出征的彭德怀请求入朝参战，他的想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随后，毛岸英随志愿军部队开赴朝鲜，到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在志愿军司令部，很多人知道毛岸英的身份，所以最初大家和他相处总是有些拘谨。但时间长了之后发现，毛岸英性格平易近人，并非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神秘，他不管对谁，总是和蔼可亲、十分热情，一点领袖儿子的架子也没有，大家也就慢慢地和他熟悉起来。对待工作，毛岸英时刻以一名优秀的机要秘书要求自己，严谨自律，尤其是在遵守保密规定方面，对自己要求最严。虽然他是彭德怀的机要秘书，但每次取送电报，从不往机要室里多迈半步，每当遇到译电员翻译电报，也从不问不看。白天，他和大家一起在彭总办公室工作，晚上就和机要处的同事一起睡在用稻草搭的地铺上。因为生活环境太差，每日吃粗高粱米，睡草席地铺，毛岸英的身上长满了虱子，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想过搞特权，彭德怀曾多次提出让毛岸英和他一起吃饭，都被毛岸英谢绝了。1950年11月24日上午，机要处收到了情报处送来的“明天敌机要来轰炸志愿军司令部”的破译电报。25日上午，就在毛岸英和几位参谋正在作战值班室紧张工作时，美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击中了作战室，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在朝鲜战场上的这短短34天，他保持了朴实、普通一兵的本色，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壮丽的青春。作为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是中朝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 **王杰：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王杰，1942年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196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他关心战友，视战友如亲兄弟。长途行军，王杰脚上起了水泡，浑身酸痛，但他一放下背包，先给其他战友打水烧水，帮助炊事班生火切菜，然后才休息。晚上放哨，他的哨一站就到天明，目的是让其他同志多休息一会儿。他爱护集体财产胜过关心自己。一天，工地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王杰从睡梦中惊醒。他想起工地上还放着油桶、木料等施工器材，便一骨碌爬起来，一个人冒着大雨跑到工地，一趟又一趟将施工器材全部转移到山坡上，从而避免了国家财产的损失。他帮助群众做好事，从不留名。一次王杰上街买东西，发现一个老大娘看病后缺少回程的路费，便主动掏出自己的津贴费塞给老人。老人问他叫什么，他说叫“解放军”。他勤奋工作，在执行训练、施工和抗洪救灾等各项任务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大家称为“闲不住的人”“不知疲倦的人”。他热爱学习，无论多忙多累，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要带上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拿出来认真学习，并结合工作和思想实际，写下了10多万字的日记。

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今邳州市张楼乡）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练时，在炸药包即将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关头，王杰纵身一跃扑向炸点，用身体掩护了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23岁的年轻生命。

根据王杰生前愿望，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学习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德。1965年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为他题了词。

# IMG_256**王进喜：用生命践行誓言**

王进喜出生在甘肃玉门市赤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8年，王进喜进玉门油矿当童工。1949年9月25日，玉门解放，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艰苦的钻井生产实践，锻炼了他坚韧不拔的品格。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王进喜成为贝乌5队队长。

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王进喜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贝乌5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1959年9月，王进喜被选为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王进喜到北京后，看到街上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人们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烧的是煤气。”听了这话，他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国家遭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期间，心情一直不平静。从此，北京公共汽车上的“煤气包”成为他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之源。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王进喜说：“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他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1960年春天里的一声雷，传来了我国发现大庆油田的喜讯。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大庆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3月25日，王进喜率1205钻井队到达大庆萨尔图车站。1205钻井队60多吨的钻机到了，因为没有吊车，躺在火车上卸不下来。王进喜说：“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没有吊车，咱们有人在。毛主席不是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吗？只要有人在，咱们就能想办法把钻机卸下来。”全队的小伙子们一鼓作气，从清晨干到太阳偏西，硬是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把钻机从火车上卸了下来，运到井场。又花了3天3夜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矗立在大荒原上。

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按时开钻。王进喜在钻台上握住冰冷的刹把，纵情地大喊一声：“开钻了！”正像王进喜后来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王进喜决定用水泥代替；水泥需要搅拌机搅拌，现场没有搅拌机，右腿被砸伤的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全队工人整整奋战了3个小时，险恶的井喷终于被压下去了。油井和钻机保住了，王进喜的手上身上却被碱性很强的泥浆烧出了水泡。

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没有白天黑夜地干，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会议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5个人，把他们树为大会战的“5面红旗”。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纪录。

1963年的一天，中国政府宣布：我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铁人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为了提高钻井质量，王进喜和科技人员研制成功了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

当时钻井队住房、吃粮面临困难，王进喜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保证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他还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的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这所小学后来被命名为“铁人小学”。

王进喜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石油工人。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成绩和“铁人精神”，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的号召：“工业学大庆”。

“文革”开始后，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66年12月31日，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生产的严峻形势。返回大庆后，他大声疾呼“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王进喜当选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970年4月5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王进喜在会上疾呼要恢复光荣传统，提出“大庆产量要上四千万吨，全国产油一亿吨”等一系列远大的奋斗目标。

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到解放军301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胃癌晚期。10月1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国庆节刚过，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在昏迷中，他讲的都是有关大庆油田的事。11月初，他已经不能起床，对守候在他身旁的人说：“让我回大庆看看吧，我想看看同志们，看看大庆油田。”

临终前，王进喜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同志。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王进喜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王进喜又把300块钱交给他的弟弟王进邦，断断续续地说：“看情况，我可能看不到咱妈了，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孝道吧”。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王进喜不幸病逝，享年47岁。18日，王进喜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甘祖昌、龚全珍：并蒂莲花初心红**

有这样一位将军——甘祖昌，1927年入党，1928年参加红军，历经战火洗礼，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两年后主动请辞回家乡务农，带领乡亲改变落后面貌。他的精神和事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有这样一位将军夫人——龚全珍，年逾九旬、６０年党龄、扎根贫困地区５６年，无怨无悔在江西莲花山乡，投身教育，爱心奉献。离甘祖昌将军崇高灵魂最近的她，时至今日依然在践行着一个共产党人为民、务实、清廉的不懈追求。

“我忘不了老甘临终前留下的话：‘下次领工资，再买化肥，送给贫困户。’人民给了我们荣誉，我们没有理由不为群众谋幸福。只要还能动，还能讲，就要为社会做一点事，永不掉队。”“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能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56年前，她追随信仰，跟从丈夫，返乡务农从教，无悔建设家乡；90余岁高龄，她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龚全珍，原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夫人，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

1957年8月，甘祖昌主动向组织上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职务，回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务农，龚全珍相随而归。那一年，她34岁。将军当农民，甘祖昌是新中国第一人。龚全珍完全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决定：“老甘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正像他说的那样，‘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能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从新疆到江西，全家11口人的行装只有3个箱子，却带了8只笼子，里面装着新疆的家禽家畜良种。龚全珍说：“当时走得急，生活用品老甘啥也不让多带。到了莲花，乡下蚊子多，买蚊帐、买被套的布票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当时甘祖昌每月工资330元，生活上十分节俭，把2/3的工资用来修水利、建校舍、办企业、扶贫济困。他一共参加建起了3座水库、4座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长的渠道。龚全珍全力配合丈夫，也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花在支援农村建设上。回到莲花头几年，她没有做一件新衣服。

“当农民我不合格，但老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我可以学。”龚全珍在家里呆不住。“在新疆我是老师，到了莲花我还可以去教书。”她步行25公里到县文教局联系工作，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只有3名老师，她却一点不嫌弃，第二天就搬铺盖去了学校，每逢周末才回家帮丈夫和孩子缝补衣服、料理家务。真切感受到甘将军对家乡眷恋之情的龚全珍，开始把自己赤忱的爱投入到这片红土地。1961年，县文教局安排龚全珍到同乡的南陂小学当校长，在那里一呆就是13年。后来，她又被调到离家不远的甘家小学当校长，依然还是老作风，吃住在学校，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

1986年3月，甘将军因病逝世，一只铁盒子是他留给妻子和儿女唯一的遗产，里面用红布包着3枚闪亮的勋章，那是1955年他荣获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龚全珍明白，丈夫虽然没有留下任何物质财富，但这笔精神财富是拿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相濡以沫几十载，龚全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同甘将军融为一体、须臾不分了。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龚全珍住进县光荣幸福院。在幸福院度过的5年中，龚全珍没有把自己看作被照顾对象，而是当成院里的工作人员，拿出生活费帮大伙买营养品，自己动手擦地板、补衣服……乐于伸出援手的龚全珍，自己却很少开口寻求帮助，唯恐麻烦别人。她在衣食住行、吃穿用度上始终保持着节俭朴素的作风。子女们心疼老人，给她买了几套质量好些的保暖内衣。得知一套要200来块钱，老人不停地念叨“买得太贵了”。

在萍乡琴亭镇小学，放学后，常能看到学校操场的树荫下，孩子们围坐在白发苍苍的龚奶奶身旁听她讲革命传统故事。在县老干部宣讲团，龚全珍年纪虽大，却最活跃，经常到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做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报告，很受大家的欢迎。30年来，没有人记得龚全珍去了多少地方、做了多少报告，但大家都记得，她从不要一分钱报酬，还经常自带馒头或面包，就着白开水当午饭。

从14岁离开山东老家，到1949年入党，再到1957年离开城市回山乡扎根，龚全珍这辈子与甘将军一样充满传奇色彩。但她总认为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老党员，为党工作是本分，离休不等于离岗，自己做的事情哪怕再小，都是在延续甘祖昌建设美好家乡的梦想。

曾有人这样问龚全珍：“您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安度晚年，整天忙这忙那，图个啥？”她回答：“十几年来，每次从睡梦中醒来，我都会听见老甘临终前说的那句话：‘下次领工资，再买化肥，送给贫困户’。我们图个啥？不图啥！人民用小车推出了新中国，给了我们崇高的荣誉，我们没有理由不为群众谋幸福。只要还能动，还能讲，我就要为社会做一点事。我是一名老兵，要永葆党员本色，永不掉队！”

残荷，虽失去春夏时的风采，却坚持挺住，不怕秋风的袭击，它要把最美好的东西留给人们，在挖出一担担洁白的莲藕时才倒下，它奉献了一生，人也该有这种精神。这是龚全珍老人在日记里写的，也是她最喜欢的话。

**申纪兰：处处以身作则 事事为了人民**

青青太行，劲松屹立。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自古就是要与河道抢耕地、与老天抢粮食的地方。沧海桑田。曾经撂荒的山坡上，如今或已披绿，或梯田成片……

这里有一位执拗的耄耋老者，年复一年，仍坚持着自己劳作。春天播种，下地秋收，冬天除雪，步履日渐蹒跚，但她干起活来仍充满力量。除了不时整理行装进京开会，几乎没什么能把她和普通农妇一眼区别开。

她是申纪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抗战时期，她就担任过村里纺花织布小组的组长。一嫁到西沟村，她就积极参加劳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成了副社长。这对奉行“好男人走到县，好女子不出院”古训的山里人来说，已让人刮目相看。但在她心里，有一个坎始终过不去：为啥妇女的劳动报酬要少一半？

申纪兰介绍说，按照当时的分工计酬方式，如果男人干一天活记10个工分，那么妇女只能记5个。不平等的报酬挫伤着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很多妇女只愿意干“家里活”，不愿出门参加社会劳动，而这又成为阻碍妇女地位提高的关键。

为了让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申纪兰走家串户，向妇女宣传“劳动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同时努力做男社员的思想工作，积极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开始，男社员很多不同意。申纪兰认为，只有干出成果，才能让妇女不再受歧视。

村里本来是男女共同协作劳动的。经申纪兰申请，社里专门给女社员划出一块地，和男社员进行劳动竞赛。男社员认为稳操胜券，该休息就休息；被发动起来的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始终在田间争分夺秒。最后，女社员赢得了竞赛。

这场劳动竞赛在西沟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男社员都开始支持男女同工同酬。

不久，全国妇联、山西省妇联的同志来到西沟村：一是考察；二是帮着申纪兰出谋划策。在妇联的支持下，申纪兰带领西沟村妇女提高劳动技能，还设立了农忙托儿所，使妇女能专注劳动。

到1952年，西沟村已经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一样的工分”。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983年，西沟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1984年，申纪兰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大胆进行改革。

她主张：成林和有林山坡地仍归集体管理；耕地仍然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但实行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添人增地、减人减地，确保土地不撂荒。最终，改革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适度，实现优势互补。

1985年，结合申纪兰外出考察的经验，利用当地的硅矿资源优势，西沟村建立起第一个村办企业铁合金厂，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此后，西沟村又建立起磁钢厂、石料厂、饮料厂，村办企业成了西沟村的经济支柱。

但为了响应党中央保护环境的号召，不把污染留给子孙后代，2012年，申纪兰和西沟村民决定，拆除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铁合金厂，重新寻找发展定位。几年间，西沟村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一一兴建，新产业基地拔地而起，引进的知名服饰公司开工生产。

作为唯一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通过建议和议案将老区脱贫振兴带入了快车道。中西部开发、引黄入晋工程、太旧高速公路、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等促进了经济发展；平顺县提水工程、平顺县二级公路建设、平顺县集中供热、集中供气工程等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申纪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她的“学历”是扫盲班毕业，她一辈子坚持自己只是个农民。1973年至1983年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间，她坚决不领厅级领导干部的工资，不转干部身份。女儿去省城太原看她，辛苦坐了一路卡车，她也只在单位院外匆匆见了一面，就让孩子回去了。

她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但她只把荣誉看作一种鞭策。她“勿忘人民、勿忘劳动”的话语，成了自己对人生的一种诠释。

每有团体到西沟村参观学习，她总会在西沟村的会堂给大家介绍：半个多世纪里，在党的带领下，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申纪兰说：“我的话，就是一个农民对党的恩情由衷的感激。”永远跟党走是申纪兰不变的初心。“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立党为公，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申纪兰说，“按照党的要求干，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笔耕不辍 见证中国**

# 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2005年6月逝世。1917年他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8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并任香港《南华早报》、《孖刺报》编辑。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和宣传新中国诞生的活动。

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六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今日中国》总编辑、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等职。

他热爱中国，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和挚爱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其回忆录《见证中国》中他这样写道：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爱泼斯坦两岁到中国，在天津度过童年和学生时代，15岁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目睹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使他逐步走上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1936年，在听斯诺讲述访问延安的印象后，他深为感动。爱泼斯坦后来忆及斯诺对他的影响：没有他我就不会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去……如果没有他，我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也可能会是截然不同的。

1938年，爱泼斯坦在广州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宋庆龄，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40多年的共事与友谊。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首部著作《人民之战》，以第一手的报道和观察，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民头两年的抗战业绩，他在书中坚信：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斯诺称道：这是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理解中国的希望而写成的。

1944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当年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是中外记者团及随后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认为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重庆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的多年封锁，终于被突破了。这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中外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写了几十篇通讯，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这次延安之行令爱泼斯坦终身难忘，在几个月的采访中，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不辞辛苦，探索真理。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他说：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不久他发自延安的通讯在印度汇编成书出版，在序言中，他说：在中国边区，人民为建立新型的民主而斗争，他们为整个亚洲照亮了新的道路。

1945年至1951年初，爱泼斯坦夫妇在美国，他担任《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妻子邱茉莉编辑进步月刊《聚焦远东》。他们时常发表介绍中国革命的文章。爱泼斯坦先后完成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和《中国劳工札记》两本书。他们不顾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积极投入进步活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1951年他们应宋庆龄邀请回到中国。在宋庆龄指导下爱泼斯坦1952年参与创办了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现更名为《今日中国》），为执行编辑。1979年被任命为杂志社的总编辑，退休后仍担任刊物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来他为这本杂志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记者，他仍然追踪与记录新中国和世界的变迁。在这风风雨雨的记者生涯中，他在文革动乱中，也蒙受过冤屈，有五年被囚禁狱中。但他没有动摇过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1973年初，获平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参与了参政议政活动。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他更致力于传承宋庆龄的精神与事业，热情支持宋庆龄基金会及中国福利会（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他受宋庆龄生前的嘱托，为她作传。他以10年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完成了50多万字的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1985年4月20日为庆祝爱泼斯坦70大寿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亲临祝贺。10年后为他庆祝80寿辰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也亲临祝贺。200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登门看望他，200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登门问候他。在他晚年以惊人的勤奋与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回忆录：《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在其最后一章夕阳之歌里他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病逝。他的妻子至今仍保存着爱泼斯坦当年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和入党申请书。泛黄的纸页上，一个个英文单词背后，是一颗火热的中国心。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

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奋斗的红色画卷，有这样一位“把一切献给党”的兵工英雄。作为我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他的一生与共和国的枪炮制造史同行，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铮铮誓言，书写了一曲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时代赞歌。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坚定精神信念。对党绝对忠诚不是一句口号，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吴运铎正是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一个人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并无限地忠诚于这个理想，他就能经受任何风雨和困难的考验。”“假若我有来生来世，我还要选择中国共产党，永远跟党走，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的铿锵誓言，穿越时空回响在我们耳畔。

出生在安源煤矿山脚下的吴运铎，家境贫寒，自幼便懂得分担家庭重担。他曾上山挑煤、捡煤渣，还到煤矿当机电工人。9岁时，吴运铎加入儿童团，参与把风、放哨、送信等活动。资本家的剥削和战争带来的苦难，像烫红的烙铁给他留下刻骨的印象。在苦难的生活中，他逐渐认识到：要翻身、要解放、要光明，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抗日战争爆发后，吴运铎毅然参加了新四军。被派到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后，他在农舍的茅草棚里开始了兵工生涯。对当时的吴运铎来说，兵工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他坚信，投身革命队伍，就要跟党走、听党的话。1939年5月，吴运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矢志不渝，践行自己的承诺——对党绝对忠诚。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我国的兵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抢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遇到危险总是冲在最前面。

1941年，吴运铎率领小分队生产一批急用子弹。有一次，他正在拆卸收集来的旧炮弹引信上的雷管，突然，一只雷管在他左手上爆炸了……数十年后，他回忆说：“我知道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我要亲自做这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危险的时候，应该站在大家的前面，不能把危险的工作推给别人。”吴运铎一生多次负伤，经历过20余次手术，身上遍布100多处伤痕，体内留有几十块弹片，腿上的关节长期被石膏绷带固定，已经硬化，走起路来都是直的……但他凭借顽强毅力，始终坚持战斗在生产科研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经历挫折时，依然坚定理想信念；面临生死抉择时，用行动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1951年9月30日，吴运铎作为特邀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当晚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握着吴运铎的手说：“你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虽九死其犹未悔”可以被视为对吴运铎这位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最好的注脚。在党和人民面前，他早已抛却个人生死，将生命的分分秒秒，熔进革命的火炉，融入建设的大潮。

　　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为国铸剑。

　　当时，兵工生产条件极其简陋。把水井的辘轳固定在一个支架上，井绳上吊一块100多公斤的铁疙瘩，就成了锻打枪体、炮弹壳的“手摇汽锤”；在磨粮食的石磨轴上，套一条粗布缝制的传送带，就成了“人推发动机”；将手电筒灯珠磨出一个口往里面塞火药，一通电就成了“电发雷管”……就是在这样的“铁匠铺”里，吴运铎等人建成了我军第一个军械修造车间，并首次制造出步枪和第一批平射炮、枪榴弹；制造出42厘米口径、射程可达4公里的火炮；研制了拉雷、电发踏雷、化学踏雷、定时地雷等多种地雷；在只有8个人的条件下，年产子弹60万发……

　　为了制造武器、确保前线作战顺利，吴运铎几次走在死亡边缘，但是死亡的威胁从来没有阻挡他前进的步伐。1947年9月，在大连甘井子一个名叫老虎牙的山洼里，“轰”的一声巨响让山坡外的人们心头一惊。巨大的爆炸气浪把时任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引信厂厂长的吴运铎抛向空中，甩到了20米外的海滩上——当时是在试验新炮弹，吴运铎冲上前去查看一枚未爆炸弹时，炮弹突然炸开了……这是吴运铎第三次被炸成重伤。

　　和平年代，他夙夜在公，为党尽心。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历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主持多项兵器科学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吴运铎来说，只要能为党多做一点事，再苦再累也很幸福。就像他自己说的，“即使自身化为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让伙伴们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

　　离休后，吴运铎在青少年教育和残疾人帮扶事业上投入了大量心血。他拖着残弱的身子，到机关、工厂、学校等地作报告上千次，听众多达10万人。住院时，他把病房当课堂，接待少先队员过队日、共青团员上团课。在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吴运铎鼓励病残青年学习知识和技能，生产自救，提高自身素质，创建美好未来。

1983年病重期间，吴运铎立下遗嘱：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存骨灰。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他仍然眷恋着祖国、眷恋着党。他把生命的光和热全都献给了深爱的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终点也无怨无悔。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保持共产党员的廉洁本色，是吴运铎始终信奉的人生信条。

20世纪50年代后期，周恩来指示给吴运铎调拨一辆小轿车，有关同志选了一辆英国制的高级轿车，吴运铎却坚持换成便宜车。车配好后，他也坚持只在必要时使用，平日上下班都是挤公共汽车。他腿上受过重伤，视力也很差，大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自己却笑着说，坐不坐专车是个小事，丢了勤俭节约的老传统可是大事情。离休后，吴运铎仍然参加不少社会活动，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他只有实在挺不住了才到医院治疗，而且只住普通病房。一次住院期间，吴运铎的体重已经过轻，医护人员多次动员他转干部病房，可他坚决不同意，还说：“我参加革命，并不是把自己存在银行里，打算捞一笔优厚的利息。”

吴运铎最后一次回到所里，是1981年离休前。出发前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到所里后看了看老同事，看了看熟悉的办公大楼，饭都没吃就乘公交车离开了。老伴陆平在照顾他的过程中摔伤，有同志建议请组织安排人员来护理，被他严词拒绝：尽量不为自己的事给组织上添麻烦，这算是我唯一的贡献了。

在给张海迪的信中，吴运铎提到，“只有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的精神才永远是充实的。这理想，就是为人民的幸福、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而献身。”是的，吴运铎的一生都是在坚守这份远大而崇高的理想。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生命，奉献了所拥有的一切。任时间流逝，时代变迁，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精神不会暗淡，而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光芒闪耀，激励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英勇无畏，大公无私，拼搏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时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时传祥，1915年9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他迫于生计逃荒到北京，背起粪桶当了一名生活在最底层的“粪花子”，饱受了粪霸的剥削压迫。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为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市政府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其它行业，而且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使他感到了尊重与平等，对党充满感激。他竭尽全力带领环卫工人为市民服务，提出“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口号。在那些年里，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主人翁的姿态，以“搞好环境卫生，美化人民首都”为己任，肩背粪桶、走家串户，不分分内分外，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5年，时传祥被评为清洁工人先进生产者，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并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全国“群英会”。1959年10月26日，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握着他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时传祥激动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从此，时传祥工作更加勤奋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作为“青年掏粪班”班长，他对青年职工言传身教，用自身在新旧社会的经历教育培养青年，帮助他们闯过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他的事迹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通过新闻媒体传遍北京、传遍全国，也传向了世界。

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国庆观礼，作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周总理在招待宴会上为其敬酒。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惨遭迫害，被诬为“工贼”“粪霸”批斗。1971年秋，被赶回山东齐河县老家。1973年8月，毛主席、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他接回北京，并在生活上予以安排照顾。

1975年5月19日，时传祥在北京病逝，终年60岁。

时传祥是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环卫事业，把自己的工作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崇高精神，在平凡的环卫岗位上无私奉献了一生，为首都的环卫事业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他向人们生动诠释了劳动的光荣和生命的价值，为后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

# IMG_256**麦贤得：钢铁战士钢铁人生**

# 何为英雄?是当人民、国家处于危险之时,不惧艰险,挺身而出,解黎民于倒悬,救国家于危难,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人。许身国威壮河山，在1965年“八六”海战中担任611护卫艇机电兵的麦贤得当如是。

麦贤得于1945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汫洲镇一个普通船民之家。解放前，苦难深深笼罩着麦贤得一家。他的祖父饿死，伯父被恶霸活埋，父亲曾遭日本海军烧船、毒打。在这种物质条件非常拮据的情况下，麦贤得毅然尽自己所能，为家庭生计挑起重担。麦贤得的母亲对家中九个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总是教导孩子要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爱党爱国的种子在麦贤得兄妹心中逐渐生根发芽。后来，麦贤得一家四个兄弟、一个姐姐参军，将热血和青春奉献给祖国。麦贤得的大哥已在部队当兵，他的母亲仍坚持把排行老二的麦贤得送去部队，让儿子参军报国，由此可见麦贤得一家拳拳报国之心。曾有人这样评价麦贤得：“欣赴海军雄艇，誓当机电精兵。练就高强本领，养成英勇作风。”也是因为这样的好家风，才培养出麦贤得敢于胜利、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

1964年3月麦贤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任海军某艇机电兵。他克服文化底子薄的困难，勤奋钻研电机专业，他放弃了不知多少个午睡、节假日，经常一个人躲在山顶上，拼命地记诵，对生疏的术语、复杂的原理、无尽的数据艰辛地一个个去弄懂。在军事训练中，他同样严格要求自己。老战士都有一项在无照明条件下转油柜的训练，这项训练对新战士不作要求。但麦贤得却坚决要求参加，老同志在练，他就跟着看、用心学，他还经常请老同志出难题考验自己，练就一套较娴熟本领。  
　　1965年8月6日凌晨2时51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在东山岛附近的海面正式打响。麦贤得当时在611号护卫艇做机电兵，他在战斗中抢修意外停车的后左主机时，被弹片击中右前额，一块弹片，烙铁一样扎进了麦贤得的头颅。这块弹片，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发现从右额骨穿进，深入麦贤得的颅内二寸，最后插进左侧的额叶。当即，流出的脑脊液和血，一下就糊住了麦贤得的眼睛，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副指导员周桂全替他包扎好伤口时，他苏醒过来，嘴里已发不出声音。他焦急地用右手推开周桂全，左手指着机器。周桂全命令他原地休息。可副指导员刚刚离开机舱，他就以惊人的毅力挣扎着站立起来。  
　　在弹片插入头部、脑浆溢出粘住睫毛的情况下，他坚持战斗3个小时，凭着平时练就的“夜老虎”硬功夫，顽强地守着战斗岗位。在剧烈摇晃的机舱里，他穿梭检查一台又一台机器、一根根管路、一个个阀门、一颗颗螺丝钉，在几十条管路、数千颗螺丝里，检查出一个只有手指头大小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麦贤得坚守岗位3小时,直至将“剑门”号击沉,战斗胜利结束。他向战友们伸出两个手指示意着胜利,便昏迷过去。

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接见参战有功部队的代表时，周恩来总理关切地问：“这次不是有一个轮机兵，头部负了重伤，还一直坚持战斗3个小时，现在怎么样?”在领导人的关怀下，麦贤得从汕头被接到广州紧急救治。经历了四次脑部手术，一直插在他脑颅中的弹片才被取出，并且植入两块有机玻璃片代替部分头盖骨。这两块有机玻璃片，也一直完好无损地伴随麦贤得生活至今。他也因此被称为“钢铁战士”。出院后当弹片造成的后遗症一直如影随形，麦贤得除了语言功能和记忆力严重受损之外，还一度出现右边身子瘫痪，更为严重的是不时造访的癫痫症。

麦贤得虽然康复，但头部重伤给麦贤得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他的智力大大衰退，语言障碍尤其明显。四次脑手术使他失去了很大部分的记忆，但是他念叨的最多的三句话是“为人民服务”“要拥护共产党”“我是一个老兵，也是一个小小螺丝钉”。他恍惚间说出如此至真、至诚之语实在令人动容。  
　　麦贤得为人正直，他始终认为他的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他的名字和形象就是荣誉和影响，他个人无权随意使用。他曾说过：“如拿着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去换取金钱，就等于叛变和堕落。”近10年来，麦贤得一直服用汕头市某制药厂生产的“脑力宝”药丸，记忆功能有所恢复，过去时常发作的癫痫明显得到了控制。于是，该厂便找麦贤得，请他为“脑力宝”药丸做一例电视广告。麦贤得说：“该药丸在我身上的疗效固然不错，但不一定在别人身上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因我是战斗致伤，病例特殊，目前社会上绝大多数癫痫都是由病理及生理因素导致的，所以我不能为你们做宣传。”  
　　英雄不老，晚照情浓。在晚年，麦贤得积极发挥余热，每年都主动参加军地各种公益活动，到部队、学校、企业、厂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还受邀担任多所大、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多次到广州番禺名智小学、汕头市东厦小学、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汕头大学等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让自己的母校——广东省饶平县阱北镇阱北小学有书读、读好书，他省吃俭用，筹资购买书柜、桌椅和各类书籍，创建了阱北小学“英雄图书馆”。每个暑假他都会定期为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描绘海战场景、讲述战斗故事，告诫年轻同志要好学上进，鼓励他们树立崇高的人生追求，实现个人价值，努力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

麦贤得重伤不下火线，他的事迹被写入中小学课本，编成电影和电视节目，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饶平县汫洲镇汫北小学原校长麦思齐，同时也是“麦贤得英雄事迹展览馆”的馆长，九旬老人始终站在宣传麦贤得英雄事迹的第一线，他说：“每个学期，饶平县的中小学都会组织师生来这里参观交流，鼓舞学生们向英雄麦贤得学习。在学校，我们也会用‘英雄精神’的符号来进行评优，这样能传承英雄精神，对他们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 IMG_256**孟泰：一座永远矗立在职工心中的雕像**

孟泰，1898年出生，河北丰润县人。1926年到鞍山，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鞍钢炼铁厂配管组组长、技术员、副技师、设备修理场场长、炼铁厂副厂长等，多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67年9月30日在北京离世，终年69岁。

孟泰已经走了近50年了，但在鞍钢，甚至在鞍山，孟泰几乎无处不在。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办公楼前矗立着孟泰塑像，雕像正面是胡耀邦同志的题词：孟泰精神永放光芒；鞍钢还有孟泰纪念馆，全面展示了孟泰的先进事迹；2014年落成开馆的“鞍钢展览馆英模厅”，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孟泰；在鞍钢炼铁总厂即孟泰曾经工作的地方，还办有《孟泰报》，给优秀职工颁发孟泰奖章；在鞍山市立山区有孟泰公园，公园正门矗立着孟泰全身塑像。在鞍钢，孟泰精神一直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在鞍钢，新职工入厂，鞍钢有关部门都要组织他们参观孟泰纪念馆，学习孟泰事迹，感受“孟泰精神”。孟泰有很多先进事迹，给新职工留下印象最深的、最让他们为之动容的，是孟泰的英雄壮举。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辽宁作为重工业省成为支援前线的大后方，而鞍钢更是重中之重。战争一爆发，孟泰就参加了护厂队，他将行李搬到工厂，吃住都在工厂。只要拉响防空警报，孟泰就拎着管钳子站在高炉旁，用生命护卫着高炉。而他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一旦敌机轰炸，高炉出现损坏，他就能立刻投入抢修。

1950年8月中旬的一天，一座高炉发出一连串的巨响，孟泰意识到，发生严重事故了。高炉被烟雾笼罩，浓烈的硫磺味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喘不上气。孟泰拎着管钳子就往上冲，一点点摸索着查找事故原因，终于在高炉西南角的出铁口处找到了原因。原来，这里有一处炉皮钢板烧穿了，火红的铁水像瀑布一样飞流而下，与顺着炉皮淌下的冷却水相遇，便发生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孟泰与相继冲上来的几名职工迅速关闭了冷却水的开关，接着将还在淌着的冷却水引离炉皮，使冷却水不再与铁水相遇，爆炸止住了。摄氏1000多度的铁水与冷水相遇，烟雾弥漫，噼啪作响，爆炸声此起彼伏，这已经够吓人，而更让人难以预料的是，高炉随时有爆炸危险。孟泰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冲向高炉排险，将生命置之度外，是真英雄。

孟泰冒着生命危险排除险情的英雄形象永远定格在鞍钢职工的记忆中。也就是从这件事后，孟泰有了“老英雄”的称号。

鞍钢根据孟泰的先进事迹，将“孟泰精神”概括成16个字：艰苦奋斗，爱厂如家，无私奉献，为国分忧。鞍钢将“孟泰精神”作为企业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孟泰精神”转化成职工的具体行动。

1949年6月27日，鞍钢成立后的第一座高炉投产。这座高炉修复所用的零部件全是孟泰他们拣来的和职工捐献的。

这就是孟泰的艰苦奋斗、爱厂如家精神。从1997年开始，鞍钢工会将“孟泰仓库”定为“星级孟泰仓库”、“集团公司级孟泰仓库”，年年进行检查评比，鼓励职工将废旧部件、料头等回收，修旧利废，将学孟泰具体化。这个评比不断扩展，后来，发展到评比“回收箱”“节约箱”，让每一名职工都能参加到活动中来，让每一名职工都可成为孟泰艰苦奋斗、爱厂如家精神的践行者。

孟泰几十年与高炉循环水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创造了“眼睛要看到，耳朵要听到，手要摸到，水要掂到”的维护操作法。这个操作法被命名为“孟泰操作法”。从1994年开始，鞍钢工会会同有关部门开始总结一线工人中的先进操作法，并用工人的名字命名，现在，这种以工人名字命名的先进操作法已达325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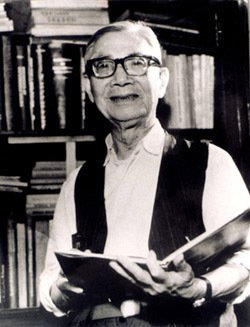
孟泰是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在“孟泰精神”的鼓舞和带动下，鞍钢学先进、争先进蔚然成风。新中国成立以来，鞍钢累计产生各级劳模5700多人，其中有156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光荣称号。

近几年，由于受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鞍钢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鞍钢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尹利说，当前的形势迫切需要鞍钢的先进模范人物勇敢地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也迫切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大力发扬“孟泰精神”、劳模精神，激励全体职工为鞍钢实现全面腾飞团结奋斗。

要像先进模范人物那样，坚定理想信念，与鞍钢一道为夺取最终胜利而努力工作；要像先进模范人物那样，艰苦奋斗、爱厂如家，立足岗位，深挖潜力，降低成本，多创效益；要像先进模范人物那样，刻苦钻研，勇于创新，不断对标同行业一流水平，争做创新创造的先锋，为提高鞍钢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企业贡献聪明才智；要像先进模范人物那样，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孟泰没有走，他永远是鞍钢职工中的重要一员。“孟泰精神”已成为“鞍钢精神”，孟泰之魂已成为鞍钢之魂，他是一座永远矗立在职工心中的雕像。

**茅以升：用一生奋斗，构筑共和国的坚韧之桥**

1896年，茅以升出生于江苏镇江。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一座小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也压在了年少的茅以升心里，少年立志：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

那时的茅以升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就是共和国最坚实的“桥”。1919年，茅以升成为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工科博士，主攻桥梁专业。他博士论文里关于桥梁的见解，被世界桥梁专家称为“茅氏定律”，因而荣获卡耐基梅隆大学颁发的金质研究奖章。

同年12月，24 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茅以升这样评价自己的读书生涯：“这14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

1933年3月，已是天津北洋大学校长的茅以升同时接到了两封来信，不约而同地说起了同一件事：邀请茅以升到杭州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一座大桥通南北，早已是两岸百姓多年的心愿。可是，在潮高多变、流沙无底的钱塘江造桥，谈何容易？“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座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造的。”茅以升说，“钱塘江大桥，我们中国人要自己修，证明我们中国人有能力修好这座现代化大桥，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干，我们不比别人无能。”他毅然从北洋大学辞职，前往杭州专心造桥。

1934年11月11日，大桥举行开工典礼。随后的几年里，茅以升为大桥日夜忙碌，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技术创新，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难题。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在战火纷飞中，茅以升带着工人们加快进度建好了桥。可是，战局突变，新生的钱塘江大桥马上就面临着要被炸毁的命运。修桥不易，但修好的桥不能留给日本人。茅以升拿出了设计图纸，在十四号桥墩上画了一个圈。那是用来埋藏炸药缺口，“必须把桥墩炸掉，要炸就要炸彻底！”在大桥开通的89天里，超过100万难民和士兵踏着预先埋好的炸弹通过大桥转移，转移军需物资也超过了大桥造价。这是世界桥梁史上绝无仅有的，极为悲壮的开通典礼。1937年12月23日，日军从北面攻入杭州，钱塘江大桥赶在日军到达江边之前起爆了。茅以升挥泪作下《别钱塘》七绝：陡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终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1938年除夕，茅以升慨然立誓：“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

1945年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亲自主持修复大桥，1953年，钱塘江大桥重新通车。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通车后的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毛泽东这样赞美这座万里长江第一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在他眼里，桥不仅是工程，也是文化。他在中外报刊发表重要文章200余篇。其中《中国石拱桥》一文入选中学课本，将充满中国人民智慧结晶的桥文化呈现给了无数年轻学子。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任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87年，91岁的茅以升最后一次登上了钱塘江大桥。此时，他已是1500度高度近视，只能看到恍惚人影。上桥后，茅以升蹒跚地摸着桥栏杆，默默无语。女儿茅玉麟回忆：“我就陪在旁边，看见他眼珠一直在转，应该是他想聚光，想再看看桥，看看钱塘江，看看这一切。”

桥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和桥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茅以升感叹“人生一征途尔，其长百年，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容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

1937年8月，香港的破旧出租房里，传来了孩子的啼哭声，容勉之看着刚出生的儿子，遥想着常年奔波的苦难生活，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就给孩子取名叫“国团”，国家团圆，日日兴旺。

容国团的父亲是海员，常年漂泊在大海上，收入微薄。小小年纪的容国团十分懂事，在母亲忙碌时，他会帮忙做些家务，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回家时，容国团唯一的乐趣就是缠着父亲，听那些海上见闻。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容国团身形瘦弱且矮小，为了锻炼他的身体，父亲开始教他打乒乓球。容国团第一次见到小小的球在父亲手中“跳舞”，在空中划过美丽的弧线，瞬间对它一见钟情。打乒乓球成了他唯一的爱好，每天球不离手，渐渐地他的球技越来越好，成了学校里的小乒乓球王。

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时局动荡不安，父亲带着家人四处逃难，生活越发困顿。流亡的日子里，容国团辍学了，15岁的他成了一名鱼行的童工。生活再也没有了书香气，萦绕在鼻端的都是鱼腥味，繁重又机械的工作没有压垮容国团，因为父亲是香港公会成员，容国团得以进入公会俱乐部练球。那段时间，乒乓球成了他唯一的慰藉。每次打球前，他都会换下一身的脏污，洗干净手，才拿起心爱的球拍，他认真钻研球技，就像父亲所言，只要刻苦，都会成功。天赋加上勤学苦练，容国团很快在公会打响了名气。功夫不负有心人，1957年2月，在香港乒乓球锦标赛中，20岁的容国团代表公会参赛，一举夺得了3项冠军。同年4月，在与日本世界冠军狄村的对战中，容国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凭借精湛的球技，他把狄村打得落花流水，震惊了围观的群众，这下，整个香港都认识了这个天才少年。

一战成名后，容国团的比赛机会多了起来，但并没有改变他窘迫的生活现状，父母身体不好，他只能辗转各大赛场，拿着微薄的薪水，为了热爱的乒乓球，他苦苦地煎熬着。直到有一次，比赛前，对方教练找到他，希望他可以打场假球，只要输了，就给他一笔钱，那是一笔巨款啊，足以让父母颐养天年。容国团握紧了球拍，手里的乒乓球沉甸甸的，好像再也无法承受，他愤然拒绝了，球场上快准狠地打击对手。毫无疑问，他又赢了，却失去了最初参加比赛时的热情。他不明白自己在坚持什么，打球的意义又是什么？在前途迷茫时，父亲告诉他，如果你真的想打球，回内地吧，那里会有你自由发挥的空间。一句话点醒了容国团，他思虑良久，最终决定接受广东体委的邀请，回归祖国的怀抱，这才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如父亲所言，在这里容国团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因为他之前已经名声在外，回归后更是受到了优待，成为了国家队的一员。每天有专人陪练，他又回到了当初刚刚打球时的状态，不间断的训练让生活变得更充实，从而也大大提高了他的打球技巧，队员们笑称他为“八臂哪吒”，无论球从哪个方向来，都逃不过他的手心。体能训练尤其痛苦，每天都要进行拉练跑，容国团咬牙坚持了下来，无论寒风酷暑，都可以看到他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他的体能越来越好，身体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很快，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了，容国团终于可以代表国家队出战了。比赛前夕，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父亲承诺，一定会拿回冠军奖杯。比赛的前半段，中国首次闯入四强，振奋了国人，周总理亲自发电慰问，大家都在期待着，但是，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随行的队友被一一挑落，到最后决赛时，容国团成了仅存的中国选手。

这是中国第一次离世界冠军如此接近的时刻，而容国团的对手是曾在团体赛中胜过他的世界冠军西多。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赛场上的人们屏住呼吸，生怕打扰了他，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容国团非常淡定，比赛前他专门理了头发，挑选了一身舒适的衣服，安静地擦拭着自己的球拍，那是陪伴他无数日夜的伙伴，他们彼此信任，互相托付。赛场上，面对西多的强势进攻，容国团不慌不忙，他利用体能上的优势，不断攻击西多的死角，拖垮了西多的行进轨迹，最终不负众望，以3:1的优势打败了西多，夺得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

容国团真的火了，他是民族的英雄，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大家都在为他欢呼，回国时，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从此，乒乓球一跃成为“国球”，大人孩子争相模仿他，那一年，他才22岁，美好的生活刚刚起步。之后，他受命担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教练。容国团认真分析每个队员的特点，针对性提出了训练方案，经过一段时间魔鬼式训练，他终于带着这群娘子军，打败了盘踞冠军宝座长达8年之久的日本，一举把中国乒乓球推向了世界。作为队员，作为教练，他都是认真负责且成功的。

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全国，局势动荡不安，体育届也不能幸免，无数人面临着被打压的危险，中国乒乓球队员的身影也从赛场上消失了。因为海外的比赛经历，使得容国团面临着被批评的风险，曾经的光环如今成了致命的毒药，在如此困难的时刻，母亲的去世让他悲痛欲绝，但他顽强地挺过来了，他坚信，心爱的乒乓球会再度发光，热爱的祖国会越来越好。

每日的斗争让他精神衰竭，家人的陪伴成了唯一的安慰。就在这时，同为乒坛名将的傅其芳和姜永宁因不堪受辱，以死明志，这成了压垮容国团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意志被瓦解，已经无法仅从身边人的安慰中找到生存的意义。1968年的一个夜晚，容国团和妻子吃了最后一顿饭，陪父亲聊了一会儿天，逗了逗女儿，孩子笑得很开心，她已经很久没有被爸爸抱过了。容国团放下孩子，摸了摸她的头发，转身离开了家，出门散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僵硬地倒在一棵树下，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我的名誉胜过我的生命。”那年，他还不过31岁，生命已经戛然而止。一代乒乓球名将就此陨落，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家人深刻的痛。1978年距离他的离世已经过去10年了，国家体委为容国团恢复了名誉，并将他的骨灰移送至革命公墓安葬。

遗憾已经无法避免，希望他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他热爱的祖国，如今也越来越好，现在的繁华盛世如他所愿。

# IMG_256**屠呦呦：青青蒿草 拳拳报国**

1971年10月4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研究员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前面的190次实验都失败了，紧张与期待交织在每个人心中。终于，结果出来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实验室沸腾了，课题组组长屠呦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是青蒿素发现史上最为关键的一步。这一天，注定被历史铭记。

44年后的瑞典颁奖典礼上，屠呦呦凭借对疟疾治疗作出的突出贡献，为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捧回了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项，也让中药在世界的舞台绽放光芒。对此，她总是说，“研究成功是当年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诗经》古老的诗句，仿佛冥冥中已注定屠呦呦与青蒿素的不解之缘。正如青蒿这一不起眼的菊科植物，看似普通却藏有能拯救性命的巨大能量，屠呦呦数十年如一日执着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低调无闻，但她和团队的发现却在全世界治愈了两亿多饱受疟疾折磨的患者。

受喜爱读书的父亲影响，年幼的屠呦呦喜欢在书房翻看医书，对中草药有着浓厚的兴趣。16岁不幸患上肺结核休学两年的经历，让屠呦呦心中治病救人的梦想更加清晰。几年后，她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原名“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后改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

1967年，中国启动旨在研究防治疟疾新药的“523”国家项目。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屠呦呦临危受命，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当时科研设备陈旧、科研水平不高，不少人认为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屠呦呦铿锵有力地说，“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自此踏上寻药之路。她广泛收集历代医籍，查阅群众献方，请教老中医专家。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收集了2000多个方药，在此基础上精选了包含640个方药的《疟疾单秘验方集》。在第一轮药物筛选与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不高，还不及胡椒有效果，研究一度陷入僵局。

“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屠呦呦的坚持带动着大家，厚厚的医书被翻得书角卷起。

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治寒热诸疟的药方进入了屠呦呦的视线：“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陷入沉思，为什么古人用“绞取汁”，而非中药常用的煎熬法？经过周密的思考，屠呦呦重新设计了研究方案，对青蒿设计了用低温提取，控制温度在60摄氏度以下，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分别提取，将茎秆与叶子分开提取等方案。

课题组日以继夜地研究，终于在1971年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100%的青蒿提取物，并在次年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

那时中国的科研环境十分艰苦，实验室设备简陋，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任务时间又很紧迫。为加快提纯速度，课题组“土法上马”，用七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来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没有防护装备的科研人员接触大量对身体有害的有机溶剂，出现了各种程度的病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乙醚中性提取物有了，进行临床试验时却又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否则就要再等上一年。”屠呦呦说。为了确保青蒿素用于临床的安全性，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屠呦呦等科研人员甘当“小白鼠”，以身试药，住进了东直门医院，最终证明药品无明显毒副作用。

　对于她的选择，丈夫李廷钊既心疼又理解：“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她一辈子都是这样。”为了不影响工作，屠呦呦咬牙把不满4岁的大女儿送到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送到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由于长时间骨肉分离，“女儿当时接回来时都不愿叫爸妈”，这也成为屠呦呦心中的愧疚。1973年，青蒿素片剂在海南开始进行临床验证，效果却不理想。屠呦呦发现片剂很硬，怀疑崩解度出了问题，于是决定用青蒿素单体原粉直接装胶囊，病人血内疟原虫转阴，证实了青蒿素的疗效。在屠呦呦顽强信念的带领下，在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协作支撑下，课题组克服艰险，砥砺前行，圆满完成了抗疟中药研发的国家使命。1999年，世卫组织将青蒿素列入“基本药品”名单在世界范围推广。

疟疾、艾滋病和癌症一起，被世卫组织列为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已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法，过去20多年间，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凭借青蒿素研究的突出贡献，屠呦呦获得2011年度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被授予“共和国勋章”……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屠呦呦十分平静，她更关心的是青蒿素耐药性问题，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咱们不是为了得奖而得奖，要实际拿出来一些东西，使青蒿素能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健康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更美好。这是党的十九大赋予我们的新时代历史使命，也是中医药工作者的担当。”屠呦呦说。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屠呦呦唯一的博士生王满元说：“屠老师这个岁数的人对事业依然执着坚定，心无旁骛，她的信念感带来内心的淡定，就是要坚持做这个事情。”

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中国科学家把青蒿素这件宝物挖掘出来，将希望的光芒照亮世界遭受疟疾病痛的角落。青青蒿草，拳拳报国，初衷不灭，医治万民……她在诺贝尔奖获奖致辞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这位耄耋老人一直时刻准备着，为人类健康造福。屠呦呦说：“荣誉的根本问题是责任。荣誉多了，责任也大了。中医药确实是‘伟大宝库’，应该把它更多有价值的成果发挥出来，为人类造福。”

# IMG_256**常香玉：戏比天大 忠心报国**

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村常香玉故居，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喷气式飞机模型特别引人注目。这是“香玉剧社号”飞机模型，是常香玉家国情怀最具代表性的体现……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家庭，为了不当童养媳，９岁起随父学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常香玉取百家之长，集豫剧之大成，融合豫东、祥符各调，并吸收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唱腔，形成了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常派艺术。

为了让戏“顺民心，反映时代”，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一起，在改造传统题材的同时，积极演绎现代戏。所改编的《拷红》《白蛇传》《大祭桩》等传统剧目，成为常派艺术传世之作；《朝阳沟》《李双双》《红灯记》等现代戏的探索，让常派艺术焕发出新光彩。

从艺70年，常香玉共演出剧目100多部，在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穆桂英、李双双等经典妇女形象，使豫剧从一个地方戏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

“戏比天大”、德艺双馨是常香玉一生的承诺和追求。常香玉和她带领的剧团一直坚持“三三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为最基层的观众和官兵巡回演出。

1951年，全国上下掀起抗美援朝热潮，常香玉迸出这样一个念头：在全国巡演、义演，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飞机。常香玉的弟子、今年82岁的韩玉生回忆，巡演、义演出发前，常香玉卖掉了剧社的运输卡车，把自己所有的首饰及多年积蓄拿了出来，还把自己的3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半年时间里，她带领香玉剧社成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这件事，极大鼓舞了当时全国军民的爱国心。

1953年，常香玉又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慰问演出。1959年，常香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香玉剧社号”飞机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成为凡人壮歌的永远见证。

2004年6月1日，常香玉因病逝世，享年81岁。2004年7月，国务院追授这位豫剧大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常香玉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荣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人去声尚在，清香犹伴人。“常香玉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爱国义举，一直为世人所敬仰；她艺不惊人誓不休的执着、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为戏剧界树立了一座丰碑；她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南河渡村支部书记张继伟说。

如今，常香玉故居，这个由四孔窑洞、三间平房组成的农家院落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上万人前来瞻仰、学习。



# **黄继光：舍身忘我 英勇无畏**

黄继光（1931年-1952年10月20日），出生于四川中江，于1951年3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5师135团9连原通讯员，曾立三等功一次，后于1952年10月20日在朝鲜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牺牲，年仅21岁。战争结束后，他被追授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授予“特级英雄”称号。

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开始向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北山高地发动疯狂进攻。上甘岭位于五圣山上，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联合国军心窝的一把钢刀。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联合国军动用两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连续发动了进攻。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952年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的第2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必须在天亮前占领阵地，为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奠定基础。联合国军设在山顶上的集团火力点，压制住志愿军反击部队不能前进。营参谋长命令第6连组织爆破组炸掉它。第6连向敌军发起五次冲锋，未能摧毁敌军火力点，而且一个又一个战友倒下去。这时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时间就是生命。在这关键时刻，站在营参谋长身旁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他掏出早已写好的决心书交给参谋长，恳切地说：“把任务交给我吧，只要我有一口气，保证完成任务。”黄继光在决心书上写道“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营参谋长转过身，沉思片刻，面对黄继光坚定地说：“黄继光，这次任务就交给你。我任命你为第6连第6班代理班长，一定要完成任务。”参谋长当即任命黄继光为6班班长。黄继光接受任务后，立即提上手雷，带领两名战士向敌军的火力点爬去。他们在照明弹的亮光下巧妙地前进，当离敌军火力点只有三四十米时，一名战士牺牲，另一名战士负重伤。黄继光的左臂被打穿，血流如柱，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毫无畏惧，忍着伤痛，仍然一步不停地向敌军火力点前进。在距敌军火力点八九米的时候，他举起右手将手雷接连投向敌军，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地堡内的机枪又突然疯狂扫射，志愿军反击部队的冲锋受到阻止。这时，黄继光再次负伤倒下。天就要亮了，这时黄继光身边已无弹药，身体又多处受伤，他顽强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刹时，敌军正在喷吐的火舌熄灭，正在吼叫的机枪哑然失声。黄继光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高喊着"冲啊！为黄继光报仇！"踏着黄继光爬行过的道路，很快占领了阵地，全歼守军两个营。

为表彰黄继光视死如归、无畏惧的伟大精神，1953年4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中国共产党志愿军第15军委员会在追认他为"模范团员"的同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名字和光荣事迹镌刻在上甘岭背后五圣山上，英雄的壮举与巍然屹立的五圣山永世长存。他的家乡中江县石马乡改名为继光乡。

**焦裕禄：人民的好公仆**

焦裕禄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短短的42年，却感动了几代中国人。

每年的焦裕禄逝世纪念日和清明节，位于河南兰考的焦裕禄陵园和位于山东博山的焦裕禄纪念馆内，人们从全国各地自发前来，祭奠、怀念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被逼上吊自杀。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天，他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回到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在焦裕禄的主动要求下，他当了民兵，并参加了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年1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加区武装部工作，领导民兵坚持游击战。之后，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来到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年6月，焦裕禄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曾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6月任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区。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3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焦裕禄从到兰考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6年，河南省政府追认焦裕禄同志为革命烈士。同年，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利用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树制作乐器、家具等，也成为兰考致富奔小康的一项重要产业。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今天的兰考，群众收入持续增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乡面貌显著变化，曾经外出逃荒的兰考人开始坐高铁外出务工、旅游，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兰考来投资兴业。

焦裕禄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财富，留给家人良好的家风。他的儿女们都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如今，已60多岁的二女儿焦守云把主要精力放在讲述父亲的事迹上，她说：“宣传好焦裕禄精神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缅怀。”

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殁了，精神还活着。焦裕禄，这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如一座丰碑，矗立在兰考，矗立在中国大地，矗立在亿万百姓心中。

# IMG_256**雷锋：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长沙县](http://ren.bytravel.cn/Celebrity/index2356.html)望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是一个在苦水中泡大的穷孩子。其祖父、父亲、母亲、哥哥、弟弟都被-折磨死了,他不满7岁就成了孤儿。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经常出去讨饭、砍柴、挑水、放牛。有一天，他到地主的山上砍柴，地主婆抢走柴刀,凶狠地向他砍去。在他手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痕，也在他内心深处种下了对阶级压迫的深仇大恨。由于苦难生活的磨炼，他比同龄少年成熟得早一些，滋生了-精神。他帮助当地进步人士贴革命标语，宣传人民解放。1949 年8月,长沙解放了,他获得了新生，积极参加儿童团、少先队的活动。1950年夏,乡政府免费送他入学校读书。先后在东山庙小学、清水塘完小、荷叶坝完小读完高小。他放弃了去县城读中学的机会，主动留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安排到乡政府当通讯员。

他对党和人民的关怀照顾十分感激，决心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以报答共产党的恩情。在小学，他是优秀少先队员。在村里，他是扫盲夜校的好教员。在乡里，他是领导和同志们十分喜爱的通讯员。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推荐到县委当通讯员和公务员。1957年4月加入共青团。在县委书记的教诲下,他开始领悟一颗普通的螺丝钉对于革命大机器的重要意义，决心自己的一生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永远闪闪发光。

1957年冬,望城县委决心根治沩水，开垦团山湖，打一场水利建设的硬仗。他积极请战，被调到治沩工程指挥部当通讯员。他不顾自己个头矮小，参加抢险战斗，保卫国家财产的安全。他带头捐献钱物，为水利建设添砖加瓦。他在工地板报上宣传“一滴水、一线阳光、一颗粮食、一颗螺丝钉”的作用的观点，以表达自己“为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加美丽”的志愿。他刻苦钻研农机技术，驾驶[铁牛](http://ren.bytravel.cn/history/2/tieniu.html)耕耘在团山湖新农场的土地上，成为望城县第一代优秀拖拉机手。

火热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激荡着人们的心房，他渴望为祖国的繁[荣昌](http://ren.bytravel.cn/Celebrity/index716.html)盛贡献力量。1958年夏季，他主动请缨，到遥远的东北[鞍山](http://ren.bytravel.cn/Celebrity/index351.html)钢铁公司当一名推土机手。火红的岁月，火红的青春，新时代，新生活，交相辉映，放射出灿烂的光采。离别团山湖农场时, 黄丽姑娘怀着依恋的心情赠他一个精装日记本,在扉页上留言，称赞他有外在美和内在美， 羡慕他的干劲和钻劲，鼓励他勇往直前。“希望你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中把自己的全部的光和热献给全中国全世界。让人们都知道你的名字,使人们都热爱你,敬佩你。”他确如青年朋友所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业建设第一线，无私地奉献着自己全部的光和热。在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他是一名不知疲倦、超额完成任务的推土机手。在新建的焦化厂,他是青年突击队员。其事迹传遍全鞍钢。他以“不受百炼，难以成钢”的人生信念支配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相信真正美好的青春永远属于力争上游的人。鞍钢一年多时间里,他获得先进工作者、红旗手、节约标兵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达20多次。

1960年1月8日,他应征入伍,到[沈阳](http://ren.bytravel.cn/Celebrity/index228.html)军区某部接受人民军队熔炉的锻炼。他在当兵第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立志做一个[毛泽东](http://ren.bytravel.cn/history/maozedong.html)时代的好战士，把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在新兵连，他被大家称为“标准的战士”。在汽车连，他以钉子般的挤劲和钻劲,刻苦学习[毛泽东](http://ren.bytravel.cn/history/maozedong.html)著作,勤奋钻研业务技术,成长为一个“ 我活着就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无不体现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感情。助人为乐、甘当无名英雄更是渗透到他生活的里里外外的品格。1960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此， 他“变得更加坚强，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和远大”, 决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他的名言,也是他立言立行、做人做事的人生准则。在两年多的军营生活中,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获团、营嘉奖多次，还被评为艰苦奋斗的节约标兵、共青团[抚顺](http://ren.bytravel.cn/Celebrity/index348.html)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沈阳](http://ren.bytravel.cn/Celebrity/index228.html)部队工程兵模范共青团员和模范共产党员。1961年7月当选为[抚顺](http://ren.bytravel.cn/Celebrity/index348.html)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作为班长,他率领四班成为一个优秀集体,受到上级的表扬。他是部队党委表彰、人民群众喜爱的模范人物。

1962年8月15日上午,在完成部队一次运输任务中,他不幸因公殉职，为革命献出了22岁的年轻生命。噩耗传开,少先队员们对模范辅导员的牺牲痛哭不已 , 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悲痛万分。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全国迅速兴起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热潮。雷锋精神人人传颂，家喻户晓。[周恩来](http://ren.bytravel.cn/history/zhouenlai.html)题词高度概括了雷锋精神：“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他的故乡更名为“雷锋公社”（今雷锋镇）。在[长](http://ren.bytravel.cn/Celebrity/index229.html)[沙市](http://ren.bytravel.cn/Celebrity/index731.html)、抚顺市建立了雷锋纪念馆 ,宣传他的业绩和精神。他在1958年至1962年写的120篇日记，被成《雷锋日记》出版。他的名字传遍大[江南](http://ren.bytravel.cn/history/8/jiangnan.html)北、长城内外， 成为时代精神的代名词，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1990年2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 号召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继续学习和弘扬雷锋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

# **“两弹一星”先进群体：精神之光 永不熄灭**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大楼三层，有两所办公室始终被保留着。一所是力学所首任所长钱学森的办公室，另一所是首任副所长郭永怀的办公室。

钱学森、郭永怀，他们都属于一个被历史铭记的英雄群体——“两弹一星”先进群体。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将自己的余生贡献给这片他热爱的土地。

回国后，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等。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很兴奋。”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回忆上钱学森的课，仍然记忆犹新。在那几期培训班的学员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推动了“两弹一星”和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

早一步归国的钱学森数次写信给同门师弟郭永怀：“快来快来，我们拼命地欢迎你！”

郭永怀归国后，便投身于我国“两弹一星”的建设。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在完成第一次热核弹头试验准备工作返回北京时，因飞机着陆失事不幸遇难。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胸前保护着完好无损的装有绝密实验资料的公文包。

像钱学森、郭永怀这样的前辈科学家还有很多，他们有人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与工作条件，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也有人隐姓埋名数十载，风雨兼程，为攻克科研技术难题而通宵达旦；还有人甚至为科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科学家们白手起家、攻坚克难，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科技奇迹，让“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1964年10月16日，沙漠深处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

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两弹一星”是不朽丰碑！它筑起了新中国的安全屏障，也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打下牢固根基。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作为共和国长空利剑的铸造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始终不忘初心，赤胆忠诚，求真务实，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为祖国和人民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著功勋，他们的名字与功勋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伟大事业铸就伟大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勇攀高峰。

# **“南京路上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

６１年前，前身为华东军区特务团辎重连的八连，开进了昔日“冒险家的乐园”，执勤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从战场到“十里洋场”，脚穿草鞋的八连官兵时刻铭记“两个务必”，经受住了与硝烟弥漫的战场同样严峻的考验，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爱民之师的崭新形象。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１９６３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凌晨，一夜未眠的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好八连”事迹报道，挥笔写下这首后来名扬天下的《八连颂》。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一个连队题词并写下颂歌。他在诗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星移斗转，伴随着大上海的沧桑巨变，“好八连”官兵早已告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如今，走进八连，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军营：设施一流的多功能俱乐部，藏书6０００余册的图书室，每３人拥有一台电脑，宿舍有电视，饭堂有空调、消毒柜、烘干机……

大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在给八连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八连带来许多挑战。面对严峻而现实的考验，八连始终注重用党的创新理论培养教育官兵，坚持不懈地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确保了政治上的绝对合格。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八连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建连育人的第一要务，让党的创新理论与官兵“天天见面”，把大上海改革开放巨大变化作为官兵理解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生动课本。连队学习室里设有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专柜，连有理论学习宣传小组，班排有理论学习辅导员，战士人人有连队印制的理论学习口袋书，坚持做到日读一篇理论文章，周有一次专题辅导，月有一次体会交流，季有一次学习讲评，年底组织一次考核表彰，不断培养官兵观察问题有眼光，认识问题有层次，处理问题有办法。

艰苦奋斗是八连的传家宝，艰苦奋斗精神早已渗透进八连一代代官兵的血脉里。如今，象征八连勤俭节约好传统的理发箱已传到第３４代，木工箱、补鞋箱已传到第３３代。

 在八连，连队电话亭边印有“时间就是金钱，请珍惜分分秒秒”的提示语；电脑打印机上，贴有“每人节约一张纸，希望小学的学生就多个练习本”的字条；饭堂墙壁上，悬挂着“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警句。

草鞋、自糊信封、针线包，曾是象征“好八连”艰苦奋斗精神的“三件宝”。今天，八连官兵又有了新的“三件宝”：学习包、Ｕ盘和利于科学消费的阳光卡。

  驻扎在寸土寸金闹市区的八连，营区空地少，射击训练难以展开。副连长彭瑞林利用节假日时间，每天往返３０多公里路程，向同济大学的电子学、机械学、光学教授虚心求教。由他研制成功的轻武器射击模拟系统，在上海警备区科技练兵成果交流会上荣获一等奖。

    把高新技术训练场作为艰苦奋斗的主战场，把成才报国作为当代军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已成为今日八连的“连训”。

２００７年８月，八连奉命千里机动至皖东某训练基地进行野战化训练，这是八连时隔４３年，又一次走出大都市，开赴大山沟。全连官兵以“与作战对手抢时间比速度的急劲，跟自己过不去的狠劲，永不服输的拼劲，倒也要向前倒的冲劲”，苦练走、打、吃、住、藏，高强度开展抗敌电磁干扰、重火炮袭击、与炮兵协同配合等多种战术训练。实兵演习中，八连官兵顶着炮火，一路冲击，第一个将连旗插入“敌”阵地，受到南京军区表彰。

从２７年前开始，每月２０日这一天，伴着黄浦江畔浑厚的晨钟声，八连官兵身背工具箱，走上南京路，义务为南来北往的行人服务。后来，南京路周围１００多家单位的４０００余名团员青年仿照八连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无偿为群众理发、修伞、裁衣、钉鞋……从未间断的每月２０日“便民服务日”成了南京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长宁区的胡红根，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两腿萎缩，不能行走。３６年来，八连官兵照顾他理发、洗澡、看病等日常生活起居。当年，胡红根叫八连官兵“叔叔”，如今，八连官兵已喊他“叔叔”。

 一个个爱民佳话，流传在南京路的高楼大厦里，流传在大上海的里弄和石库门里。从人民广场到世博园、从浦东国际机场到地铁一、二、七号线……多少年来，上海的市政重点工程建设规划到哪里，八连的旗帜就飘扬到哪里；哪里的任务最重，哪里就有八连官兵奋战的身影。

正是在与上海人民一道书写与时俱进崭新篇章的过程中，八连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建设者”证书，赢得了上海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览上，专门辟有反映八连先进事迹的橱窗；在火车站前的画廊里，八连战士文明执勤的巨幅照片镶嵌在最醒目的位置；在上海大学研究生院，八连现任指导员黄森被研究生们聘为“人生导师”……

 在上海各界，学习“好八连”的热潮从未间断。翻开市民公约，里面有“学习好八连”的条文；反映“好八连”事迹的课文，被收入小学生德育教材。１０年来，八连干部战士应邀为社会各阶层作报告１３０多场……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好八连”事迹展览馆每年都迎来天南海北数以万计的参观者。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俊、上海市党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学研究会会长吕会霖评价说：“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鲜艳的旗帜，如同东方明珠、世纪大道一样，已被上海人民视为这座城市闪光的精神名片。

# **孔繁森：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

孔繁森，山东聊城人。1961年，17岁的孔繁森光荣参军，在部队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6年9月，孔繁森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他从部队复员后，先当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

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并写下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

在西藏地区工作面临着很多困难危险，二十多年前的援藏工作，很多党员干部视为危途。

1979年，孔繁森担任日喀则地区岗巴县委副书记。

在岗巴工作3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克服了家庭困难，攻克了生活关、语言关和环境关，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到拉萨担任副市长。

到任仅4个月的时间，他就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奔波操劳；

为结束尼木县续迈等3个乡群众易患大骨节病的历史，他几次爬到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水源处采集水样，帮助群众解决饮水问题；

了解到农牧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后，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一个医疗箱，买上数百元的常用药，工作之余就给农牧民群众认真地听诊、把脉、发药、打针，直到小药箱空了为止。

孔繁森第二次进藏期间，拉萨遭遇了五十年一遇的雪灾。孔繁森冲在救灾的第一线，他留下一封遗书，写道:“我在哪里发生了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进藏后他又留下豪迈誓言:“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

援藏期满后，孔繁森本可以回到家里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但西藏自治区党委要求他延期工作，到条件更艰苦、海拔更高、任务更艰巨的阿里地区去工作。

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地广人稀，常年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最低温度达零下40多摄氏度，每年7级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望而却步。

1993年春天，年近50岁的孔繁森赴任阿里地委书记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遍了98个，行程达8万多公里，茫茫雪域高原到处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在孔繁森的勤奋工作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上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7%。他为了制定把阿里地区的经济带上新台阶的规划，准备在最有潜力的边贸、旅游等方面下工夫。为此，他曾率领相关单位，亲自去新疆西南部的塔城进行边境贸易考察。

回顾孔繁森的三次选择，孔繁森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前头，把国家的利益放在最前头，把个人的困难、得失、名利都置于身后，无一不令人动容，那是对党忠诚的最好诠释。

1994年11月29日，他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

在孔繁森的葬礼上，悬挂着一副挽联，形象地概括了孔繁森的一生，也道出了藏族人民对他的怀念：“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人们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

一是他仅有的钱款:8.6元：

二是他的“绝笔”—— 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正如孔繁森在一首诗中所写，他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像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样地纯洁，那样地深沉，那样地博大。他始终践行着自己挚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 IMG_256**王伟：中国海空卫士**

王伟，浙江湖州人，生前为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中队长。2001年4月，王伟在对美国军用侦察机的跟踪监视中，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惜将血肉之躯献给大海，为自己年轻的生命画上悲壮的句号。

2001年4月1日早上8时36分，一阵战斗警报声骤然响起。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冲刺般跑向战机，紧接着，战鹰仰首直刺海天，上升高度，调整航向，空中编队，向目标飞去……

几分钟后，王伟和赵宇发现左前方有一架大型飞机。他们向目标接近，很快判明这是美国的EP－3型军用电子侦察机，正向我海南岛三亚外海抵近侦察。

王伟、赵宇迅速调整航向，驾驶战鹰与美机同向同速飞行。美机在外侧，突然大动作转向，向王伟的飞机撞压过来！美机左机翼外侧螺旋桨将王伟驾驶的飞机垂直尾翼打成碎片。王伟的战机发出一阵惨烈的怒吼，呈右滚下俯状坠落。此时，长机赵宇难以相信，从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王伟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他还在继续驾驶着已经完全失控的战机。1秒，2秒……8秒，9秒……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王伟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战机悲壮地扑向大海，激起冲天巨浪，竖立起一座尊严的丰碑。

“飞向蓝天”，是王伟从小融入血脉的信念。还是一名中学生时，王伟就在日记中写道：“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正是这种追求，使他放弃了报考地方大学的机会，放弃了具有发展潜质的艺术特长，放弃了难得的经商机会。

1986年6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在飞行训练中，他精益求精，不断向飞行训练的高水平跃升。部队每次改装新机种，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

短短几年间，王伟凭着对飞行事业的热爱和忠诚，练就了熟练掌握三种新型战机的过硬飞行本领，成为一名守卫祖国南大门的海天骄子。

在15年飞行生涯中，王伟苦练精飞，不断书写着一个个骄人的“第一”：

在飞行学院同期学员中，他第一个放单飞翱翔蓝天；

在飞行部队3次装备更新中，他每次都是第一个担负战备值班任务；

在同一批飞行员中，他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成为能飞4种气象的“全天候”飞行员；

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

直至2001年4月1日，王伟用忠诚飞完生命的最后航程，这一个个“第一”戛然而止。

2002年清明节，王伟魂归故里，王伟烈士墓和雕塑在浙江安贤陵园落成。人们从未忘记英雄王伟。在浙江安贤陵园，沿着平缓的山路一路而上，在“功勋苑”石碑后，排在最前面的第一个墓地，就是王伟的烈士墓；王伟墓前，鲜花堆得满满的，每一束，都是对英雄深深的思念。

英雄从未远去，王伟的精神永生。我们永远记得，有一个编号，叫作“81192”；有一个英雄，叫王伟。

# IMG_256**王瑛：永远的巴山红叶**

“我是得罪了很多人，但我从没得罪纪委书记这个称谓。”这句让无数干部、群众动容的话，出自王瑛之口，她生前曾担任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在担任四川省南江县纪委书记的几年里，王瑛直接牵头查办各类疑难、典型案件50多起，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1961年，王瑛出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童年的艰苦生活让她对人民群众有着质朴的爱。1982年，王瑛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巴中工作。在这片被红军鲜血浸染的革命热土上，她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坚定了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王瑛上任南江县纪委书记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2003年3月，南江一名在“扫黄”中被拘留询查的年轻女子，在一派出所留置室内自杀。一个月后，一封举报信转到县纪委，信中举报派出所某民警在办案中玩忽职守、致人死亡，却逍遥法外。由于有关部门已经对案件作出结论，在纪委内部的案情分析会上，有同志建议应付一下算了，但王瑛坚决不同意。由于涉案人员多是政法干警，反调查能力强，取证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但王瑛和同事们日夜奋战，曾连续5天5夜没有睡觉，与主要涉案人员反复谈话，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间，各种阻力接踵而至，指责、谩骂、威胁不绝于耳，但是王瑛始终保持沉着冷静，鼓舞一线办案人员。在上级纪委的支持下，真相终于浮出水面，1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党纪政纪处分。

在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王瑛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她常说：“惩处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教育和挽救干部才是我们的天职。”她提出了纪委工作服务社会发展大局的“五个零”工作方法，改善了南江的投资软环境；她提出设立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制度的设想，使村级信访案件占全县案件的比例大幅下降。

王瑛还始终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她曾为住房与耕地被河隔在两岸、每天只能赤脚过河到对岸种田的洋滩村村民，建了一座铁索桥；她曾用自己荣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得到的2万元奖金，资助贫困的农村孩子读书；她还为南江的“背二哥”们建起了宾馆和餐厅，让这些贫困的苦力人不再风餐露宿。

王瑛常常对同样也是干部的丈夫说：“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公共权力，是人民群众让我们保管的。如果用权力谋私利，就是对人民的背叛！”她担任南江县级领导多年，一直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先后多次拒收礼金，甚至拒绝了亲弟弟要她特殊关照的要求。

2006年7月，王瑛晕倒在抗旱救灾第一线，同事们将她送到医院后发现，她已是肺癌晚期，医生诊断她最多只能再活半年。但王瑛坦然面对病痛与不幸，拒绝了上级组织为她调换工作的好意，而是以加倍的赤诚和热情扑在工作上。在之后的两年零四个月里，除去10多次化疗时间，她都在工作第一线，有194天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和案件查处现场。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正在重庆接受化疗的王瑛中断治疗，一路颠簸500多公里赶回南江，立刻带领县纪委的干部奔赴救灾一线，确保国家的救灾款物发放到位。2008年11月，王瑛因过度劳累，病情恶化，在前往医院治疗的途中不幸去世。许多认识她的干部、群众听说后，自发从各地赶来为她送行，悼念人群在巴中市殡仪馆外排成长龙。

这位一生痴爱红叶的女子，有着红叶一般的风骨和品格，用燃烧的生命点染了革命老区巴中这片红色的沃土，被大巴山人亲切称为“永远的巴山红叶”。王瑛同志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感动神州大地。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王瑛为“优秀共产党员”，全党全社会纷纷开展向王瑛同志学习的活动。王瑛“铁骨柔情”的形象深入人心，已成为新时期党员干部的楷模。

# IMG_256**包起帆：扬起创新的征帆**

在位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校区内的包起帆创新之路陈列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有高校的师生，有工厂的员工……他们来到这里，都为寻找一个答案：创新的持续动力来自什么？

包起帆，从码头工人，到技术骨干、企业带头人、物流专家、国际标准的领衔制定者……在众人眼中，包起帆的人生充满惊叹号，而包起帆自己认为，他只是从未在平凡的岗位上画上创新的句号。

1987年4月9日，包起帆凭借“15吨滑块式单索多瓣抓斗”项目获第15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金奖。2015年，同一个授奖台上，他再次获得3枚国际金奖。时隔28年，港口生产实现了由人力化向机械化，由机械化到数字化，再到自动化、智能化的数次跨越，他的持续创新和卓越贡献，令主办方都惊诧不已！

而他的发明远远不止于抓斗。他参与开辟我国港口首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参与建设我国首座集装箱自动化无人堆场，积极推进国际首套全自动散矿装卸设备系统的研发，领衔制定了集装箱—RFID货运标签系统国际标准。

上海港是中国航运经济扬帆起航的见证者，而包起帆就是港口生产自动化创新的践行者。40多年来，包起帆连续五届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一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他带领团队技术创新，获国家发明奖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3项，获巴黎、日内瓦等国际发明展金奖36项。如今，他带领团队仍奋战在创新一线。

创新就在脚下，但创新之路并不平坦，唯有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包起帆的老同事王伟平讲述了一个“三上圆珠笔厂”的故事。包起帆无意中发现圆珠笔的启闭结构正是抓斗所需要的，但如何将这个原理应用到抓斗中呢？包起帆找到圆珠笔厂希望能够看看图纸，但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推脱，最终他三上圆珠笔厂，见到了图纸解开了谜团，抓斗新的启闭结构得到实现。

“如果浅尝辄止，知难而退，就没有创新的成功。其实，所有的技术革新都有一个破题、解题的艰难过程。”王伟平说，“关键是面对困难时，你是选择迎难而上，还是退避三舍，包起帆总是选择前者。”

哪里不安全，哪里效率低，哪里成本高，哪里质量要提升，包起帆就在哪里动脑筋。从业40多年中，围绕码头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和节能减排的需求，他的创新版图不断扩大。2006年5月，在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上，包起帆发明的诸多应用获得4枚金奖，成为105年来在该展会上一次获得金奖最多的人。

包起帆提出的公共码头与大型钢铁企业间无缝隙物流配送新模式，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码头建设的优秀典范，为此，2009年他获得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阿西布·萨巴格优秀工程建设奖”。进入21世纪，我国成为世界集装箱港口吞吐量第一大国，但在这一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却鲜有中国的声音，更难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发明进入国际标准。经过数年攻坚，包起帆团队制定的中国集装箱电子标签相关国际标准——ISO 18186（2011）终于在日内瓦ISO中央秘书处正式发布。这成为我国自1978年开始参与ISO活动以来，在物流、物联网领域首个由中国发起、起草和主导的国际标准。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包起帆在岗位上播下创新的种子，更让团队的创新之树根深叶茂。分享成果、共同成长，是包起帆十分注重的团队发展理念。他认为，扎实的团队是创新的基础，对团队的技能培训是关键。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包起帆践行生命不止，创新不竭。他在工作中坚持创新，就是因为发展的道路上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需要破除瓶颈，释放活力。包起帆说：“我们艰苦创业需要付出汗水更需要奉献智慧，要以创造性劳动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要在创新路上继续前行。”

# IMG_256**叶欣：身先士卒的白衣战士**

1956年，叶欣出生于广东徐闻一个医学世家。1974年，叶欣被招进广东省中医院卫训队。1976年毕业时，因护理能力测试成绩名列前茅留院工作。后由于突出的业务能力，被提升为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急诊科护士长。1996年，叶欣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3年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的非典型性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2月上旬刚过，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急诊科开始收治确诊或疑为“非典”的病人。叶欣身先士卒，全身心投入对急危重“非典”病人的检查、抢救、治疗、护理工作。

“这里危险，让我来！”这是叶欣在抢救“非典”患者时常说的一句话。为了防止同事被感染，每天上班，她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打来开水拿来预防药，亲眼看着大家吃下去。她反复提醒大家做好各项隔离措施，从医生到护工一个不落，检查极为严谨和认真。

随着“非典”患者急剧增多，科室工作强度不断增加。叶欣主动申请加班，忙的时候，她拒绝接听家人的来电，只是对接电话的护士说：“告诉他，我在班上，没事。”

在一次抢救危重“非典”患者过程中，叶欣不幸被感染。3月4日，极度疲倦的叶欣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不得不住进了病房，随后被确诊染上了非典型性肺炎。即使倒在病床上，叶欣仍然不时通过呼叫仪询问其他“非典”患者的护理情况。最初几天，每当医护人员前来检查和治疗，她总是再三叮嘱他们多穿一套隔离衣，多戴几层口罩。她甚至提出自己护理自己：“我是老护士长了，有什么不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用笔吃力地写下：“不要靠近我，会传染……”2003年3月25日凌晨，叶欣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7岁。

从开始护理“非典”病人直到病倒，叶欣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没有回过一次家，用生命谱写了一个白衣战士舍身救死的感人篇章。叶欣殉职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人民健康好卫士”荣誉称号及“白求恩奖章”“南丁格尔奖章”；2009年，叶欣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为弘扬叶欣精神，广东省中医院把3月25日确立为“叶欣纪念日”。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广东省中医院先后派出9批88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并派出相关专家赴香港、河北、云南、辽宁以及马来西亚等地支援抗疫。曾参与抗击“非典”的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大科总护士长邓秋迎说，“叶欣精神”深深扎根在我们心中，造就了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思想技术过硬的队伍。

# IMG_256**任长霞：一抹闪耀星河的绚丽彩霞**

河南登封，嵩山广场，登封市公安局组织的一个大型活动现场。人潮涌动中，一位中年妇女手里拿着一条大红纱巾，径直走向任长霞，笑着将红纱巾系在她的脖子上。任长霞很开心，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笑着问乡亲们：“今天我好看不好看？”说完甜蜜地笑着，面前的乡亲们也笑了……那一刻，她就像一个在父母跟前撒娇的乖女儿。然而，这个甜美的笑容在2004年4月14日晚永远定格——办案途中遭遇车祸，时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的任长霞猝然倒下，倒在了这片她为之倾尽心血的热土上，年仅40岁。

任长霞有多好，老百姓心里明白，喜欢她、爱戴她、亲近她，才会给她戴上那条大红纱巾。可他们却永远失去了这个好局长、好女儿，又怎会不悲伤？告别仪式那天，4公里的少林大道挽幛如云，14万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青春芳华留步，时间之河奔流不息。那些热爱与奋斗，那些奉献与牺牲，那些与忠诚信仰有关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久久流传……

2001年4月11日，任长霞从郑州市公安局机关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

那个时候的登封，属于河南省案件高发区，破案率低。在全市30多个职能部门的综合测评中，登封市公安局连续多年倒数第一。到任后短短一个星期，任长霞跑遍登封17个乡镇派出所，深入调研，得到了第一手资料，找出了队伍存在的问题。接下来，她顶着压力，处理了一批违纪违法民警，提出“严警风、强素质、树形象”的治队方针和“向我看、跟我学、对我监督”的准则，坚持从严治警，坚决推行人事制度改革。整肃警风的同时，任长霞还把重点放在破大案、破积案上，打响了一场场攻坚战。“不亲自到现场破案的局长，不是好局长！”身为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始终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警察，身先士卒。

登封西岭万羊岗一带，自1997年5月至2000年9月，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生强奸案11起，其中4人被强奸后遭杀害。恐慌笼罩着周边村落的家家户户。2001年4月底，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妇女独自行走在这一带。没几天，这一带又多了两名更年轻的妇女……那个独行的女人就是任长霞，另两名年轻妇女也是公安民警。这个“引蛇出洞”的招数，是任长霞深思熟虑后想出来的。3个月后，民警根据线索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案件破获的消息传出，西岭万羊岗群众多年来的恐慌一扫而光，很多人来到公安局，想一睹女局长的风采。

任长霞还果敢地向登封的黑恶势力宣战。

2001年4月23日深夜，任长霞像往常一样细细阅读群众的来信。一封署名“白沙湖畔村民”的来信震惊了她，信里详列了王松一伙的罪恶事例：王松承包了一家水产公司，组成保安巡逻队，持猎枪等在白沙湖上耀武扬威，草菅人命，先后殴打群众117人，致死7人，重伤5人，轻伤12人。看到信尾百余名村民的签名和红指印，任长霞震怒了，决心挖掉这个毒瘤。短短两个月，包括王松在内，65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登封、禹州近千名群众自发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一块块镜匾、一面面锦旗送到了登封市公安局。

接着，冠子岭村杀人案告破，东金店乡强奸焚尸案告破，大冶镇火石岭村绑架案告破……面对辉煌的战绩，登封市民彻底心服口服了，任长霞的名字一下子传遍了整个中岳大地。登封的老百姓都说：“咱登封来了个女神警，案发一起就破一起。”三年里，在任长霞的带领下，登封市公安局在全市的民主行风评议中，由倒数第一名一跃进入前五名，获评河南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等。2003年，登封市公安局民警个人和单位获奖数均创新高。

从警21年，任长霞曾多次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并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国十大女杰。2004年，任长霞被追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我将沿着母亲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会追随前辈们的足迹，无怨无悔、无惧无畏，为公安事业奋斗终生。”任长霞的儿子卫辰尧现在是郑州市公安局的一名民警，母亲已经离开17年，他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名人民警察，沿着母亲的脚印一路走来，越来越体会到她无悔付出和执着追求的意义所在。

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一段段动人的故事，任长霞将自己生命中最壮丽的时刻留在了中岳大地，生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从警宗旨。任长霞的精神在郑州警队不断沉淀、接续、传承。近年来，郑州公安机关始终传承学习，并将英模榜样的力量融入贯穿在各项公安工作中。在英模精神感召下，近年来郑州公安机关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2020年，全市公安机关94个集体、875名个人立功受奖，涌现出两位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故人已随青山去，英名永存天地间。历史前进，英雄事迹不会磨灭；时代变迁，英雄精神熠熠生辉。

# IMG_256**许振超：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

“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这是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固机高级经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兼职）许振超的“座右铭”。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在青岛港成为人尽皆知的“许大拿”，在工作中创造出的“振超工作法”更是为青岛港提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之所以能把工作做到极致，在许振超看来，都是得益于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

许振超，1950年出生。1974年，他来到青岛港当上了一名码头工人。他操作的是当时最先进的起重机械——门机。许振超勤学苦练，7天就学会，在一起学习的工人中第一个独立操作。然而，会开容易开好难。师傅开门机，钩头起吊平稳，钢丝绳走的是“一条线”；到了许振超手里，钩头稳不住，钢丝绳直打晃。特别是矿石装火车作业，一钩货放下，洒在车外的比进车内的还多。看到工人们忙着拿铁锹清理，许振超的心里十分内疚。为了早日掌握这项技术，每次作业完毕，别人休息了，许振超还留在车上，练习停钩、稳钩。四五个月后，他开的门机钢丝绳走起来也一条线了，一钩矿石吊起，稳稳落下，不多不少，正好装满一车皮。这手“一钩准”的绝活，很快就被大家传开了。

在一次施工作业过程中，许振超发现粮食颗粒小，更易洒漏。他便在工作之余，吊起满满一桶水，练习走钩头，直至练到钩头行进过程中滴水不洒。再去装散粮，一抓斗下去，从舱内到车内，平平稳稳，又一个绝活“诞生”了——“一钩清”。许振超的活干净利索，装卸工人们二次劳动大大减轻，大家都愿意跟他搭班。“在全世界港口行业中把集装箱装卸速度干到第一”，一直是许振超的梦想。同时，他将一个个新想法变成生产实践中的一项项新技术，成为行业一流“技术专家”。

至今，许振超仍然记得第一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的情景。那是2003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地点就在投产不久的前湾港新码头。当晚，下了夜班的工友守在码头上，第二天上白班的人也提前来到现场，见证振奋人心的时刻。从晚上8点开始，许振超和工友连续鏖战6个多小时，创造了每小时单机效率70.3自然箱和单船效率339自然箱的世界集装箱装卸记录，一举打破当时单船每小时装卸336自然箱的世界纪录。此后，许振超团队又先后9次打破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使“振超效率”成为港航界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成为中国港口领先世界的生动例证。练绝活之余，许振超还在岗位上勇于创新。他经多次试验，在冷藏集装箱上加装了节电器，全年节约电费600万元；他领衔组织实施了轮胎吊“油改电”等技术改造，填补了国际空白，年节约资金2000万元以上，噪音和尾气污染接近于零……

如今的许振超，仍然经常在青岛港为他设立的“许振超大师工作室”里，和新一代码头工人，围绕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技术，开展以高效服务为目标的创新。以许振超名字命名的“振超精神”也已经成为广大产业工人学习的榜样。许振超说：“‘振超精神’虽然用了我的名字，但它实际上是我们当代工人的一种精神。对于工人来讲，热爱劳动这个信念应该贯穿我们工作的始终，需要认真去做几十年乃至一生。”

# IMG_256**许海峰：零的突破 为国争光**

他25岁时还是一名供销社卖化肥的销售员，27岁那年，他一跃成为中国第一位奥运冠军，拿下中国等待了半个世纪的第一枚金牌，打破了中国奥运“零金牌”的命运。而他的金牌自己仅保存两个月，就被送往博物馆。他没有和其他运动员一样从小接受正规训练，而是中途入行，那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创造了中国拿下一金的历史性时刻呢？

1957年8月1日，许海峰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家中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他是家中的长子。由于许海峰的父亲曾是一名士兵，受父亲的影响，许海峰也一直有一个当兵的梦想，而当兵自然是拿枪打仗最为英勇，因此他从小就喜欢射击。许海峰在学习方面十分刻苦，是弟弟妹妹们的榜样，而日常生活中他却调皮淘气，成了弟弟妹妹们的反面教材。在许海峰上小学的时候，由于成绩一直不错，父亲为了奖励他，特地送给他了一个弹弓，有了弹弓后的许海峰整日跟个“野孩子”一样，在外拿个弹弓到处“击杀”麻雀。然而弹弓总有失误的时候，许海峰玩弹弓的时候，经常打坏邻居家的玻璃窗户，为此父母也不少教训过许海峰。在家的时候，学习方面，父亲就会让弟弟妹妹跟着哥哥许海峰学习，以他为榜样；而生活中，父亲就在弟弟妹妹们面前“挖苦”许海峰，称不要向哥哥学习。许海峰为了不遭受父母的教训，不迫害邻居家的窗户，再加上本身对射击的热爱，他就自我训练射击。许海峰简直是射击天才，一段时间练习后，他神速进步，上初中的时候，他就能对树上的麻雀百发百中，而正在飞行的麻雀他也能做到十发九中。

1974年，许海峰从高中毕业，他萌生出当兵的想法，当兵一直以来都是他的梦想，他从未忘记过。许海峰连忙去报名，体检指标都合格，但是他的年龄却比规定的年龄小了八个月，在当时他的父亲也有很多当初的战友，现在都是军队里面的干部。他们也看中了许海峰的射击天赋，就跟许海峰父亲说，如果愿意把许海峰送到他的部队里就可以参军。而一旁的许海峰也是两眼放光，满脸期待。没想到父亲却一口回绝，还对许海峰大声呵斥道：有本事就靠自己，不要靠我给你走人情关系。因此，许海峰没达成参军的愿望，回乡做起了知青，因为在当时入乡做知青也能有参军的机会。1976年，许海峰再次申报参军，这次他的年龄满足了，但是他又再次被拒绝了，原因是知青插队没有满两年。经过几番折腾，许海峰也已经看透，参军不再是他的目标，但是射击他从未放弃，因此他的“射击梦”成为了他的终极理想。在许海峰所在的村子里，人人都知道不管是天上飞的鸟，还是水里游的鱼，只要许海峰出手就必中。因此，许海峰在村里和一众知青中，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很多人都找他学过射击，他的射击实力也因此日益提升，这也为他成为世界冠军埋下伏笔。

1979年，许海峰作为乡下知青返城后，被安排到供销社卖化肥，但是金子就算被埋没到一堆沙子中，也是会发光的。恰逢许海峰中学时的体育老师在省队当射击教练，因此对于许海峰的射击天赋，老师是早已见识过的，他就建议许海峰加入省队，进行专业训练学习。

但是当时22岁的许海峰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期，除非许海峰参加省内射击比赛并打破纪录，否则就有些悬。许海峰为了赢得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胸有成竹地参加了省内射击比赛。

比赛进行时，许海峰只剩下了3枪，要想打破全省纪录就在此一举，就在所有人认为他不可能的时候，他一枪射中9环，两枪10环，许海峰做到了，他真的打破了全省纪录，排名第一。但是，这次的比赛也并没有改变许海峰的命运，在进入省队的名单中，射击队却把他剔了出去，省队领导认为他无论实力再怎样高。他的年龄已经过了黄金时期，根本不符合常规，觉得许海峰无论如何都不能达到世界级水平。幸好，许海峰有着支持他，欣赏他的伯乐，这就是许海峰曾经的体育老师。当许海峰陷入情绪低谷的时候，体育老师特地来安慰他，让他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射击天赋。在老师的帮助下，许海峰改为了“自选手枪”训练，老师坚信他一定能够进入省队。

1982年，许海峰再次参加省内的自选手枪比赛，四十四发子弹许海峰竟然打到了三百七十环，直接超出省内最高纪录二十六环。如此优异的成绩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要知道这个成绩在国内是无人能及，甚至在整个世界上也能排上前三。赛后，许海峰就回家等待省队的录取名单，却不料意外突然发生，许海峰在一次值班中，被化肥烧伤了眼睛，就在他住院期间，体育老师拿着通知书到他眼前。据说，这封通知书是经过射击队多次开会商议才决定下来的，这次虽说让许海峰获得了一个进入省队的名额，但如今他的眼睛还给烧伤了，视力肯定大不如前，可能也达不到巅峰状态了。尽管如此，许海峰仍然不像现实服输，许海峰说，就算他失败了，他也不想像个懦夫一样放弃这次机会。1982年5月，终于许海峰进入了省训练队，他为了矫正姿势，每天射击的时候胳膊上都会绑着一个沙袋。1983年11月，许海峰以优异的成绩被调入国家队，参加第23届奥运会集训。

1984年，许海峰跟随国家射击队前往洛杉矶，参加奥运会预备赛，他以568环的成绩获得第一名，正因如此他被正式选作奥运会自选手枪运动员。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自选手枪项目中，以566环获得冠军，这个成绩意义非凡，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的含金量简直是太沉了，据说能被拍卖到上百万。许海峰本人也深知这枚金牌对于国家是多么的宝贵，因此他仅仅保留了两个月，就上交给了国家。

1955年，许海峰宣布退役，但他并没有离开射击，而是开始从事射击队女子手枪教练。5年时间里他培养出了2名奥运冠军。1996年，师从许海峰门下的李对红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手枪冠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许海峰的另一个徒弟陶璐娜在气枪项目上获得金牌。

许海峰的一生是是光辉而又灿烂的，他立身于为国体育效力，他将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和整个国家的强盛紧密结合起来。他不仅仅是自己的冠军，还是人民的冠军，是国家的冠军。

# IMG_256**李向群：新时期英雄战士的生命凯歌**

面对着鲜红的党旗，已在荆州大堤上奋战七昼夜的李向群，缓缓举起右拳，在滔滔洪水声中，郑重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8月22日，这位军龄20个月、党龄8天的解放军战士，倒在抗洪抢险的战场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1996年底，对军营充满梦想的18岁李向群，又一次向父母提出了参军的要求。彼时，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海南经济特区地域优势下，李向群家创办的服装加工厂和两个服装批发店生意红火。李向群帮助管理家中的几辆车，小小年纪就能赚不少钱。父亲李德清明白儿子的心意，鼓励儿子报名应征。

当年12月，李向群来到原广州军区某集团军“塔山守备英雄团”9连，成为一名英雄部队的新兵。

“从一名地方青年到合格士兵，再到优秀士兵，来自特区、家境优裕的李向群让身边的战友刮目相看。”“李向群连”现任指导员王仕鹏说。

1997年，李向群先后获团、营、连3次嘉奖，年底被评为“优秀士兵”。1998年4月，由于在铺设光缆施工任务中表现突出，李向群荣立三等功。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一曲《为了谁》20多年来传唱大江南北，让人们始终怀念在1998年特大洪水抗洪抢险救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

那年，李向群所在部队接到了抗洪抢险的命令。“我必须回部队，上前线！”正在家中休假的李向群这样告诉家人。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抵达灾区后，李向群递上入党申请书，要求参加党员突击队。14天的抗洪战斗中，他跳入洪水检查管涌，左脚被划伤、血流不止，仍强忍疼痛不下一线；他连续奋战14个小时，直到高烧不退、体力不支而晕倒在地，体温高达40摄氏度；他拔掉输液针管跑到大堤，运送数十包沙袋后，再次晕倒在大堤上……

1998年8月21日上午，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后，李向群又从病床上爬起来，坚持加入抗洪队伍。10时左右，他第3次晕倒，村民把他扶到阴凉处。缓解后的李向群继续坚持战斗，但因极度虚弱疲劳，第4次晕倒在大堤上，再也没能醒来……

“我要上大堤！”这是党龄仅8天的共产党员李向群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从海南匆匆赶来的李德清、王玉琼夫妇，抱着儿子的骨灰盒，登上了儿子入党宣誓的堤段。

“爸爸来替你完成未尽的职责！”年过半百的李德清穿上儿子的军装和陪伴了儿子人生最后14天的救生衣，奔上大堤和官兵们一起背运沙袋、加固堤坝。强忍悲痛的王玉琼在9连临时住宿地，含泪为官兵们洗衣缝被、洗菜煮饭……

返琼前，李德清、王玉琼夫妇拿出两千元，代儿子向党组织交了入党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并将各方捐来的两万元慰问金赠给灾区群众。

李向群牺牲后，原广州军区授予他“抗洪勇士”荣誉称号，并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李向群班”，所在连为“李向群连”。1999年，中央军委授予李向群“新时期英雄战士”荣誉称号。他的英模挂像，被张贴在全军连级以上单位。

“家富不忘报国，矢志不渝为民。”20多年来，“李向群连”一代代官兵接续传承“李向群精神”，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5次、集体三等功17次。

连队一楼排房的门口，挂着“李向群班”的标志。走进排房，英雄生前睡过的床铺，整理得整整齐齐。班里的战士每天晚上睡觉前把英雄的被子打开，早上起床再叠好，就像他从未离开一样。

“英雄战友虽已牺牲，但他始终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身边。”“李向群班”现任班长张雨飞说。

# IMG_256**杨业功：“导弹司令”的清风亮节**

新安江畔，杨业功纪念馆。这位第二炮兵某基地原司令员、共和国将军的简朴令参观者吃惊：一只浅蓝色的搪瓷碗，从任排长时一直用到生命结束，30多年从不离身；复原的“杨业功旧居”里，卧床是用4个木箱拼成的，而床头灯则是用拐杖支起的一盏旧台灯，餐桌、衣柜全是自制的。在纪念馆留言簿和网页上，已有20多万条感言和跟帖——“一盏灯、一个碗，寻常之物，却承载着一名共产党人的清风亮节”“有杨业功这样的将军，强军富国的征程一片光明”等感言，道出人们的共同心声。

“从来败军多骄奢，自古为将廉生威”。杨业功一生坚守“两个阵地”：一个是为国仗剑的导弹阵地，一个是清正廉洁的气节阵地。当旅长时，他写下“携礼莫入”挂在门楣上，挡了送礼者的脚步；当上将军，有人找他谋求“关照”，被当面怒斥；当了司令员，每年经手上亿元经费，他坚持花好每个铜板，一分一毫问心无愧。

“这真是将军的家吗？”看到复原的“杨业功旧居”门窗破旧，墙壁斑驳，参观者一遍遍问讲解员。移步换景，当他们看到墙壁上的一幅照片，满腹疑问化成两行热泪：病中的杨业功，穿着一件掉了扣子的旧棉袄，坐在临时借来的沙发上，面前摆着那个浅蓝色的搪瓷碗，一个蛋糕，几碟小菜，这是将军的最后一个生日。纪念馆的中央，陈列着一个老式皮箱，里面放着绿色军大衣、水壶和方便面。这是杨业功的“三件宝”，用他的话说，水能解渴，衣能御寒，面能充饥，出差下部队，足矣。杨业功一年有100多天忙碌在深山，奔波在基层，他下部队明确提出“禁酒、减菜、少陪同”，在外勘察阵地，很多时候靠吃方便面充饥。一位90多岁的老红军，坐着轮椅参观杨业功纪念馆。老人几次哽噎：“战争年代缺吃少穿，勤俭节约倒是不难，但在物质充盈的今天，尚有几人能如此？党的传统还在，军队作风还在！”

杨业功一生思带兵，谋打赢，枕戈待旦，抓紧时间储备知识。1997年，杨业功被派往国防大学深造。他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充电机遇，如饥似渴地学习高科技知识，研究各军兵种作战理论，整理出资料几十万字，节假日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度过，只用一年时间便完成军事指挥员的知识升级。杨业功生活上极其简朴，花钱买书却从不吝啬，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只要认为需要的，便买而习之。紧张的工作之余，杨业功撰写了《谈如何保持第二炮兵长久的实战能力》《局部战争与导弹部队》等30余篇对部队建设颇有价值的研讨文章。

1999年6月，杨业功走上某基地司令员岗位。时值这个基地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时期和超常发展的特殊时期，杨业功把“决战决胜”作为部队追求的最高目标，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在他担任司令员的几年间，二炮某导弹基地建设呈辐射状快速发展，圆满完成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使共和国的“长缨”锐旅真正成为捍卫祖国的“铁拳头”。

2002年，已经57岁的杨业功在基地党委常委中带头参加军事科学院在职研究生学习。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伏在病床上完成题为《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应把握的问题》的毕业论文。

走进杨业功纪念馆，人们凝望一张张家庭合影，聆听一个个家风故事，吟诵一首首将军诗作，感受着纯朴的“将门家风”。

杨业功有两个“约法三章”——一个是，从当旅长开始，他就给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提要求：不许干预我的工作；不许享受任何“特权”；不许收受任何钱财和好处。另一个是，2003年底他病重住院，交代大家：无论我手术成功与否，任何人不得找医院麻烦；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来看我；家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受礼品和现金。有了“约法三章”，不管刮风下雨，妻子杨玉珍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儿子杨波涛想“蹭”父亲的便车回家，结果被赶下车；弟弟从老家投奔，想在部队招待所谋个差事，好话说尽，他就是不点头。官至将军，杨业功从没用手中的权力谋一点私利：老母亲仍居家乡，妻子从北京郊区一座热力站退休，二弟杨业平是一名普通教师，三弟杨业专在一家宾馆打工，妹妹杨业理在一个学校干勤杂，儿子杨波涛仍是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名普通干部。

当年，儿子杨波涛结婚，杨业功明确不办婚宴、不收礼金，以茶话会的形式请来亲朋好友坐了坐，让一对新人种下两棵桂花树作为纪念，花费的832元是自己掏的腰包。今年春节，一对年轻的恋人听了讲解员的介绍后，打扮时髦的女孩流着泪对男孩说：“我们结婚也一切从简吧，像这样种些树倒是不错的主意。”临走时，女孩告诉工作人员，他们已决定把举办婚宴的钱换成一万棵树苗，染绿一片荒山。

# IMG_256**苏宁：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

“我是新时代苏宁传人，我宣誓，弘扬革命传统，继承苏宁遗志，爱党信党，绝对忠诚……”2021年4月30日，全军挂像英模之一苏宁牺牲3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苏宁生前所在部队——北部战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苏宁挂像前庄严宣誓。官兵们表示，作为苏宁传人，要有“醉里挑灯看剑”的忧患，要有“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的状态，要有“为国牺牲敢惜身”的精神，像苏宁那样想现代化、钻现代化、干现代化。

1953年12月，苏宁出生于六朝古都南京。1969年2月，苏宁入伍，并于197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春，苏宁所在部队换防至哈尔滨市郊。基层环境艰苦，有些人产生畏难情绪，但苏宁从不动摇。当战士，他是训练尖子；当班长，他带领全班夺得全团训练比武第一名；当干部，他是基层干部标兵、优秀指挥员……在每个岗位，他都表现出色。苏宁常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当一个人全身心地热爱一项事业的时候，他才能自觉地、不遗余力地为之奋斗。

1989年6月，苏宁任团参谋长，他把对国防现代化的研究热情带入日常训练中。1989年冬，苏宁在拉练中发现，帐篷不能满足哈尔滨寒冷天气下的保暖需求。他研究制作了一种隐蔽性与保温性兼备的帐篷，在严寒中为战士保暖。从1981年到1991年，苏宁独立完成和参与研制的改革项目有162项，1项获全军模拟器材二等奖，6项被总部、军区机关肯定和推广。苏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看到外军指挥系统一秒钟处理几万个数据，指挥战争效率成倍增长，而我军指挥员们还用铅笔在地图上‘点点’时，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你不着急吗？”这样的紧迫感，时刻鞭策着苏宁在国防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探索。苏宁超前设想，希望编制一个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辅助炮兵射击。

“当时计算机还没普及，他的主体思想就是把炮兵的整个射击，形成指挥的自动化。”苏宁生前战友、哈尔滨警备区原副司令员王琦回忆，“我们惊讶于他的大胆想法。”经历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苏宁的不懈努力下实现了。后来，他又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授共同研发一种激光测速系统，用激光来测试炮弹初速。

就在苏宁沿着现代化道路不断前进时，令人痛惜的意外发生了。1991年4月21日上午，苏宁现场指挥建制连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一名投弹手挥臂过猛，弹体碰撞到堑壕后沿，手榴弹落在不到一米外的监护员脚下，手榴弹冒着白烟即将爆炸。危急时刻，苏宁大喊一声“快卧倒！”冲过去推开监护员，俯身抓起手榴弹，想把手榴弹扔出堑壕，正要投出的一刹那，手榴弹爆炸了。

两位战友幸免于难，苏宁却身负重伤。8天后，苏宁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38岁。

在苏宁牺牲后的第5天，他生前主导的科研项目获得成功。

1993年2月19日，中央军委授予苏宁“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荣誉称号。1996年，他作为全军英模之一，挂像在全军连以上单位悬挂。在苏宁生前所在连队，又一批新战士入营，指导员董广宇带领他们来到连队荣誉室进行“第一课”教育。“苏宁创新的多项战训方法和器材，我们至今仍在受益。我们要永远学习他献身国防现代化的精神。”董广宇的声音，回响在荣誉室里，也回荡在战士们的心底。

# IMG_256**林俊德：永远盛开在罗布泊的“马兰花”**

地处罗布泊大漠深处的新疆马兰，屹立着一座用天山花岗岩砌成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这里安葬着陈士榘、张蕴钰、朱光亚等为我国核试验事业牺牲奉献的开创者们。全军挂像英模、被中央军委授予“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的林俊德也长眠于此。2019年9月，他曾被评为新中国“最美奋斗者”。

林俊德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63650部队研究员，是我国核试验爆炸力学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隐姓埋名、潜心铸造大国重器，扎根新疆罗布泊戈壁大漠52年，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

“大漠，烽烟，马兰。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五十年。剑河风急云片阔，将军金甲夜不脱。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林俊德去世后，他被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第四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林俊德，1938年出生，福建永春人。1955年，17岁的他考入浙江大学机械系。由于家境贫穷，大学全是靠党和政府助学金读完的。为此，林俊德常对儿女们说，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培养。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要赤诚报国。

196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的林俊德参军入伍，从此隐姓埋名，成为新中国核试验科研队伍中的一员。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林俊德研制的“林氏”压力自记仪，在我国第一颗核爆试验中首战立功。自此，作为功勋装备，它应用于各种高尖端武器试验之中，出现在试验场的各个角落。

“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核试验。咱们花钱不多，干事不少。搞科学实验，就要有一股子拼劲儿。”这是林俊德经常引以为豪的话。他担当10多项国防科研尖端课题研究，一年几乎有300多天都在大漠戈壁、试验场区度过。

2012年5月4日，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面对猝不及防的重大变故，林俊德首先想到的是已到关键时刻的国防重大科研项目还未完成。在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林俊德和病魔赛跑，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为国防重大科研项目尽最后的努力。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把思考很久、趋于完善的学术思想和技术思路留给后人。5月30日下午5时30分，林俊德要求把办公桌椅搬进病房。这一次，他强撑着工作到当晚9时45分。5月31日，从早上7时44分到9时55分，林俊德先后9次下床工作。这时他腹胀如鼓，呼吸困难，已经极度虚弱，每点一下鼠标，都要喘一大口气。在笔记本电脑上，林俊德先后整理科研资料1.5G；3次用加密电话打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作；当他感到稍微有点儿精力时，又为一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写下300余字的评语和6条建议；在病房两次召集课题组成员交代后续实验任务。5月31日20时15分，当这个国防科技战士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在场的和早已守候在病房门口的所有医护人员，再也控制不住奔涌的感情，一个个掩面而泣……在生命最后时刻，林俊德只留下一句话：“死后把我埋在马兰。”

“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这是马兰基地官兵对林俊德的评价。2013年2月 林俊德当选了201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也是从这时起林俊德的英勇事迹才广为人知，在这之前 他的儿子只知道父亲在搞核试验，却不知道他有这么多的荣誉,直到父亲去世后 ，他才从媒体报道中了解父亲的事迹，如今， 林俊德老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勇于奉献 一心为国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 **杰桑·索南达杰：**

# **用生命守护可可西里**

“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这是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先驱杰桑·索南达杰立下的誓言。作为改革开放早期我党培养出来的优秀党员、优秀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代表，索南达杰是高原儿女献身生态环境保护的杰出代表。他发起了对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有组织保护，开启了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新纪元。今天，索南达杰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滋养着每一个青海人，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成为每一个青海人的自觉行动。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可可西里藏羚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盗猎，数量从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被列为国际濒危物种。索南达杰此时正在索加乡担任党委书记，索加乡处在可可西里，这里不仅是藏羚羊的天堂，更是矿产资源的富矿。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期间，索南达杰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1988年，索南达杰在《工作汇报》手稿中写道“保护和利用好自然资源，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初，为保护国家资源，合理开发可可西里，制止非法偷猎盗采活动，索南达杰向治多县政府提交了《关于管理和开发可可西里的报告》。1991年，治多县政府请示玉树州人民政府成立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机构，1992年7月，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成立西部工委的初衷是管理和开发可可西里。索南达杰兼任西部工委书记。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自然环境十分严酷，属于地球第三系地质平台，被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索南达杰十分关注可可西里的生态物种状况，随同他一起巡查可可西里的同事们清晰地记得，索南达杰口袋里一直装着一本《濒危物种名录》。索南达杰带队在可可西里巡查，发现了大量的被盗猎者剥了皮的血淋淋的藏羚羊尸体，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更加坚定了他保护可可西里的决心，对于盗猎者的无法无天，索南达杰叹道：“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

经多次实地考察，索南达杰向州委州政府提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建议。一桩桩猎杀藏羚羊事件的发生，引起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及时调整工作方针，将西部工委的工作重心向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转变，很快批准成立可可西里林业派出所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后来又成立“高山草场保护办公室”。紧接着，依托西部工委，索南达杰组建了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第一次走进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豪迈地喊出：“迎接我们的是号称‘生命禁区’的可可西里以及横行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邪恶势力，我们肩上承担的是保护和利用全县60%版图的责任，需要我们具备的是吃苦耐劳、开拓创新、敢于奉献的精神，有可能要我们的生命作抵偿。”

1994年1月8日夜里，索南达杰一行7人从格尔木出发，沿南线前往可可西里，进行县界勘界和资源调查。第二天凌晨到达青藏公路西大滩附近的岔道口，发现有很多手扶拖拉机留下的痕迹，他们寻迹而去，在海丁诺尔湖边发现一伙刚刚进入此地的盗猎者，从他们帐篷里搜到两支小口径步枪、3000发子弹，索南达杰当即决定没收枪支弹药，责令其马上离开此地。1月16日，索南达杰一行抵达青海、西藏、新疆三省交界处的泉水河，基本完成了地界勘察任务，正准备回返时，他们隐隐听到一阵汽车的马达声，稍后第一辆汽车就由远而近，那是一辆吉普车，没能拦截住便鸣枪警告，车还是没停，继续向前疾驰而去。这时，第二辆吉普车奔驰而来，他们终于拦住了。接着索南达杰率两个人去追前面的车，剩下的人又堵住了一辆卡车，上面装着近400张藏羚羊皮，前面逃跑的那辆吉普车也被追回来了，这个盗猎团伙的一行8人全被扣押。看着那些血淋淋的藏羚羊皮，索南达杰心痛如绞。正在这时，又有一辆吉普车，一辆东风车迎面疾驰而来。索南达杰鸣枪拦车，却没有拦住。两辆车从他们身边横冲而过。索南达杰被激怒了，追击时迫不得已从车上向逃跑的汽车轮胎开枪，强迫停车，不慎将那辆满载羚羊皮的卡车司机腿部打伤。这又是一个盗猎团伙，一行12人，查获一支火枪，一支改装的半自动步枪、9支小口径步枪、子弹3000发、现金万余元。

18日傍晚，索南达杰一行人押解盗猎分子行至太阳湖南岸，夜幕降临了，夜幕下，一场阴谋正在偷偷地酝酿着。盗猎者趁着索南达杰和工作人员不注意将汽车轮胎割破，将索南达杰和其余工作人员分开，等到索南达杰将车轮胎换好赶上前面的押送盗猎者车辆时，盗猎者已经将前面的车辆控制，并埋伏好等待着索南达杰。夜幕中，索南达杰赶到这里时，只见大小车辆一字排开，车灯齐亮，只有一个大高个站在一辆大卡车下，他认出那个人是一名盗猎者。这时，站在东风车下的盗猎者向索南达杰走来，说话间，从后面将他死死抱住，也许是气极了，他一转身就把那个大高个摔倒在地，随即举手开枪，那人便不动了。索南达杰还没有回过神，枪声已响成了一片，一颗颗子弹呼啸着从他耳边飞过，一颗子弹从后面击穿他的臀部和下腹部，他忍着剧痛从一辆卡车的右侧走到左侧后便倒下了，鲜血从他伤口涌出，染红了身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时，他还在还击，子弹打完了，他又掏出一梭子子弹想要往上推时，他怎么也使不上劲。第二天早上盗猎者只见索南达杰匍匐于地，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一动不动，犹如一尊冰雕。

这是1994年1月18日之夜，因为交通不便，通讯条件差，情报传递缓慢等原因，直到22日相关部门才接到报案，29日将索南达杰的遗体运到曲麻莱县城。40岁的索南达杰就这么匆匆地走了，他留给人们的是一串闪光的足迹，一份沉沉的思念，一座不朽的丰碑。

# IMG_256**胡福明：追求真理的思索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发现错误思想不去批判，我就对不起党，不配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回忆起当年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衷，胡福明仍然心潮澎湃。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长安乡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上小学和初中时，胡福明就因交不起学费失学过几次。失学在家的时候，他就帮父亲种田。只有等到空闲时，他才能抱着弟弟跑到学校，站在墙外听老师讲课，一待就是半天。面对求知若渴的孩子，父亲决定，家里就算卖粮食挨饿，也一定要供胡福明读书。1952年，17岁的胡福明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的春季班。“教室里有电灯，晚上能在灯光下读书，是多么幸福的事啊！”至今，胡福明还对无锡师范学校炽烈的灯光念念不忘。在学校里，胡福明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即使后来毕业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工作，每天下了班，也还是扎在书堆里。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55年，胡福明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自小饱尝民生疾苦的他，曾梦想当一名作家，能为群众发声，于是他选择了新闻学专业。但是，他很快又发现，新闻工作者需要敏锐的头脑，而胡福明觉得自己并不适合。于是，他又主动到哲学系去听选修课，自学哲学。毕业时，国家刚好要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此要从应届生中选送有志学习的人继续深造。就这样，1959年的夏天，胡福明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录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哲学。1962年12月，面临毕业分配，胡福明申请分配到了南京大学任教。于是，当年从乡下田埂上走出来的穷小子，成为中国高等学府的青年教师。常言道：“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彼时，读书近二十载的胡福明，还需要将人生这本大书，慢慢读透。

”文革”期间，胡福明遭到批斗。“肉体上的痛苦是次要的，思想上的折磨是我最无法忍受的。”说到动情处，胡福明的双眼不禁蒙上了一层泪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同全国老百姓一样，胡福明以饮酒吃蟹的方式来庆贺“四人帮”的倒台。南京大学师生自发聚集到大操场列队上街游行，那段时间，胡福明开心得像个孩子。他认识到“文革”已经结束，开始积极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斗争，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着重从政治理论上揭批“四人帮”。但不久后，胡福明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突然降温、刹车。南大校园当时私下批“文革”的很多，但从没有听说过要批“两个凡是”。

1977年的三四月间，正是胡福明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我这辈子从来不失眠，但两段时间除外。第一段是被打成‘黑帮’之后，白天被批斗、游街，我晚上睡不着，想不明白。第二次失眠，便是在那个时候了。”胡福明说。他开始酝酿写文章了。长期与哲学打交道的胡福明敏锐地捕捉到，破解所有问题的总开关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否定“句句是真理”，否定“天才论”。“我始终相信，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一旦觉醒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们屈服的。”胡福明凝视着书桌上的五星红旗，感慨地说。

就在胡福明把文章的主题和结构大概定下来的时候，家里出了一件大事：妻子张丽华在体检时查出肿瘤。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陪夜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在病房走廊的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瞌睡了，就把3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5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也大致写成了。9月初，胡福明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8000字左右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

这篇文章及其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受到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邓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在1978年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以后视察东北三省，都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对怎样正确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述，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违背实事求是，搞“照抄照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魄力，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从此，改革开放大潮在中国大地不断涌起。

# **袁庚：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

1917年4月23日，袁庚出生在广东省宝安县大鹏王母圩水贝村的一个海员家庭。1931年，14岁的袁庚以全省第八名考入广东省一中（广雅中学），开始参加爱国运动。1934年，由于无力支付学习生活费用，他不得不中止学业返回家乡。后来，袁庚考入当时的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由于学校贪污腐败成风，一年后他离校回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1938年，在共产党员黄闻、钟原、王柏等同志的影响和带动下，袁庚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各项活动中展现出非凡的才干与能力。1939年3月27日，袁庚庄严地宣誓入党。同年，袁庚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1942年，香港沦陷后，袁庚和他的战友们利用地下航路营救出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各界精英，被称为抗日战争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同时还营救出许多盟军被俘人员、国际友人、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军飞行人员。1944年8月，袁庚受命负责东纵的情报工作，和美军交换日军情报。这一时期，由袁庚负责的情报工作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了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的工事，二是在广州、东莞发现了日军最精锐的波雷部队。1949年10月，时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的袁庚带领炮团南下，解放了包括三门岛、大铲岛、蛇口等周边地区在内的珠江口沿海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庚作为情报与炮兵顾问于1950年4月奔赴越南援战并参加越南高平战役。1955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袁庚作为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负起了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保卫重任。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在广东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当即得到批准，蛇口工业区创立，他见证并引领了中国三十年传奇的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浓缩了一部中国的当代史，蛇口、招商、袁庚、国际化，这四个词浓缩了一部中国改革史。作为深圳“拓荒牛”的代表，袁庚被封为“蛇口之父”，袁庚：“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你们这样一讲，我脸红得都不敢讲话了。”

袁庚不让别人叫他“蛇口之父”，但蛇口的确是他亲自选中的一块试验田，近香港，好借力。袁庚：“想在香港买块地的话，没门，太贵了！为什么我们不在靠近香港的地方建工厂？这个对！从珠江口到大鹏湾调查了一大圈，就这个地方最好，这个地方叫蛇口。”建开发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把整个南头半岛都圈给了深圳，袁庚没要，他只要了半岛的最南端，2.14平方公里。开始为招商局操持蛇口时，袁庚61岁，他说蛇口是弹丸之地，经济价值不足挂齿，但“如果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袁庚为这支“蛇口试管”想路子。袁庚：“为什么香港当时这么繁华，因为它是一个自由港！市场经济规律是客观的，不由人说了算，不由人想象的，不听行政指令的。”

袁庚给运土司机每超运一车土方的奖励是4分钱，码头工程建设的一期工程就提前33天完成。在蛇口，袁庚主张建起的招商银行是内地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平安保险也脱胎于蛇口。他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用三合板做了木牌，挂在蛇口太子路的显眼处。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当时很大争议，要钱要命。1986年邓小平来，他肯定了这个口号，他当时说，对！很对！这个口号才肯定下来。”

袁庚的尝试从经济到管理，1983年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成立，所有管委人选都由民主投票决定，包括袁庚自己。袁庚：“招商局搞选举，报纸就批评，袁庚这个董事长不懂事。选举，1000多人投票，我才200多票，虽然还是第一。”袁庚说，不允许人在蛇口因言获罪，他捍卫说话的权利。离休后，袁庚仍住在蛇口微波山上的“鲸山别墅”，坐在藤椅上能够看到泊在湾中，小平南巡题字的“海上世界”明华轮。袁庚：“现在的蛇口，一代代新人胜旧人，这都是过去我们不能想象的东西。”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蛇口港务公司的这个标语牌从1982年一直矗立到今天，风吹雨打，标语牌换了无数，但是这两句口号始终没变。这句口号带来的价值观风暴更是席卷中国数十年，瓦解束缚发展的计划经济体系，影响无数人的生活方式。敢于担当、勇于尝试，执着向前，是袁庚留给中国社会改革进步的巨大财富，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



# **谢高华：勇于担当敢为先**

从贫瘠小县到“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浙江义乌的发展堪称传奇。这场变局的开端，与一位老人密切相关。他叫谢高华，1931年生，浙江衢州人，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5月至1984年12月期间，谢高华担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的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虽然义乌素有“鸡毛换糖”的走商文化，但在当时，路边摊市场仍被视为“投机倒把”。转折发生在1982年6月的一天。在县城摆摊经常被有关部门“围堵”的农妇冯爱倩，在县委机关大院外拦住了谢高华，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地摊。当时，谢高华到任义乌才一个多月，冯爱倩的话让他深受触动。

此后，谢高华着手对义乌的农民和城里的摆摊者进行了深入调研。他认为，如果农民从事小商品售卖能吃饱饭，甚至致富，那就高度契合党中央的精神；党委和政府要顺应民意，给市场松绑。当时政策不明了，不少干部顾虑重重。在一次县机关大会上，谢高华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1982年9月，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由义乌县政府发出通告。这是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义乌小商品市场因在全国率先开放而抢占了商机。到1982年底，市场已有30多个大类2000多种小商品，吸引了国内10多个省份的客商前来采购。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又发出“四个允许”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进一步为城乡经济松绑。

1984年，谢高华结合义乌实际首创提出“兴商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随着义乌撤县建市，“兴商建县”变成“兴商建市”，内涵也不断与时俱进。谢高华曾回忆说：“当时改革情况复杂，我们也有很多情况搞不清。我就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

面对各种赞美之词，谢高华却说：“义乌市场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义乌人民创造出来的，它凝结着历届义乌党委、政府精心培育的心血。”至今，谢高华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也未持有任何义乌企业的股票。就连有一次在上海工作的孙女想到义乌考察市场，他也一再叮嘱，不准打着自己的旗号在义乌谋便利。

1985年，谢高华回到衢州任职，在那里，他力推乌溪江引水工程上马，并担任工程总指挥。一双解放鞋、一顶斗笠、一把雨伞、一双套鞋，是谢高华办公室里必备的“四大件”。那段时间，他吃在田头、住在工棚，白天经常和干部群众一起坐在泥地里，边吃饭边谈论工作，晚上又常常开会到第二天凌晨。他带领一班技术人员，不分昼夜地奔走在乌引工程沿线，对相关情况进行一轮轮论证。1994年8月4日，乌引工程胜利竣工、全线通水，彻底解决了困扰数代金华、衢州百姓的干旱问题。许多衢州干部群众感慨，没有谢高华的执着努力，这项被后人誉为“江南红旗渠”的乌溪江引水工程很难如期完成。

2019年10月23日，谢高华因病抢救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88岁。10月23日18时许，记者见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代经营户冯爱倩时，她已哭红了双眼，家人在一旁不停地安慰。当天下午，得知谢高华正在医院抢救，她赶紧叫家人安排车辆想去探望，可还没来得及出发，就被告知“谢老走了”。那一刻，她的泪水止不住往外流。“快40年了，我们义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这位为义乌市场‘开天辟地’的好干部。”冯爱倩激动地说，“我们做人做事要低调”“我是人民的儿子，做人不能忘本”“有党和国家的政策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要多干事去回馈社会，不要忘了初心”，“老哥”谢高华对她说的这三句话，她一直牢记心头。37年前，摆地摊的冯爱倩曾因在县委机关大院外当街拦住谢高华诉苦而出名。“有人说，如果当年我没有这么做，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其实，义乌市场能够在全国率先开放，应该感谢当时谢书记的敢于担当和为民情怀，而我只是义乌市场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直接受益者之一。”冯爱倩说，最近，她在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旧址公园又租下一个摊位，打算重新摆摊经营，“不为别的，就为‘老哥’对我说的那句：不要忘了那份创业的初心。”

# IMG_256**路遥：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

路遥，1949年出生，与共和国同龄，他的原名王卫国，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路遥的父母是实实在在的农民，目不识丁，他们生了5个儿子，3个女儿。路遥的父亲身高只有1.5左右，这样矮小孱弱的身体却要挑起一家十口人的生活。无奈之下，在路遥7岁那年，父亲决定将这个家中的长子过继给自己没有孩子的哥哥——路遥的伯父。路遥的伯父没有孩子，家中也是一贫如洗。

对于被过继的那段经历和印象，路遥曾用自己的文字这样描述过：

“母亲给我穿上新布鞋，整整走了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7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我一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溜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

小时候的路遥是个孩子王，他那种强烈的个性是被公认的。刚刚从出生地清涧乡下，被送到延川郭家沟，对路遥来说俨然是从一个农村来到了县城。他带着外来者的口音，一开始常备欺负和嘲笑。但很快，路遥就收服了全村的孩子。一开始伯父伯母还要为保护路遥，带着萝卜、香芋去邻居家卖人情、讨好，但时间不长，路遥已经凭借自己的能力，脱离了家庭的保护。尽管如此，来到大伯家生活后，路遥依然持续着贫穷的，为钱发愁的生活。上学后，哪怕是几分钱的铅笔，路遥都买不起。小学毕业后，伯父伯母不想让路遥再继续读书，希望他跟上一辈一样做个农民，接他们的班。但路遥不想做农民，更不想像他们一样一辈子挨饿受穷。于是他努力复习考试，考中学时从一千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当地县城最好的初中——延川中学。

由于读书上学需要很大花销，伯父伯母固执的坚持让他留在家中，就给了他锄头让他去山上干活。路遥坚定了读书信念，通过几次和家里谈判，他们终于答应每个月给他25市斤粮票。于是随后在县城里读书的3年，路遥吃不饱就在野地里找东西吃，再凭着同学的接济，他坚持了下来。然而这段饥饿、屈辱的人生经历，也对路遥的人格和未来的创作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6年，路遥初中毕业，考上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如果顺利的读书毕业，路遥便可以借此跨入城镇人口的行列，得到一份工资不错的工作。然而在入学的第一个暑假，国内一场政治运动开始了。路遥在回顾那一段时期时，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渺茫无知……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在这场没有输赢的政治运动的末端，路遥有了一个意外收获，1969年他认识了一位作家朋友曹谷溪。曹谷溪把路遥叫回了延川县委工作。1970年，路遥在延川县文化馆编辑的油印小报《延川文化》上发表了《车过南京桥》的诗作。1972 年秋天，路遥被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同年，在曹谷溪努力下，延川县成立了“文艺创作组”，创办了铅印的文学刊物《山花》，由几个在不同单位的文学青年共同编辑，路遥是其中之一。这期间路遥写了很多诗。1973年，路遥被延川县委书记申易推荐，上了延安大学。

1976年8月，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工作。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当时的政治运动尚未结束，路遥便以敏锐的远见，洞察到事情的走向，写出了这篇声讨当时政治运动的六万字的小说。他开始将小说寄给各个刊物时，全部被退回，没人敢发。他气愤懊恼之际，声称要将作品全部撕毁。后来《当代》发表了他的这篇小说，才得以获奖。

这部小说获奖后，为路遥带来了文学创作前所未有的自信。

1981年夏天，路遥来到甘泉县的一个招待所，开始了21天的疯狂创作。当时32岁的路遥，在21天，日夜不分的创作，完成了一个13万字的中篇小说。当时他每天在屋子里写作18个小时，满屋都是烟雾弥漫，烟头装满了一簸箕。桌子上都是硬馒头，路遥像拼命一样的写作，五官溃烂、大小便不通畅、刷牙时满嘴都是血。《人生》完成后，依然是寄出给几家刊物，全部被退稿。但路遥坚信：这是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作品。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彻底的失败。果然，最后这部《人生》让路遥一举成名。并以最快的速度被改编成了电影剧本。

1982年，路遥开始了《平凡的世界》创作前的准备工作。他列了100多部的书单，用了1年时间去翻阅近10年的各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笔记都做了几十本。《平凡的世界》一共分为三部，第一部完成后，过去发表过路遥作品的刊物都退稿了，只有广东的《花城》杂志愿意发表。文学界的普遍声音是，路遥的作品让人失望，相比《人生》是退步的。路遥顶着巨大的压力，曾在柳青的墓前哭泣。但他始终坚持，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于是在1987年，路遥坚持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咳血。弟弟王天乐曾经劝路遥停止第三部的写作，但路遥坚持，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于是6年，巨作终于完成，并于1988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而此时的路遥已经耗尽全身力气、精疲力尽、形如枯槁。1992年11月，年仅42岁的路遥因消化道出血、肝硬化无药可医而离世。他生前曾和弟弟王天乐苦笑道，我这一辈子，没吃没喝、还打了半辈子光棍。

42岁早逝，显然是一种遗憾，然而活着，路遥依然不会放弃自己的对目标和使命的追求，他就像是天生要为这些背负而生一般，永不停歇，所以离开何尝对他又不是一种解脱。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这说的就是路遥的一生。苦难相伴、挫折相随、但却激发了他更强的斗志和对生而为人意义的穷尽追求。路遥对当时他身处时代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即使在今天，拿起他的书，读到那些文字，仍然能让人感受到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顽强的坚持自我、坚持对远大理想不断追求的伟大灵魂的力量。他笔下的人物，给那些出身卑微的人以勇气和力量，让他们走的更远。他也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一个作家的坚毅和顽强， 他必然将被历史载入不朽的史册。

# **“863”计划倡导者：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

在关键时刻，总有一群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始终胸怀祖国和人民，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中国怎么办？他们勇立潮头、殚精竭虑，积极建言献策，让“发展高科技”从此成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朱光亚等科学家对此建议也极力倡导。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由于促成这个计划“建议”的提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都发生在1986年3月，因而这个计划被命名为“863计划”。

1987年3月，“863计划”开始正式实施。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万名科学家在各个不同领域，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践充分证明，高科技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如何让中国真正拥有自己的高科技，掌握战略竞争的主动权？经历过“两弹一星”科研攻关的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对此十分关切。“我心里急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彼时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几乎急得夜不能寐。“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认为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在生前接受采访时，杨嘉墀曾表达了他的看法。杨嘉墀是著名的航天专家，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1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3年，这位老人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从此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世界，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国空间技术的前景及高技术的发展问题。据杨嘉墀回忆，在各种讨论会上，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等科学家观点相近，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陈芳允敲响了王大珩的家门。经过一番长谈，二人决定，由王大珩起草一份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项目的建议书。

熬夜工作，对于陈芳允和王大珩来说都不陌生。陈芳允是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量控制系统就是由他主要负责研制的。王大珩是我国光学事业的先行者，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原子弹、导弹技术，王大珩担任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项目的总工程师，经过五年多努力获得成功，使我国光学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着这些曾经立下不朽功勋的老科学家们，即便年事已高仍心系祖国的科技发展和进步。“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王大珩曾说，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这份建议书王大珩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修改整理了多遍，最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初稿写好后，王大珩当即交给陈芳允提意见，陈芳允在建议书中补充了高科技与国民经济的内容。随后，建议书分别送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手上。王淦昌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淦昌就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从1961年至1978年，王淦昌为研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出于保密的需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隐姓埋名长达17年之久。看过王大珩起草的建议书后，王淦昌和杨嘉墀表示完全赞同。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四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如今，当人们重读四位老科学家起草的初稿，许多重要的判断仍不过时。

“863”计划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出的一个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高技术发展计划，担负全局性的、中长期的、重大的战略任务，带动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实现由点到面、由跟踪到创新发展的跨越，已成为科技自强自立的一段重要历程，始终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动力。人们应当永远铭记，35年前的那个春天，四位胸怀国之大者的老科学家高瞻远瞩的重要建议。

#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1978年冬，一个改革创新的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18位带头人的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1978年安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为了不再挨饿、不再讨饭，18位庄稼汉将家人“托孤”，把分田到组“秘密”改为分田到户，搞“大包干”。18个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范本。“在当时的政策下，农民到地里去，不管怎么干活都一样，思想已经被搞乱了。”关友江介绍，“最后造成不够吃，国家供应又不够，就只能去讨饭”。纸包不住火，“秘密”很快被公社得知。“小岗村的牛草贷款、粮种贷款全部被扣下来，不给了，粮农贷款也不给了。”严金昌回忆称，“实在没办法，为了吃饱只能走这条路，没有粮食没有种子，我们只能到处去借，硬是度过了难关。”实行“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获得大丰收，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以往5年的总和，1979年的春节，小岗村人第一次不用出门讨饭。“包产到户”很快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这种做法被巧妙地称为“大包干”。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到小岗村考察，看到有这么多粮食，看到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感到很自豪。“大包干”获得了万里的力挺，1979年3月16日，针对《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甘肃省档案局原干部张浩来信，万里说：“是或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时间来检验……”3月19日，万里在《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的谈话中指出：“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中央在1980年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75号文件后，又连续几年发出中央1号文件，使“大包干”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并不断得到完善，成为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制的主要形式。

时间很快进入八九十年代，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这段时期中国农村的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四大发展要素向城市“净流出”，许多农村地区发展缓慢，保持传统农业劳作模式的小岗村也给外界形成了“一夜跨过温饱线，30年未过富裕坎”的印象。“出去打工的人很多，家家户户都有。”严金昌感叹，“一个地方的发展要靠人才，没有人才是发展不起来的。”2004年2月，安徽省委选派财政厅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这个“省城人”的到来扭转了这一切。任职之初，背负着“镀金”猜疑的沈浩，干得并不轻松。他着力在穿着、语言表达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将自己彻底“农民化”，活跃在田间地头调研考察。经过多次与村“两委”成员、“大包干”带头人谈心，以及组织干部群众到华西、大寨学习，沈浩迅速理清了发展思路，“敢想敢干”的小岗村人确定了“发展现代农业、开发旅游业、招商引资办工业”三步走的发展思路。几年间，小岗村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大学生进村创业，发展双孢菇生产；土地流转起来，铺开了4300亩高标准农业示范田、葡萄种植园；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等红色景点；一半以上村民办起农家乐，平均两家一个超市；GLG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落户。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淮南网日报评论：18颗血红血红的手印，是18位农民的18颗红心，为了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小岗人敢为天下先，甘愿搭上身家性命！随着摁下18颗红手印，沉闷的天空响起了第一声惊雷！随着摁下的18颗红手印，人民公社那冰封的冻土，从小岗村的田头撬开第一条裂缝！随着摁下的18颗红手印，多少渴望温饱的心砰然萌动，千村万户传递小岗村的消息，8亿农民用大包干的秘密武器追杀穷困！欣喜的庄稼人砸开了精神枷锁，包产地里响起了自由劳动的歌声，结束了鸡蛋换油盐的可怜日子，农民的锅里有了油花的翻腾……

#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群体：为国出征叩苍穹**

2021年6月9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这表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即将搭载着3名航天员飞向太空。

这是继2016年神舟十一号任务之后，中国航天员时隔5年再赴太空，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自1998年成立后执行的第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1998年1月5日，来自祖国各地的14名优秀飞行员，齐聚北京航天城。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他们庄严宣誓：“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成为航天员是我至上的光荣……”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了。2010年5月，又有7名飞行员光荣地加入这支队伍，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2018年5月，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于2020年选拔出符合条件的18名预备航天员（含1名女性），他们经过系统训练后将参加空间站运营阶段各次飞行任务。

20多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全体航天员胸怀强国梦、矢志强军梦、献身航天梦，以九天揽月的雄心壮志和征战太空的超凡本领，先后14人次勇闯苍穹，巡游太空68天，行程4600余万公里，勇夺6次载人飞行任务的全面胜利，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强国强军的伟大征程中立起了先锋楷模的时代标杆，先后有3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4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人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人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11名航天员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航天英雄”“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航天员大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大队”荣誉称号，1名航天员荣获“八一勋章”，航天员群体荣获“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称号。

2003年10月15日9时,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圆。10月16日6时, 太空飞行一天后，神舟五号飞船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人首次飞天活动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两年后的又一个金秋——2005年10月12日9时,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被顺利送上太空。第一次进入轨道舱,第一次进行航天医学空间实验研究,第一次进行压力服脱穿试验……神舟六号进行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多人多天飞行试验,完成了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

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载着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飞向太空。27日16时43分,翟志刚穿着我国自主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在刘伯明的协助下打开舱门,迈出了中国人在浩瀚太空中的第一步，我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

2012年6月16日18时37分,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搭载着景海鹏、刘旺和我国第一位飞天女航天员刘洋飞向太空。6月24日,刘旺操作飞船从140米外向天宫一号靠近,取得了首次手控交会对接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全独立自主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3年6月11日17时38分,神舟十号飞船搭载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3名航天员发射升空。在轨飞行期间,航天员进行了面向全国青少年的中国首次太空授课活动。

2016年10月17日7时30分,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托举下,航天员景海鹏、陈冬乘坐神舟十一号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飞向太空，并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进行自动交会对接。2名航天员在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组合体内驻留30天，完成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时间新纪录……在中华民族的奋进史册里，飞天勇士叩问苍穹无疑是最精彩的篇页之一。今天，他们继续书写着新时代的新华章。



**毛相林：敢向绝壁要“天路”**

深秋，山谷。一条路，蜿蜒曲折如苍龙，一头扎入谷底村庄，一头通向群山之巅。这是下庄村的出山公路。“我干了40多年村干部，最大的事情就是修了这条路。”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举目四望。那片山，曾将祖祖辈辈死死困住；山上，埋着6个为修路牺牲的兄弟……

1997年，38岁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作出惊人决定——修公路。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被四面千米高山绝壁合围，犹如坐在一口井中，修路难如登天。当时唯一的出村路，是一条“108道拐”的古道，去县城一来一回至少4天。住在“井底”的近400名下庄村民，近一半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贫穷闭塞成为下庄人难以摆脱的宿命。“咱不能一直当穷汉，就算再难，我也要带头冲一冲。”毛相林在村民大会上给大家鼓劲：“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那年冬天，改变下庄人命运的这条路开工了。全村青壮年带着工具和干粮上山，吃住在山洞，睡觉就在腰间拴根绳子，另一头在老树根上打个结，以防夜里翻身掉下悬崖。为了早日修通公路，毛相林在山上住了3个月没回家。

修路远比想象的难。四周陡峭岩壁，很难找到落脚之地，胆子大的腰系长绳站在箩筐里，吊在几百米高的悬崖边钻炮眼，先炸出一小块立足之地，再用锄头、钢钎和大锤，一块一块把石头凿下来。村民杨亨双回忆，有一次钻炮眼，他站在悬崖边，腿抖得凶，头顶还不时掉碎石。就在那时，毛相林说，你们都别动，我先下去探探底，一个人系上绳子下去了。工地上，遇到危险情况，毛相林总是第一个上，最重的活总是他带头干。

开工修路第三年，不到两个月，接连有2名修路的村民献身。26岁的村民沈庆富，在修路时被一块巨石砸中，滚下几百米深的山谷。安葬沈庆富没多久，专门从外地回乡修路的36岁村民黄会元，也被滚落的石头砸中。村民自发前来，为黄会元送行。看着黄会元悲痛欲绝的家人，毛相林无比愧疚，他声音颤抖着问大家：“如果再修下去，可能还要死人。今天大家表个态，这路到底修还是不修？”“修！”有人大声吼道。回应的人，正是黄会元的父亲黄益坤。“我儿子死得光荣。路必须修下去，人不能白死。”老人说。在场所有人举起了手。毛相林忍住泪水，立下誓言：就算我们这代人穷10年、苦10年，也要把路修下去，让下一代人过上好日子。此后，又有4名村民为修路献出了生命。为早日走出大山、拔掉穷根，下庄人没有退缩。2004年，在毛相林带领下，下庄村人用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8公里长、2米宽的机耕道。这是他们走出大山的路，这是他们走出贫困的路——下庄人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虽然出山公路通了，但在当时，大多数下庄村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下。毛相林“趁热打铁”，带领村民种植柑橘，力争尽快脱贫。不曾想，村里的500亩柑橘生虫，几乎绝收。毛相林召开村民大会，当众检讨：“发展产业不能靠蛮干，做事不怕失败，关键是要从失败中找到原因。”村民们又一次支持他。大家说，当年修路那么苦都过来了，现在这点困难算什么？县里派来了柑橘栽种技术专家，手把手培训村民。几年后，村里柑橘产业“起死回生”，柑橘产量接近40吨。

今年63岁的毛相林，把最好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2015年，下庄村整村脱贫；到2019年底，全村累计64户269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为0.29%，人均收入达1.2万元。从这条路走出的年轻后辈，正在接棒家乡的振兴事业。29岁的毛连长，回到下庄做电商，叫卖柑橘、西瓜等土货；27岁的彭淦，是下庄走出去的第一批大学生，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教师……毛相林还有更大的梦想：不单下庄人要走出去，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近年来，巫山县发展乡村旅游，下庄村19栋农房改造成民宿，开始接待山外来的游客。“再过两三年，旅游搞起来，我们的收入还会翻番。”毛相林信心满满。

# **王继才、王仕花：夫妻哨所 守卫海疆**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会一直守到守不动为止。”这句朴实无华的话出自“守岛英雄”王继才之口。在长达32年的岁月里，王继才与妻子王仕花默默守卫着祖国东隅的一个小岛，用生命践行自己的誓言。

1986年7月，26岁的生产队长兼民兵营长王继才被县武装部派到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守岛。开山岛是黄海前哨的一级战备岛屿，面积仅0.013平方公里，距离最近的海岸12海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也是渔民们口中“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飞鸟不做窝，渔民不上岛”的不毛之地。1985年驻岛部队撤编后，这里设立了民兵哨所，但因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有人劝王继才不要去“坐水牢”，可他的回答只有短短一句话：“你不守，他不守，这岛，谁守？”

王继才刚到时，开山岛上只有漫山野草和几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老旧营房，没水没电。王继才怕妻子王仕花不同意，瞒着她偷偷上了岛。48天后，王仕花才找到了“失踪”的丈夫。看到这里的恶劣环境，王仕花尽管哭着劝丈夫“别人不守咱也不守”，但放心不下丈夫的她仍辞掉了教师的工作，毅然来到开山岛，与王继才组成两个人的哨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开山岛上陪伴王继才夫妇的只有3只小狗、5条净化水的泥鳅和3只不会打鸣的公鸡，一切吃喝全靠岸上供给。在这样的环境里，王继才与妻子以岛为家，与孤独相伴，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即使无人监督、无人观看，王继才、王仕花依然坚持每天两次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每天早上5点，夫妻俩都准时在岛上举行升旗仪式，王继才负责展开国旗，响亮地喊声“敬礼”，王仕花站得笔直，仰着头边敬礼边注视着五星红旗。王继才说，开山岛虽小，但必须每天升起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才让人觉着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为了守好开山岛，王继才、王仕花夫妇舍小家为大家，32年中只有5个春节与家人团聚，父母去世、女儿结婚，都没能及时赶回。王仕花生儿子时，海上刮起台风开不了船，王继才只好当起接生婆，亲手剪断儿子的脐带。夫妇俩不是不知家庭的困难，可是在守岛和个人生活之间、国家和小家之间，他们选择了守卫国土，把对父母的孝和对家庭的责化作了对祖国的大忠大爱。

2014年，王继才夫妇被评为全国“时代楷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军民迎新春茶话会上亲切会见了王继才等全国双拥模范代表。受到总书记勉励的王继才觉得：“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我们更要守好开山岛，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就要守岛守到守不动为止。”然而，2018年7月27日晚，王继才在驻守期间，突发急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8岁。

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王继才去世后，王仕花担任了开山岛民兵哨所的名誉所长，继续着丈夫的事业。在王继才、王仕花事迹的感召下，一个又一个守岛卫士接过他们的旗帜，继续守卫祖国海疆，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传承他们的精神，继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篇章。

# IMG_256**艾热提·马木提：用生命守护一方安宁**

“英雄艾热提，我们也有了您的样子！”2020年清明节，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公安干警在百忙中发起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纪念活动——通过网上献花、诗歌寄语表达对“人民英雄”艾热提·马木提的崇高敬意和缅怀之情。

艾热提·马木提，1969年10月出生，新疆皮山县人。他于1989年7月从新疆人民警察学校（现新疆警察学院）毕业后，便回到家乡参加公安工作，199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皮山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所长，科克铁热克派出所所长，皮山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等职。

艾热提·马木提心里始终装着一个誓言——忠实履行人民警察职责，鞠躬尽瘁、义无反顾。参加公安工作后，他政治立场坚定、性格勇敢顽强、工作认真负责，积极投入到与“三股势力”的激烈斗争中。

“他什么工作都带头干，总是冲在最前面，处处以身作则，对案件处理公平公正，对后辈既爱护又耐心教导。”作为艾热提·马木提带出来的徒弟，科克铁热克派出所现任所长木塔里甫·麦麦提每当回忆起他，都由衷地钦佩和怀念。

2013年，在执行一次抓捕任务时，艾热提·马木提带领民警一同进入暴恐分子藏匿的房间。在遍搜无果后，他对角落里的一个柜子产生了警觉，急忙提醒大家：“不要动！”但柜门已被一名民警拉开。就在暴恐分子气急败坏跳出柜门挥刀砍向这名民警的同时，艾热提·马木提果断开枪将其击毙。

自2014年新疆开展“严打”专项行动以来，艾热提·马木提带领民警破获危安团伙77起811人，收缴爆炸装置320枚，严厉打击了暴力恐怖违法犯罪活动，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对敌人打得要狠，对人民群众爱得要真。”这是艾热提·马木提常说的话。

2015年7月3日9时07分，皮山县发生6.5级地震，造成科克铁热克乡4000余间房屋倒塌，群众损失惨重。艾热提·马木提的家就在科克铁热克乡，但他顾不上回家看一眼，就主动请缨，第一时间参加救灾工作。地震当天，他带领民警从废墟中救出20余名群众，疏散群众5000多人次，抢救群众财物价值10余万元。救灾工作告一段落后，艾热提·马木提回到家里，看到妻子正带着3个孩子清理自家受损的房屋，他满怀愧疚地对妻子说：“是我不好，让你受累了。”

从警以来，艾热提·马木提13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先进个人、优秀党员，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5次，2010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评为“全疆人民满意派出所所长”。

2016年9月10日，艾热提·马木提带队抓捕藏匿于皮山县一个村庄荒地的公安部A级通缉令通缉在逃人员、制爆团伙头目阿某。就在他和民警们收紧口袋，把暴恐分子围困在一处灌木丛中准备擒获时，暴恐分子突然发起自杀式袭击。“隐蔽！”艾热提·马木提大喝一声，同时拔枪射击。随着爆炸声响起，艾热提·马木提应声倒地，血流满面，虽经皮山县人民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不幸壮烈牺牲，年仅47岁。

艾热提·马木提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他生前工作过的科克铁热克乡和皮山县城的各族群众都自发赶来参加他的葬礼，送他最后一程。2017年1月24日，公安部追授艾热提·马木提“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2019年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艾热提·马木提作为全国公安民警代表，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 IMG_256**张超：为祖国奋飞**

从初教机到高教机，从二代机到三代机，从陆基飞行到舰载飞行……他先后飞过8种机型，数次主动放弃更轻松的岗位，选择为祖国召唤、为军人使命而奋飞。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最割舍不下的仍然是飞行。他，就是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原一级飞行员。

从儿时起，张超就对天空充满向往。而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想法，在他14岁时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那是2001年，发生在南海的中美撞机事件中，“海空卫士”王伟英勇牺牲，举国上下悲痛不已。当飞行员，成为张超和许多像他一样的热血青年的共同心愿。17岁那年，张超终于如愿以偿。2009年，经过5年培养和训练，张超迎来毕业时刻。作为优秀毕业生，他有相当的把握留校任教。但他坚决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到王伟战斗过的地方，做一名战斗员。时任团长邱柏川至今记得，初次见面时，他问张超“为什么来”，张超脱口而出，“我是冲着英雄王伟来的。”沿着英雄的航迹，张超驾机起飞，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自我超越。2010年，改装歼—8，张超成为同批次首个单飞的飞行员和首批长机飞行员，是全团6名“尖刀”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时隔两年，改装新型三代战机，张超又是同批飞行员中首个单飞的，并提前4个月完成改装任务，刷新多项纪录。张超越飞越勇、越飞越好，更加广阔的海天向他敞开怀抱……

“舰载机飞行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危险的飞行，你愿不愿意来？”我知道危险，但就是想来。”这段面试时的对话，提问者是作为考官的“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戴明盟，回答者是张超。那一年，海军决定在三代机部队破例选拔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超第一时间报了名。彼时，中国航母舰载机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2012年9月，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入列，同年11月23日，戴明盟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阻拦着舰；2013年5月，人民海军第一支舰载航空兵部队成立；2014年底，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成功完成舰上起降。对于张超的选择，反对的声音一开始就有。毕竟，他此时已飞过6种机型，单位正准备提升他为副大队长；妻子带着不满1岁的女儿刚刚随军，正需要工作、生活的稳定。可张超心里清楚，这次“破例”意味着什么。同班的飞行员2013年就开始了学习训练，他如果能在1年内追上训练进度，就说明新的训练方案可行，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训工作将随之换挡提速。“小伙子很沉静，不张扬，主动要求来的愿望特别强烈，一看就是纯粹追求飞行事业的飞行员。”谈及面试时对张超的第一印象，戴明盟记忆犹新。2015年3月，张超成为当时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开启了飞向航母的“加力模式”——加入舰载战斗机部队1个月，他完成了理论改装；6个月时，他追平了训练进度；10个月时，他第一次驾驶歼—15飞机飞上蓝天；截至2016年4月，张超已经完成上舰前93.24％的飞行架次。所有课目的考核成绩，都是优等。上舰的日子，近了；深蓝的海天，也近了……

2016年4月27日，一个寻常的飞行日，也是张超加入舰载航空兵部队的第九十个飞行日。这一天，按照计划，张超和战友们要飞3个架次的低空、超低空训练。后因天气有变，第3架次被调整为陆基模拟着舰训练。12时59分，张超驾驶117号歼—15飞机进入着“舰”航线。降低高度、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滑行……那片被称作“黑区”的模拟航母飞行甲板上，又一次记录下属于张超的成长印迹。可就在战机刚刚滑行2秒钟时，突发电传故障。飞参记录表明，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张超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挽救飞机。由于弹射的高度过低、角度不好，张超被重重摔在了跑道旁。前往医院的路上，他留给战友最后的告别：“我是不是要死了，再也飞不了了……”张超走了，但他的精神始终与中国航母舰载机事业同在……

# IMG_256**张桂梅：红土高原一枝梅**

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一位被工作人员搀扶着步履蹒跚走向颁授台上的老人家，她的双手贴满了止痛膏药，她身形消瘦、面容沧桑，但她的眼神却溢满了慈祥。她就是张桂梅！是一名中共党员，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上，张桂梅说她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但她所做的实际贡献却没有她口中所说得那么轻描淡写。她用她的双手放飞了无数女孩的梦想，她用她的背扛起了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办学压力，她用她的双脚走访过每一个孩子的家中……

张桂梅曾任团支部书记、政治教员、文书、团支书等。后来有机会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她就爱上了这个人民教师职位。她从刚刚开始接触这个教师职位的懵懂到努力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称职的人民教师。后来她认识了一名白族小伙子，与他结婚后，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张桂梅与丈夫结婚后就在大理市一所中学里教书，婚姻与工作都很幸福美满，不幸的是张桂梅的丈夫患上了胃癌，张桂梅为了给丈夫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可惜的是她的丈夫最终还是离她而去了，张桂梅悲痛不已，看着与丈夫生活、工作的大理市，她的精神状态逐渐低落。于是主动申请调到偏远的丽江市华坪县工作。到华坪县教书后，她看到了大山的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也愿意去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她像这群学生的妈妈一般，担心他们的吃穿住行，关心着他们的学习成绩，呵护着他们柔软的内心世界。被张桂梅教过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张桂梅为——妈妈！

张桂梅的教学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华坪县教书后张桂梅发现有许多女学生相继退学，不来上学了。张桂梅很是无奈心痛，去这些女学生家中走访，发现有的女学生父母让她回去干农活，有的是因为女学生父母收下了彩礼，让孩子辍学结婚……张桂梅努力争取孩子们读书的机会，却面对这些顽钝固执的父母无计可施，让孩子们不能读书的背后都是华坪县地方偏远、大部分家庭贫困、“重男轻女”的思想封建导致的。在华坪县教书多年，她早起晚归，白天上课巡课，监督学生们做早操、学习；晚上批改作业、待学生们都入眠后，才拖着自己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己宿舍休息。 张桂梅在孩子们眼中，在学习上她是严师，在生活上她是温柔、慈爱的母亲。张桂梅一直知道“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她以身作则教育着孩子们，给孩子们树立起好的榜样。她也明白光靠自己以身作则是不够的，所以张桂梅经常给孩子们讲述着革命先烈的事迹……在张桂梅的以身作则下，她的学生从未出现过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是全校纪律最好的一个班级。

在1997年，张桂梅被检查出了子宫肌瘤，腹腔迅速膨胀、疼痛难忍。她偷偷地把诊断报告藏起来，没有告诉学校的领导、同事，也没有告诉学生，默默地忍着病魔的折磨。张桂梅没有因为病魔减少自己工作量，反而加大自己的工作量与学生们的学习量。她吃着止痛药，批阅学生作业直到深夜。这样子的状态坚持到七月份，张桂梅把学生们送进了中考考场后，才告诉领导、同事，去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后，医生让张桂梅最少休养半年后再去教书，可张桂梅怎么可能放心得下她的工作和她的学生，她手术后，休息不到一个月就回学校继续工作。由于伤口还未痊愈，疼痛一直折磨着站在讲台上的她，但她却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肯放松。后来，张桂梅病情复发，学校的领导、同事、学生都劝她住院治疗，她就是不肯。她说：“我的事业是教书，我的希望是学生，不把他们送出学校我是不会先走的。”之后张桂梅的病情反复，也不愿意去治疗，学校的领导、同事们说：“我们需要你活着，华坪人民需要你活着，请你服从安排吧。”张桂梅才同意去治疗。张桂梅这种被病魔折磨却不愿意放弃自己岗位事业的精神深深感动着学校的每一个人。张桂梅说过：“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我有企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在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张桂梅被推选为院长。当时的她身上还拖着病，她的工资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之外，全部都用来接济学生，甚至是把药停了，用来资助学生。张桂梅成为福利院院长后，她还要管着50多个孤儿的衣食住行。管理50个孩子谈何容易，方言的差异，小孩子之间的打架争吵都需要张桂梅时时刻刻地管理、呵护，她努力地培养自己与孩子们的感情，细心温柔地照顾他们。张桂梅的全部精力与心血全都给这群学生、孩子。

担任院长之后，张桂梅在了解孩子们的身世后发现，有一些女孩子并不是孤儿，而是被父母遗弃的。后来在一次家访中遇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因为父母为了彩礼，强迫她辍学嫁人，在女孩的哭喊中，张桂梅想要带女孩子走，女孩母亲以死相逼，张桂梅无奈放弃。张桂梅发现有许多女孩子读完初中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之后就相继嫁人的现象。张桂梅希望山里的女孩子能够继续读书，继续接受教育，希望以知识的力量改变她们的命运。

这一系列的“悲剧”的发生，让张桂梅心痛不已，她开始萌发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让这些女孩子都能够读书！办一所学校哪有那么简单，教资方面的不足，资金的欠缺……创办一个高中可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个事情需要人力与资金，所以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帮助，于是从2002年起，张桂梅利用自己的假期去各地街头募捐，把自己获得的各种先进奖状与荣誉证书复印了一大堆，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在募捐的那段时间里，张桂梅放弃自己的体面与尊严，但得到的却是白眼与不屑。张桂梅累得不行，困了就直接在墙根边睡下去了。到最后张桂梅只募捐到了一万多元，她心灰意冷，正准备放弃了，一个转机出现了——在2007年，张桂梅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张桂梅的所有积蓄全都给了学生与福利院的孤儿们，身上穿的衣服全都是破旧的。在即将去往北京的时候，县里特地资助张桂梅7000元，让她买一身像样的正装，可刚好她的学生需要一台电脑，她转手就把钱拿给学生买电脑，自己穿着一身旧衣服前往北京。张桂梅匆匆忙忙来到北京开会，却不知道自己的裤子何时在家访中磨破。一个女记者拉住了她，小声提醒张桂梅裤子破了。张桂梅才发现到，一时间羞红了脸。后来党的十七大会议结束后，她与这位女记者聊天到深夜。女记者以张桂梅的事迹写了一篇报道《“我有一个梦想”——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这篇报道播发后，张桂梅的梦想——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关注。张桂梅用她的行为、用她的赤子之心感动了全国各地的人们！终于，在2008年，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成立！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首届共招收了100名女生。

万事开头难，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校虽然已经建成了，但在学校管理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张桂梅校长应接不暇。半年后100名学生中有6人退学，17名老师中有9人辞职。这些事情的发生，让张桂梅突然心灰意冷，她快坚持不下去了，差一点儿放弃了。突然张桂梅发现了一件小事情。张桂梅整理老师档案时发现，留下的8位老师中竟有6位都是党员。张桂梅立刻振作起来，她想：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有这么多党员，她不信学校办不下去。于是，她把这6位老师召集起来，他们没有钱，就在带着他们在墙上画了党旗，让大家对着党旗重新宣誓。宣誓到一半时，每个人都便咽落泪了。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成立以来，张桂梅已家访超过1600户，行程11万多公里。因为教书与照顾学生，长期累月过度操劳，身患骨瘤、血管瘤、肺气肿等20多种疾病。一张张诊断书也阻止不了张桂梅继续为教学事业奋斗！在他们的坚守下，全国第一家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级中学逐渐走向平稳！自从2008年建校以来，直到2021年，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累计让近2000名女孩考上了大学，学校本科上线率、一本上线率稳居云南省丽江市前茅！现在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上了大学的学生对张桂梅说：上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入党，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学生能有这样子的思想离不开张桂梅每周组织的一节思政课，张桂梅会给学生们讲述革命先烈的事迹，带着学生们读党章，也会讲起刚开始创办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艰苦心酸经历。张桂梅校长在学生心中深埋一颗颗红色的种子，帮她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着她们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在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张桂梅的发言中在说到：“在党的关怀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华坪儿童之家、女子高中先后建立，近2000个女孩考入大学，172个孤儿有了温暖的家”。张桂梅忍不住哽咽了。在人民大会堂荣获“七一勋章”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张桂梅就急忙忙从北京回到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张桂梅说：“姑娘们想我了，我得赶快回学校，守着她们学习。”已经64岁的张桂梅无时不刻不挂念着她的学生，“让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

张桂梅，扎根穷困地区40多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为1800多名大山女孩放飞梦想。她自己身患着20多种疾病，却一声不吭；她的坚韧执着与她的无私奉献，诠释了共产党员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模样。

## IMG_256**张富清：深藏功名，初心不改**

71年前，他是西北野战军的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炸掉敌人四个碉堡，战功卓著，是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64年前，他退役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穷山区奉献一生。从此，赫赫战功被他埋在心底，只字不提。7年前，他88岁，左腿截肢，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更为了让子女“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装上假肢，顽强地站了起来。现在，他95岁，仍然坚持学习。他说：“人离休了，政治上思想上绝不能离休。”……

所有这些，只因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就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战士张富清。

2018年12月3日，来凤县城。来凤县委政法委干部张健全，小心翼翼地怀揣着一个包裹来到县人社局。彼时，县里正在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张健全带来的东西，是父亲张富清一生珍藏的宝贝。“那是下午5点20分，我正准备下班。看到闪耀着光芒的勋章，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对那天的情景，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专班信息采集员聂海波记忆犹新。在聂海波注视下，张健全郑重地一一取出包裹里的物品——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立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一份西北野战军的报功书，讲述着张富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大字……激动地看完张健全带来的材料，聂海波深感震撼：“没想到我们来凤还隐藏着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这是立功证书对张富清1948年11月参加永丰战役的记载。发生在陕西蒲城的永丰之战，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战况异常惨烈，“一夜之间换了八个连长”。对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95岁的张富清仍历历在目。张富清所在的连是永丰战役突击连。张富清又是突击连的突击班成员。27日夜，他和两名战友匍匐前进，扒着墙砖缝隙攀上城墙。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城墙，与围上来的敌人激战。“我一转身，看见敌人将我围住了，就端起冲锋枪扫射，一下子打死七八个。”张富清说，交火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消灭眼前的敌人后，手一摸，发现满脸都是血。原来，子弹擦着头顶飞过，把一块头皮掀了起来……“打死七八个敌人后，我逼近碉堡，用刺刀在城墙底下刨了个洞，把我带的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着了手榴弹，炸毁了碉堡……”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数箱弹药。战斗中，他幸存下来，两个战友却从此杳无音讯……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张富清获得军甲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48年3月参军，8月入党，在壶梯山、东马村、临皋、永丰城等战斗中都冲锋在前——这位陕西汉中小伙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陕西、新疆、北京、南昌、武汉……几经辗转，1955年初，已是连职军官的张富清面临退役转业的人生转折。听说湖北西部恩施条件艰苦，急缺干部，他二话不说：“我可以去！”听说来凤县在恩施最偏远、最困难，没有丝毫犹豫，他又一口答应：“那我就去来凤。”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从武汉动身，一路向西，再向西。恩施是湖北西部边陲，来凤更是边陲的边陲，怀着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憧憬，张富清来了。“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诚，张富清来了。此后几十年，“人民功臣”张富清勤劳的身影，先后出现在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建设银行……双脚却很少再迈出来凤。母亲去世，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工作挑最苦最难的干，从不争名争利。张富清把余生献给了来凤，献给了这片曾经毫无关联的大山。浴血奋战，战功卓著……自从到了来凤，过去的一切，都被张富清刻意尘封起来。60多年，无论顺境逆境，张富清从不提自己的战斗功绩。证书和军功章被他藏在一个随身几十年的皮箱里，连儿女也不知情。

瞒得再紧，瞒不过最亲的人。妻子孙玉兰最清楚丈夫身上有多少伤。右身腋下，战争中被燃烧弹灼烧，黑乎乎一大片；头顶的伤疤至今依稀可见……孙玉兰和张富清是同乡。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几年，村里人都以为张富清已经不在人世了。1954年，张富清回了趟家乡，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共青团员、妇女主任孙玉兰，和长自己11岁的张富清一见钟情。不久后，被爱情召唤的孙玉兰，追随张富清到了来凤。这一来，就是一辈子。上世纪60年代，为给国家减轻负担，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率先动员妻子从供销社的铁饭碗“下岗”。他的理由很简单：“国家困难，我首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占群众、公家的好处……要精简人员，首先从我自己脑壳开刀……”同挚爱的人在一起，多苦都是甜。夫妻俩生养了四个孩子。大女儿患病，至今未婚，常年在家靠母亲看护；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员；两个儿子凭自己的本事上学、工作，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几个子女，没有一个在张富清曾经任职的单位上班。如今，最小的儿子也快到退休年龄。形容自己眼中的父亲，张健全用了一个词：“平凡”。从转业到离休，数十年如一日，张富清像一块砖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乐观、朴实、真诚……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

张富清是“战斗英雄”的消息，在来凤迅速传开了。不少人感到震惊。“只知道他当过兵，没想到他是那么大的英雄。”有人感到不解。“别人没他那么大的功劳，还整天问组织要这要那。他老婆没有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也没见他提什么要求。”有人感到惋惜。“那么大的战功，如果当初留在武汉，早就成了高级干部。”更多的人深受教育和感动。去年，张富清做眼部手术。术前，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行长李甘霖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些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最便宜的，也选了最便宜的。“我已经离休了，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能节约一点是一点。”衣服的袖口都烂了，还在穿；儿子给他买的新衣服，他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张富清的心里，几乎没有他自己。“以前，只不过觉得他大我们一些，工作在我们前头；现在他从我面前过，我都要在心里默默向他致敬！”72岁的来凤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昌恩说。

在张富清简陋的家中，珍藏着一个打满了补丁的搪瓷缸。一面是熠熠生辉的天安门、展翅飞翔的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孙玉兰说，这是丈夫最心爱的物件。从1954年起，这个搪瓷缸就是张富清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补了又补，不能再用，张富清就把它认真保存了起来。上世纪80年代初，张富清一家搬到现在仍居住的建行宿舍。30多年过去，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已翻修一新，老两口的家还是老样子。斑驳的墙壁，褪色的家具……虽然朴素，这个家整洁而充满生气。阳台上整齐地养着一排绿植，像是一队整装待发的战士。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我们面前的张富清，仿佛不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近几年，他仍然坚持自己下楼买菜，有时还下厨给老伴炒几个菜。透过窗户，常常听到他爽朗的笑声……1985年离休后，张富清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他特别爱看《半月谈》。卧室的写字台上，一本2016年版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被他翻阅得封皮泛白。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做着标记——

“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不正是共产党员张富清一生的写照吗？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张富清靠的是一个党员的信仰——“我一直按我入党宣誓的去做……满脑子都是要消灭敌人，要完成任务……所以也就不怕死了。”和平时期淡泊名利、扎根大山，张富清为的是不负入党的誓言——“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讲起这些，这位95岁的老人声音颤抖，泪水溢满了眼眶。英雄事迹传出后，有媒体闻讯而来。张富清拒绝接受采访。记者越来越多，没有办法，张健全只好骗父亲：“这是组织的要求！”张富清这才答应——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张富清最欣慰的，是一家四代有六个党员。考虑再三，让子女拿着立功证书去登记，出发点也是对党忠诚——“党和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我不如实向党报告，那就是对党不老实……”

时光回溯到2018年3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近一个月后，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军人是最可爱的人”“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随着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有序开展，许多英雄事迹，陆续被发掘出来。九旬老兵张富清，不想给党、给国家、给军队添任何麻烦。不久前，在给曾经战斗部队的一封答谢信中，他情真意切地写道：“希望你们坚决听党的话，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张富清当年战斗的英雄部队。年轻的官兵，正紧紧围绕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目标，学习老前辈张富清英雄事迹，立志做新时代革命军人。

2019年3月2日，部队派员专程到来凤，探望老战士张富清。是夜，平素内敛沉默的张健全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眼含热泪，他写下深情的记录——部队来人了/老兵心中掀起波澜/面对军装上的军徽/老兵用一条独腿坚强站立/缓缓举起右手/庄严地行上军礼……

# IMG_256**李保国——太行山上新“愚公”**

“有雨遍地流，无雨渴死牛”“年年种树不见树，岁岁造林不见林”……30多年前，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是太行山区一个典型的贫困村。一名朝气蓬勃的大学青年教师来到这里，立志帮助乡亲们改变面貌。3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他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帮助农民增收35亿元以上，10万农民在他的带领下脱贫致富奔小康。他像一粒种子，无怨无悔地在太行山的土壤中生根开花。4月10日凌晨，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入睡后再也没有醒来，突发性心脏病夺走了他58岁的生命。他，就是共产党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林业专家李保国。

李保国走了，他的手机照样“忙”着。仍有山区的果农不时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向他们的李教授“请教种果树的学问。”那些远在大山深处的人们还在盼着他去教他们种果树。熟悉李保国的人都知道，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无论何时何地，素不相识的农民打来电话，他都会耐心地接听解答。

1981年，李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正逢学校决定在太行山区建立产学研基地。于是，他积极响应号召，走进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邢台县前南峪村。从这里开始到生命的尽头，李保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太行山。“要啥啥没有，种啥啥不活”……当时的太行山，石头多、土层薄、不涵水，水灾旱灾频发。脱贫致富，成了山区群众的“心头大事”。看着那一座座“石头山”，李保国反而来了“杠头”劲儿，把自己天天“钉”在了山上。渴了，喝口山沟里的水；饿了，啃两口馒头；累了，挨着大树靠一会儿；困了，找个大石头眯一觉……他和课题组起早贪黑，跑遍了山上的沟沟壑壑。一个月后，李保国采取“山中造地”的办法聚集土壤和水流取得成功。前南峪的土厚了、水多了，树木栽植成活率从原来的10%一跃达到了90%。李保国因势利导，引导农民栽苹果、种板栗。农民不会种，他舍得下“笨功夫”，面对面讲、手把手教、一家一户盯着人种……几年下来，前南峪不仅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还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之一。“脱贫为科研出题，科研为脱贫解难。老百姓脱贫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前南峪的“致富经”让农民们尝到了甜头，也让李保国心里更有了底。

1996年，一场暴雨冲毁了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面对田间地头的一片狼藉，一向硬气的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哽咽难言。李保国悄悄递给他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一个月后，李保国带着妻子郭素萍搬到了岗底村，一住就是9年。几年后，李保国当初的“一诺”生出了“千金”：岗底卖出了100元一个的“天价”苹果，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百元达到3万多元。临城县城北的狐子沟，遍地砾石，无土无水，开发经济林简直就是一个神话。1996年，临城县绿岭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胜福等合伙承包了那里的3500亩荒山岗，聘请李保国做技术指导。李保国组织课题组专家实测了20多个土壤剖面，最终确定发展种植省水易管理的核桃。在李保国的指导下，大家一手找水源，一手开沟换土改善土质。通过开山换土，一棵棵核桃苗扎根荒山。在临城县，已有1万多农民靠种植薄皮核桃走上致富路。从富岗苹果、绿岭核桃、南和红树莓，到邢台前南峪、平山葫芦峪……他用一项项技术培育品牌，染绿了荒山，澄清了河水，点亮了山区千家万户的希望。

30多年来，正是靠着这一股子“杠头”劲儿，李保国主持完成10多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的科研成果，创新推广36项农业实用技术，直接帮扶40多个村致富，间接带动数百余村脱贫，10万多群众走上脱贫致富的路子。“我是农民的儿子，最见不得农民穷！”农民出身的李保国道出了朴实的心里话。

熟悉李保国的人都知道，他没架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教授”：脸庞黝黑、笑容憨厚，一身尘土、两脚泥巴，扎在人堆里和农民没啥两样。天长日久，奔波在田间地头，皮肤黑，成了李保国的新“标志”，他常常自嘲说；“我是最‘黑’的大学教授”。有人说李保国“土”，但他知道，是因为“土”，农民才能跟他“交心”。“跟农民讲话，不能把给硕士生、博士生上课那一套搬来，得把技术变成农民能听懂、能记住、能做到的话。”李保国说。他专门为农民总结的“口诀”通俗易懂，简单易记——“去掉直立条，不留扇子面”“见枝拉下垂，去枝就留橛”……“跟农民说话就得通俗易懂，满嘴是术语，谁还听？”李保国说。时间一长，农民都喜欢跟李宝国打交道，把他当做“亲人”“近乎人”，更把他当作脱贫致富的“财神”。一次，他开车经过河北内丘县摩天岭村遇到堵车。村民听说他急着回保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人群中有人喊道：“把我家院墙推倒，让李老师的车过去！”没容李保国阻拦，几个人一拥而上，硬是将一村民自家院墙扒开一个口子，让车开了过去。农民把他当“亲人”，他更是把农民的事儿常挂在心上。他手机通讯录里超过三分之一的号码都是普通农民的。由于咨询的人太多，他干脆根据大家的需求，把一个个人名改成了“井陉核桃”“曲阳核桃”“栾城杨核桃”“平山西北焦核桃”“平山苹果”……“山区要脱贫，必须要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李保国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的科研团队和学生。

对学生“严”，李保国是出了名的。每名研究生一入学，就会收到一张任务清单：第一学期完成课程学习和开题报告；第二学期开始在去农村试验基地实习一年……每一项都有详细的要求和明确的时间表。他专门教学的科研团队和学生建的一个微信群叫“桃‘李’之家”，群里他给自己起名叫“老山人”。李保国就像“农民”一样，质朴无华，执着坚韧。农民们心中，他是“知心人”，在学生眼中，他是“主心骨”。30多年来，李保国把课堂建在农村基地，把学生带进太行深山，让学生在生产实践第一线，在与农民群众的结合中。他先后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800余次，培训人员9万余人次。2010年，岗底村191名果农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成为全国第一个“持证下田”的村庄。“搞科研就要像农民种地一样，春播秋收，脚踏实地。扎不进泥土地，就长不成栋梁材。”他说。

李保国走了，那句“我要把我变成农民”的话语，依旧回响在那他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的百姓心中，久久回荡、沁人心脾。

了解李保国的人都知道，他有三个“家”——一个是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太行山里的帮扶基地、一个是他那辆越野车。这些年，李保国每年有200多天、行车4万多公里奔波在田间地头，河北农大家属院里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反倒成了临时落脚的地方。妻子郭素萍说：“他就是这么个人，天天惦记着太行山的事儿，心里就是装不下自己和家人。”有人说，李保国运气好，干啥成啥。他却说：“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能有山、水、林、田、路？是党和人民成就了我。”却不知，为了每一项技术成果、每一个致富项目，李保国付出了怎样的辛劳。

当年为了工作方便，李保国硬是将刚满4岁的儿子和丈母娘接到了山沟沟里生活。一家四口就住在一间房子里，孩子由老人照顾。记得有一次，河北农大的领导去山里看他们，走的时候，儿子爬上了人家的车，死活不下来，哭着喊着说要回保定，想上幼儿园。“没办法，我只好硬把孩子拽了下来。”郭素萍说，她先后两次做手术，李保国都在山上，手术通知单都是她同事代签的字。30多年来，在外奔波已经成为李保国的常态。一次，出差回来的他一把抱起孙子亲了亲，不料刚学会说话的孙子问他：“你是我爷爷吗？”在别人眼里，李保国好像从来不知道累，甚至对自己和家人有些不近人情。只有他的妻子和山里的果农知道，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了工作上。因为常年高强度工作，1998年李保国患上了重度糖尿病。2007年，他被诊断为重度疲劳性冠心病，血管弥漫性堵塞，已无法进行常规支架或搭桥手术，只能多休息、保守治疗。同事和学生经常劝他多歇歇，去医院看看，李保国却总推托说“没时间”。

学生手中一张密密麻麻的日程表，这样记录着李保国最后的日子——4月1日，邢台—南和；4月2日，邢台—前南峪；4月3日，邢台—南和；4月4日，邢台—保定……4月8日，顺平—保定；4月9日，石家庄—保定……“下周一、二在校给本科生上课，周三去青龙，周四去滦县……”4月9日傍晚，李保国像平常一样，在回保定的路上跟妻子说着下周的安排。回到保定时，天已经黑了。吃完晚饭，李保国又开始一个个往外打电话问情况、谈项目。等到休息时，已经是深夜了。4月10日凌晨，李保国心脏病突发，再也没能醒过来。在别人眼里，他每天都有办不完的事，帮不完的人，他的确太“累”了——在去世前的这4个多月时间里，李保国在家的时间总共不到10天。就连春节，也只是休息了一天，他在生命最后的一段岁月里，他的足迹依旧遍布太行大地……

斯人已逝，悠思长存。一个多月来，太行山区百姓用各种方式自发纪念缅怀李保国，成百上千的老百姓千里迢迢、扶老携幼，为他送行。岗底、前南峪等村的村民纷纷请求，将他们李教授的骨灰安放在自己的果园里，陪伴、激励他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了却百姓脱贫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在太行山百姓心里，他们的李教授没有走！那一个个高科技含量的水果品牌，那一片片高产优质的果园，那一座座满目苍翠的山岗，满浸着李保国的青春、智慧和汗水，谁说不是一座座无言的不朽丰碑！

# IMG_256**杜富国：一个英雄的“三十而立”**

这个场景令人肃然起敬——2018年10月11日，在边境扫雷行动中，面对复杂雷场的一枚加重手榴弹，他向身旁战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6个字铁骨铮铮，以血肉挡住危险，哪怕自己坠入深渊。

这个画面令人泪眼朦胧——2019年7月31日，习近平主席为他佩挂英模奖章、颁发证书，同他合影留念。他举起断臂，向统帅敬了一个特殊军礼。他用这样一种坚强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是一名军人。

这个声音令人倍感温暖——“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南陆之声。晚上8点，陪伴每一个身穿迷彩的你……”温暖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失去双眼双手的他正在讲述排雷的故事……

他,就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排雷英雄杜富国。1991年出生的杜富国，今年正好30岁。今天让我们走近英雄、倾听英雄那不同寻常的“三十而立”。

回首杜富国的从军路，列兵时就被破格推荐参加预提指挥士官集训，上等兵期间就担任副班长……他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每一步都留下印记、走得精彩。

杜富国出生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一个小村庄，他家紧挨着一条县道。这条路，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保卫遵义会议召开时走过；这条路，杜富国从蹒跚学步到投身军旅，走了19年。杜富国就读的小学旁有一座红军烈士坟茔，他曾问过老师为何墓碑没有名字。老师告诉他，长征中牺牲了很多战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没有留下姓名。后来，杜富国常想起这段对话，那些被历史铭记的无名英雄，在这个孩子心中留下了关于家国情怀、牺牲奉献的最初认知。2010年12月，杜富国在遵义市湄潭县的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旁，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成为一个兵。前往军营那天，杜富国仰望红军塑像，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从此开始自己的军旅征程。崇拜谁，就会学习谁。心里装着谁，就会越来越像谁。自幼根植内心的红色种子，在军营这片沃土萌发，成为杜富国的力量之源，让他始终不放弃、始终不迟疑，永远不懈怠、永远不退缩。正因此，当得知云南一个村寨87个人被地雷炸得只剩78条腿时，杜富国毅然递交请战书成为一名排雷兵；当直面生死时，杜富国挺身而出，把勇敢、坚强、舍己为人这些充满血性和大爱的词语，写在人们心中。那句“你退后，让我来”，也和他的名字一道印在了边境扫雷战场，印在了飘扬的红旗上，印在了“感动中国”的丰碑里。

国际地雷界把以老山为代表的云南边境雷场定义为“世界扫雷难度最大的雷场”。地雷专家们的描述，让人不寒而栗：这里地雷种类多、数量大，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雷区自然沉降、滑坡塌方等因素，导致雷场变化大、探测定位难，作业人员稍有不慎就可能触雷……在这样的雷场排雷，每天走的是阴阳道，过的是鬼门关，拔的是虎口牙。成为排雷兵的3年里，杜富国出入雷场1000余次、排出了2400多枚地雷、处置各类险情20余起，身心经受的考验可想而知。

那天，随着一声巨响，被杜富国护在身后的战友艾岩感觉面部和耳部一阵剧痛。等他转过头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杜富国躺在地上，满脸是血，胸前的扫雷服被炸成棉絮状，头盔护镜被炸裂，两个手掌当场被炸飞……受伤之初，杜富国的手臂常有“幻觉痛”，感到手还在，“手指头”会痛。这种疼痛有多痛？陪护战友问医生，医生答复说：“就像刀子割肉一样痛。”面对探视，杜富国习惯性地试图起身敬礼，但没能成功，只能动了动右胳膊。这名老兵，再也不能敬军礼了。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手那么巧，如今却没了手；那么爱笑的他，却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是的，昔日杜富国那双有力、灵巧的手，精通爆破、搜排、销毁等各项技能，还探索出开辟通路“田字切割法”、人工搜排“十六字要诀”，设计制作10余种安全转运沙箱，有效提高了排雷效率和安全系数。威力巨大的爆炸不仅夺走了杜富国的双手和双眼，还在他的脸部、四肢、胸腹等处留下触目惊心的疤痕。起初，历经5次大手术之后，每隔10天左右，杜富国还要一次性注射20针以上的瘢痕消退针，针针注入神经血管密布的瘢痕深处，每一针都伴着剧痛。时至今日，这些疤痕依旧，记录和见证着那次爆炸的恐怖和英雄经历的伤痛。

起初，好多人都担心，失去双手双眼的杜富国会一蹶不振。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负伤后刚苏醒的那些天，杜富国总是对医护人员说：“我得加强锻炼，让自己好得快一点，这样就能早点回去扫雷了。”手术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让人扶他下床走路；一个半月，他就在病床上支起双肘做平板支撑。当得知眼球也将被摘除，不能再上雷场时，杜富国依然牵挂着扫雷。他说：“如果可以，我想学学播音，把扫雷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扫雷工作。”起初，每个人都觉得，惨遭不幸的杜富国值得同情，需要安慰和激励。然而，同样令人没想到的是——

远在西藏当兵的弟弟来了，杜富国安慰弟弟“我没事”，鼓励弟弟“在部队好好干”。

曾在雷场并肩战斗的战友来了，杜富国嘱咐战友“注意安全，等待你们凯旋。”时隔两年，一个前来采访的记者，得知杜富国自己穿衣、洗漱、叠被子、开门、跑步、用盲杖走路、用机械手吃饭，学习播音甚至还坚持练字……这名记者动情地说，“他眼睛失去光明，心里却升起太阳。每一个走近他，想要安慰他的人，反而从他身上获得感动和力量。”3年来，杜富国多次去学校、进军营，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话初心、谈感悟，激励了许多人。2020年，杜富国的妹妹杜富佳是一名护士，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时她两次请战，从贵州随队出征武汉。曾现场聆听杜富国事迹报告的贵州电子信息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丁恒报名参军，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每日在杜富国战斗过的地方巡逻执勤。在昔日杜富国负伤的那片土地上，一望无际绿油油的山茶树正茁壮成长。一如今天的英雄，心有阳光、不负时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放眼华夏大地，杜富国等英雄正是亿万中华儿女心中“最闪亮的坐标”。

### IMG_256**邹碧华：司法改革燃灯者**

2014年12月1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在赴徐汇区法院参加司法改革座谈会途中突感不适，因抢救无效，生命定格在了47岁。这一天晚上，微信朋友圈上，来自法官、律师、司法，甚至政法圈外的人都在传播邹碧华离世的消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默默缅怀着这个不平凡的生命。

邹碧华担任法官22年，先后参与审理过社保基金追索案、房屋维修基金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他依法公正审理每一起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守护好司法最后一道防线。他尊重保障律师权益，组织制定了《法官尊重律师十条意见》，推动律师诉讼服务平台建设，受到律师界的广泛好评。担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后，他在全国法院首创案件权重系数理论，亲自设计多项审判管理评估指标，为进一步健全科学评估体系突破瓶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上海法院是中央确定的首批试点单位之一。上海市高院党组确定他为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兼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他勇挑重担、不畏困难，开创新的工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司法改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鞠躬尽瘁，倒在了司法改革的征途中。就在去世前一天，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上线运行，这一服务平台包括查询、提交、申请、建议、交互五大功能，涵盖律师参与诉讼的各个专项流程。律师可在线申请立案，缴纳诉讼费，完成立案所有流程。

邹碧华毕业于北大法律系获博士学位，作为高院副院长，他分管司法改革、网络信息化等；他还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兼职教授；经常有学校邀请他去讲课。因为他学者型法官的才华和公正不阿的性格，有人写文章评价说，“当法官当如邹碧华”。邹碧华的追悼会上，上海市高院院长崔亚东说，“法官当如邹碧华”是各界人士对他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品质的最佳注解。邹碧华离世后，近万人在网络上献花、点烛，超过十万人参与留言讨论。“燃灯者邹碧华”“学术与口碑皆好”“他以一个法官的身份赢得了整个法律圈的尊敬”等，已被大家称为“邹碧华现象”，如此哀荣，实属罕见。

在邹碧华的同事看来，他始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曾在长宁法院信访办工作的滕道荣还记得，2008年邹碧华刚到长宁法院，就提出了一系列管理涉法信访这一“老大难”问题的创新之举。在邹碧华的主持下，长宁区法院自主开发了信访统计软件，每天录入相关信息，分类管理，邹碧华每天登录查看。滕道荣说：“他自己要做到工作心里有数，而不是听汇报。”在上海长宁法院担任院长期间，邹碧华坚持每天亲自阅批群众来信，曾在短短四个月内阅批各类群众来信106封；他坚持每周四接待来访群众；坚持利用周末或下班时间上门看望老上访户，进行有针对性的化解工作。只要有时间，他就亲自阅看卷宗、亲自研判案情、亲自主持制定化解方案、亲自推进落实化解措施。在一起上访案件中，邹碧华先后两次接访上访人员刘某，从法律上对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进行阐明，从政策上对其行为进行教育疏导，从人道上对其在四川家乡因遭遇地震致生活困难表示关怀，最终使刘某心服口服、息诉罢访。2008年8月9日，邹碧华冒着盛夏高温到上访人员章某家中下访，从案件到人生，边倾听边开导边教育，一聊就是五个小时，直到下午两点多钟仍饿着肚子。正是这次上门下访，打开了章某的心结，赢得了她对法院的信任。即使工作再忙碌，邹碧华也要留出时间来学习。在他当审判长时，开庭之前会先阅卷宗，对争议焦点要有所预判，避免重复开庭。每天中午12时30分到1时30分，晚上6时30分到7时30分负责接待。这样就有整个晚上的时间来读书。“就像邹院长说的，学习的时间一定能挤出来。”市高院信息处处长曹红星还记得，有一次去北京开会，因大雨航班无法起飞，折腾了一天，所有人都在焦虑、抱怨，邹碧华却说：“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书。”

邹碧华在长宁法院时，经常走访当事人。有一个当事人，孩子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去世。大年三十的下午，邹碧华就会叫上同事一起登门看望。“孩子走了，我们都是你们的亲人，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打了几年交道，当事人把他当作知心朋友。临去高院工作，他还不忘关照同事：“这户人家孩子没了，要经常去关心。”一年夏天，正是8月酷热，邹碧华去走访一位上访的当事人。40多度的高温，上午9点半进去，下午两点出来，在当事人家中水也不肯喝一口，几个小时的劝导，终于让当事人释怀，案件成功化解。

邹碧华常说，法官要找到一把既解“法结”又解“心结”的钥匙。既要有对公正司法的执着追求，也要有尊重生命与人格、情法交融的人文情怀。上海高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余冬爱记得，2002年，自己第一次主审的案件就是邹碧华担任审判长。“我就相信你能行，不过对律师的人文关怀意识还需再强些！”庭后，邹碧华说。今年8月见面时，邹碧华还对他说：“要关心每一个同事，让每个人都有进步，感受到温暖！”

出生在江西奉新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和外婆一起在乡下生活的经历，让邹碧华格外关切他人悲喜。因为外婆是个哑人，邹碧华比其他孩子开口要晚，也因此学会了读懂别人无言的表达。一段手语、一个表情或者一个细微动作，他立即明了。多年法庭实务中，邹碧华深知“法庭上的心理学”的重要性。“在司法为民的大背景之下，将心理学方法科学地应用于整个司法过程中，法官对案件的处理将不再仅限于生搬硬套法律规则，漠视人性与世情，而是有针对性地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和法律释明。”邹碧华说。

2014年12月14日，上千人从各地自发来到上海为邹碧华送行，一位老人带着10岁的孙子小铭前来泪别。5年前，身患白血病的小铭被亲生父母狠心抛弃。爷爷奶奶无钱给孙子看病，来到长宁法院立案大厅，要以小铭的名义起诉他的亲生父母，索要抚养费为小铭治病。当时，还没有未成年孩子告亲生父母的案例，因此法院迟迟没有立案。时任长宁区法院院长的邹碧华得知后，带着长宁法院少年庭法官们开了两天的会，研究法条，决定立案。最终，小铭父亲将名下房产划归小铭作为治病的医药费，小铭才坚强地活了下来。“当年没有邹伯伯，我也活不到现在。”送走了尊敬的邹伯伯，小铭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 IMG_256**卓嘎、央宗：神圣国土的守护者**

翻过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透过云雾缭绕的日拉雪山,远远望去,是全国人口最少的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的一个小村庄,也是卓嘎和央宗姐妹居住了几十年的家。半个世纪以来,在父亲桑杰曲巴的带领下,父女三人以放牧为生,守护着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姐妹两人就像扎根雪域的格桑花一样盛开在祖国边陲。10月份的一天,卓嘎、央宗姐妹俩背着装有糌粑、国旗等物品的布包,相约一起去巡边。身材娇小的是姐姐卓嘎,性格腼腆,十分爱笑。妹妹央宗身材高挑,性格泼辣,做事爽利。放牧巡边、守护国土是姐妹俩坚持多年的习惯,沿着阿爸的足迹,无论走到哪里,姐妹俩就将国旗插在哪里。他们一家人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1962年至1996年间的34年里,卓嘎、央宗姐妹在父亲的带领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成“三人乡”,放牧巡山,坚守在祖国边陲广袤的森林和牧场间。被重峦叠嶂的喜马拉雅山脉包围,玉麦乡其实离隆子县城的直线距离不过40公里。可是,以前想要进出玉麦却并不容易。两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横亘在玉麦人出山的路上,运气好的话一趟要走十几个小时,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就别想进出了。在玉麦乡,每年有260多天是雨雪天气,每年的11月初至次年5月底大雪封山。由于山高谷深,玉麦能耕种的土地有限,各种物资供给全靠从山外运进来。在这样的地方坚守,既要忍受着物资的匮乏,也要克服一年有大半年与外界隔绝的孤苦。

小时候的卓嘎、央宗特别渴望大山外的世界,不太理解父亲的行为。特别是政府已经帮助他们一家搬到了条件稍好的曲松村,可是却被担任玉麦乡乡长的父亲带着家人赶着牛羊又回到了玉麦。“阿爸说他这个乡长连自己的家都守不好怎么守好祖国的土地。”卓嘎说父亲桑杰曲巴教导他们放牧也是为祖国守边疆。“这是国家的土地,我们要守好!”父亲的话印在了卓嘎和央宗幼小的心里。姐妹俩记得,阿爸每次去山外开会,都会给她们带回一些山外好吃、好玩的东西;还会给他们传达上级的指示。有一次,桑杰曲巴外出开会,买回了红布和黄布。姐妹俩高兴地以为阿爸要给她们缝制新衣裳了,可是看到阿爸在两块布上比来比去,量了又量,随后用剪刀把红布裁成方方正正的一块儿,又在黄布上一颗颗剪出五角星。央宗记得,平日里慈祥的阿爸那天一脸严肃,不说话,全部的心思都在手里的一针一线上。终于缝好了。桑杰曲巴把孩子们叫到身旁,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是中国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国旗!”那一天,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了卓嘎和央宗家的屋顶,成为玉麦河谷里最靓丽的一抹红。那一天,卓嘎姐妹懂得了“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央宗15岁那年冬天大雪纷飞,阿爸送生病的阿妈外出就诊,在翻越日拉雪山的途中阿妈再也没有醒过来。也是在日拉雪山,卓嘎和央宗的16岁小妹妹被暴风雪吞噬。但是,桑杰曲巴带着两姐妹仍坚守在玉麦,“不能走,国土一分也不能少!”此后,父女三人组成“三人乡”,阿爸负责巡山放牧,卓嘎姐妹守着家园。

被喜马拉雅包裹、与世隔绝的“三人乡”是怎样过日子的呢?一年四季,房子中间用3块石头垒起来的火塘里火苗不灭,这样才能增加一点温度。冬天酷寒,除了紧挨着火塘,姐妹俩只能靠不停劳作才能使手脚增加温度;每一颗粮食都在大雪未封山时用牦牛驮进来;因为没有袜子穿,放一天牧回来的卓嘎和央宗要在靴子里换好几遍干草,保暖除湿。那个年代,玉麦南部原始丛林里有孟加拉虎、豺狼、雪豹和熊等野兽,阿爸每次去放牧,卓嘎、央宗都提心吊胆。可就算这么苦,在阿爸坚定信念的指引下,在艰难生活的磨砺中,姐妹俩把根扎在了这个364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扎在了喜马拉雅的南部,捍卫着神圣国土的尊严。1988年,当了29年乡长的阿爸退休,卓嘎接替阿爸的班,一干又是23年。妹妹央宗是副乡长兼妇女主任,一干也是17年。

随着国家日渐强大,玉麦的喜事也渐渐多了起来。1996年,玉麦乡有了第一位党支部书记,山外还迁来两户人家,玉麦再也不是“三人乡”了。

央宗27岁、卓嘎35岁时都分别成了家。玉麦乡第三代人出生了,他就是央宗的儿子索郎顿珠。索郎顿珠稍大一点的时候,也开始随大人们去放牧。在一次次的翻山越岭、风雪洗礼中,索郎顿珠渐渐懂得了亲人们守边的坚定信念,他也立志要成为波啦(爷爷)和妈妈、姨妈那样坚守的人。

2001年,桑杰曲巴最大的心愿实现了,玉麦通往山外的公路修好了。他激动地给第一辆开进来的“铁牦牛”敬献哈达。也就是在这一年,老人没有遗憾地走了。“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你们不要因为玉麦苦,更不要因为我走了就离开这里,这是祖辈生活的地方,更是祖国的土地,一草一木都要看好守好。”这是老人临终时留给全乡人的遗言。令央宗欣慰的是,索郎顿珠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了玉麦乡,他也要像祖辈一样守护这片神圣的国土。

自公路打通以后,玉麦的日子也一天一个样。原来的“三人乡”在去年底有了9户32人。各种好政策也像雨露春风一样滋润着每一个玉麦人。现在,每户平均一年能拿到4万元左右边民补贴、生态补偿等各种补贴收入。玉麦通了大电网,家家户户都有了车辆,安装了WiFi,像山外一样,玉麦还流行起了新的支付方式。有4户人家还开了藏餐馆和家庭旅馆。

2017年10月29日,是卓嘎、央宗姐妹最幸福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给她们回信了,信中鼓励她们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家在玉麦,国是中国。”在卓嘎、央宗姐妹眼里,中国是阿爸手中缝过的五星红旗,是姐妹俩脚下离不开的土地。她们一家的故事感动了更多人加入到守土固边队伍中。如今,走进玉麦乡,为原有9户和即将迁入的47户人家建设的“农家别墅”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届时,全乡户数将达到56户。得益于西藏自治区边境小康村建设,通往玉麦乡的路将进一步改造升级硬化,卫生室、学校也即将建成完工,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玉麦还被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列入10条中国“西部行”自驾游精品旅游线路。“玉麦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更要守好这里的一草一木,守好我们的喜马拉雅。”卓嘎和央宗姐妹说。

# IMG_256**钟扬：一颗追梦的“种子”**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是复旦教授钟扬，有很多头衔和成就，他是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西藏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一次，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三次……但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2017年9月25日清晨，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钟扬53岁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

钟扬15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后从无线电专业转行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短短几年就站上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33岁时已是一名副局级干部，前途一片大好，却毅然放弃所有职级待遇，来到复旦大学做一名普通教授；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30余年，学术援藏16年，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帮助和推动了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从“三个没有”：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申请过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到创造一个又一个“第一”，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高寒缺氧，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50%，昼夜温差高达45摄氏度，鲜有植物学家敢于涉足。但自从2001年第一次到西藏考察开始，钟扬与西藏结下了16年的不解之缘。有的人不理解：一个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为什么要跑到边疆搞科研？原来，钟扬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的工作中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2001年，钟扬第一次来西藏考察，就被这里的自然生态和高原植物深深吸引。在青藏高原，有近6000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的18%，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点和种子采集。其中2000种是青藏高原特有植物，但由于气候变暖，环境破坏，一些植物正在消失，抢救性收集记录迫在眉睫。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如何把青藏高原这个最大的生物“基因库”真正建立起来，是钟扬执着努力很多年的科研目标。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钟扬立誓，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他立誓，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的当下，为人类建一艘种子的“诺亚方舟”。这个想法，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成为现实。自此，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肩包，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经常七八天吃不到热饭。钟扬和学生们饿了啃一口死面饼子，渴了就从河里舀水喝，“食物不好消化才扛饿，饥饿是最好的味精”。晚上，住的是牦牛皮搭的帐篷，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很难点亮；冬天，盖三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早上洗脸要先用锤子砸开水桶里的冰；路上，常常被突袭的大雨冰雹困在山窝窝里，车子曾被峭壁上滚落的巨石砸中……

“高原反应差不多有17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每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头晕、恶心、无力、腹泻都是家常便饭。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们就怕了是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钟扬这样说，开玩笑般的“轻松”。他们追踪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花了整整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据库”；他们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点地梅、西藏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他们的“杂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意味着，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干旱缺水地区也有机会让农业“平稳着陆”；他还带领团队耕耘10年，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创造了世界引种最高纬度，为上海海岸生态保护打造了新的屏障……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五分之一。他的理想，是在未来10年间，收集西藏植物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钟扬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很多钟扬的同事原本是他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就是其中之一。相识三十多年，对于南蓬而言，钟扬一直是亦师亦友的存在。初始援藏，钟扬打算作为科研者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再后来，他想把西藏大学的“造血机制”建起来，打造最好的平台，把学科带到新高度。16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2017年，西藏自己的种质资源库也建立起来了，负责人正是钟扬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扎西次仁。“在我的课题组里，学生才是上帝。”这不是钟扬的一句玩笑话，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身的研究。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一颗珍贵的种子。就像收集种子一样，他用心培养，因材施教，期待他们长成参天大树。钟扬特别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十几年间，他培养的学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他说：“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2015年5月2日，51岁生日当晚，他突发脑溢血，大脑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化作CT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15天后，钟扬出院了，连午餐盒都没力气打开的他，在学生搀扶下，拖着“半身不遂”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级台阶，“瘫坐”在二楼办公室里。从这天起，他正式恢复工作。从医院出来，医生给他规定了3条“铁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药，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担心钟扬的人们“舒了口气”：这个“钟大胆”，可以在进藏上消停消停了吧。可这个对青藏高原爱得深沉的汉子，无论医生如何警告，无论家人如何担忧，终究没“戒”得了西藏，“我戒得了酒，戒不了进藏。我不去心里就痒痒，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气”。这时的钟扬更有紧迫感了，他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时间，给西藏大学带出一支科研队伍。出院后，钟扬仿佛按了加速键，更加争分夺秒。不少人这样评价钟扬，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离开ICU刚半年，他又进藏了。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内蒙古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当人们把车祸赔偿金拿给钟扬家人，老父亲坚决不肯收。他流着眼泪，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这些钱是我儿子用生命换来的，我不能收。”最终，一家人决定，把钟扬138万元的车祸赔偿金和利息全部捐出来，发起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2018年9月，来自复旦大学、西藏大学等高校的15位师生获得钟扬教授基金首批奖励，以表彰他们在科研、公益、教育事业，特别是在西藏和其他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做出的贡献。他们中有援藏医生，有赴藏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有专门研究西藏植物领域的学者，他们沿着钟扬教授开拓的漫漫长路不断求索，继续前行，钟扬的种子精神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

2018年4月，中宣部授予钟扬“时代楷模”称号。正是对西藏的眷恋，对高原植物学的热爱，成就了钟扬充满激情、富于创造、敢于担当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钟扬教授走了，但他的浩然之气已经化作了美丽的藏菠萝花留在西藏，就像他最爱的那首自己翻译的藏族民歌：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菠萝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 IMG_256**钟南山：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

1936年，钟南山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童年时期，钟南山常在医院里，耳闻目睹父亲和别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晚上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看病，孩子康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感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热爱医学的一个原因。”父亲自费买来小白鼠在书房做实验，家里的三楼都是老鼠，钟南山的医学启蒙由此开始。他每天都去喂小白鼠。有人来找他父亲，向邻居打听住址，邻居说，“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道大，就是他们家。”

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比起医学，他的体育成绩更为突出。大三那年，钟南山作为运动生代表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获得400米跑第一名。第14届全运会举办期间，关于“钟南山在1958年8月首届全运会的测试赛中打破当时400米栏全国纪录”的消息被网友们兴奋地转发，迅速登上热搜。当年比赛后，他拒绝了北京体委的邀请，留校从事放射医学教学。行医之路一直求而不得。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所能选择的。”钟南山回忆。

1971年，钟南山在妻子李少芬帮助下，离开北京来到广州第四人民医院（今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医生。“挑到的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这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钟南山说。到医院不久，他遇到行医生涯的第一个挫败：将一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次日发现是消化道呕血，病人险些丢了性命。医院以“急诊室工作太累”为由，要把钟南山安排到病房，与另一位同事对调，被病房拒绝了。他受到刺激，开始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跟着大夫余真学习怎么处理病人、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要做什么检查。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功课。余真回忆：不过两三个月，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竟然显得飘逸宽松。半年内，钟南山瘦了4公斤，写了4本医疗手记，每一个病例都有详细记录，熟练掌握了消化道出血、溃疡穿孔、高血压病、脑血管病、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等急诊室常见的主要病症。8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此后，钟南山一边实践、一边科研，于1979-1981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及伦敦大学呼吸系进修。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呼吸科的代表人物。

作为一名医生，钟南山认为病人是最应该重视的。一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每周四下午都是钟南山的例行问诊时间，如无特殊情况，他会在两点半准时出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三楼1号诊室，问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他们通过专家热线预约，提交病例后由钟南山的助手们筛选，紧急的病症有可能被优先安排。每周只有十几个人能坐在钟南山面前，他们拥有和钟南山一对一的至少半小时。现在病人平均要等三到六个月。此前，约他看病的人一度排到了两年后。他同样重视的事情是周三上午的查房，他的学生、护士、护士长、主治医生、主任医师紧随其后。查房所看病人有限，有病人会边哭边拉住他。有时候，他不苟言笑，面容严峻，看上去很威严，嘴角微微向上的弧度都没有。小小的诊室塞了四五个学生，还有两个跑进跑出，见到他马上弯下腰，双手递上他需要的东西。但当病人走入诊室，他能在一秒内切换上干净又暖心的笑容，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柔柔地说，你哪儿不舒服啊？我是临床医学家，”钟南山说。门诊发现的疑难病症，他会当作学术研究的挑战，回到实验室攻关。在他心中，疑难病症是课题。“实践医学就是一边实践、一边科研，不能只是搞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病人的问题。”

“非典”疫情暴发后，郑伯健教授曾与钟南山一起研究SARS病毒。他回忆，重症患者都要把气管切开，很危险。但钟南山那里重病号的死亡率都得到了控制。他的措施被证明有效，双管齐下，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7%。至2003年4月中旬，呼研所收治的101名重症病人，已有87人康复出院，抢救成功率为87%。而在整个广东，至5月31日止，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511例，治愈出院1441例，死亡57例，死亡率3.7%，创全世界最低“非典”死亡率纪录。钟南山对每一个携带“非典”病毒的病人进行了检查，让病人忍住不咳嗽，观察了他们的口腔，发现这些病人的咽喉部没有症状，而临床发现，大量使用应对衣原体的抗生素对“非典”病人均没有效果。这与当时北京专家公布的病原体为衣原体不符。广东省决策层采纳了他的意见，坚持并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

2003年遭遇“非典”疫情，是从医31年、已经67岁的钟南山人生众多转折里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在疫情最先暴发的广东，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呼吸科的代表人物，原本只在行业内享有盛名的钟南山被推到了台前。在这次严重的危机中，钟南山主张及时公开披露，提供了准确的信息，拿出有依据的治疗措施，迅速成了抗击“非典”的“领头人”。他的每一句发言都能占据媒体醒目的版面，他的一举一动成了“非典”疫情的风向标。他被贴上“敢说真话”的标签，同时也成了“非典”时期医疗工作者的最佳代表。有关他的传记《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排在“非典”时期畅销书前列。媒体多用“斗士”或“战士”来描述，《人民日报》形容他拥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拯救生命于死神的博爱精神”。“非典”之后，钟南山头衔与声名齐飞，他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选。有他的场合，一路都是“长枪短炮”。50米的路段，因为不停被拦截下来接受采访，他要走半小时。他对公共事件的发声延续了“非典”时期的风格，发言时常成为隔天热门的标题。

新冠疫情发生后，钟南山再一次投身疫情一线，面对白岩松的提问，第一个指出新冠肺炎“肯定的人传人”。从2020年1月至今，他与他的团队一直在攻克新冠肺炎相关的难题，为中国和全世界抗击新冠疫情提供了重要力量。他的生活比从前更忙碌了，甚至不得不停下了看诊与查房。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重大呼吸道传染病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预防与治疗，希望推进社区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早期筛查工作。相关工作因疫情推迟了一年。2021年终于恢复开展。

“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社会、国力在增强的情况下，在这个时代，各个部门的领导应该更加重视健康的含义，而且更应增加对健康的投资。”钟南山认为，这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理念体现，“这次疫情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真正体现了中国‘以健康为中心’代替‘以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方针。现在，像高血压病、糖尿病这些，都能够在很早期进行干预，所以它不会发展到最后阶段。但是这在呼吸疾病方面是比较落后的，比如最常见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一期、二期没什么症状，患者等到赶公共汽车、上楼觉得气接不上来了，这个时候再去找医生，已经很晚了，只能缓解症状。”钟南山说，他希望能推进早期干预，“在我们呼吸疾病领域，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方面，都要遵照‘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走在国际前列，这是我的愿望。”钟南山今年85岁，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未停下。他已经很多年没休息过。“我有周六和周日，但我要干活。”他说。不论身兼多少职务，获得多少荣誉，钟南山总会不断重复一句话：“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

# IMG_256**黄大年：点亮爱国奋斗精神航标**

勤奋求学，他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勤奋耕耘、流光无悔；归国创业，他把每一分光阴和所有智慧都奉献给了国家；他用最极致的努力和拼搏，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使中国正式进入了“深地时代”……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2017年1月8日，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盛年，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带着对事业的无限留恋，带着对学生的无限惦念，永远地离开了。

斯人虽逝，但他“振兴中华，爱国奋斗”的精神丰碑却永留人间。仰望星空，爱国者的精神之光霍霍生辉，照亮我们前行之路；奋斗者的精神力量，正与新时代的使命召唤相辉映，鼓舞着更多人为梦想而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向前。

追寻黄大年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他人生每个关键节点的抉择都布满了“爱国”“奋斗”的印记。没有历经风雨、没有信仰依托的梦想很可能会夭折，黄大年的梦想却始终深植在祖国的大地，生根发芽，稳扎稳打。这是梦想的铸造，更是信仰的铸就。

1958年，黄大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后随父母下放到偏僻的山村。他从小就对科学知识有着深切的渴望。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黄大年以超出录取分80分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凭着刻苦拼博的精神，以优异成绩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年轻时期的黄大年，早早就有了爱国报国的远大志向。在一张写有毕业赠言的照片上，黄大年留下了“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豪迈宣言。1988年，黄大年被批准入党。他在入党志愿书最后一段动情地写道：“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黄大年那时就想做一朵振兴中华的奔腾浪花，心向大海。即使此后被选送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启了18年“海漂”生活，为祖国科技进步而努力的信念也一直深藏心中。2009年，当得知国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时，黄大年毫不犹豫放弃在英国取得的一切，回归祖国。

追溯黄大年的成长经历，会发现对祖国的爱始终是他至真至诚的情结。无论身在何处，《我爱你，中国》都是黄大年最喜爱的歌。他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最高追求，深信“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黄大年的梦想是把我国的地球物理研究推向世界的顶峰，把地球变成“透明”的。为了这个梦想，他的生活除了加班就是出差，深夜的办公室里，常常只剩他一个人；为了这个梦想，他晕倒前，还不忘嘱咐身边的人，一旦自己不行了，一定要把电脑交给国家；为了这个梦想，他在重病入院的时候还在给学生讲解问题，还在和同事研究工作……为了这个梦想，黄大年忘我拼搏，惜时不惜命，他说：“我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于是他多了“拼命黄郎”的绰号。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拼，黄大年却说：“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正是因为这股拼劲，回国半年多，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绘就了一幅宏大的吉林大学交叉学部蓝图。2016年9月，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担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首任部长。还是因为这股拼劲，回国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以他所负责的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结题为标志，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长期的过度劳累使健康严重透支，黄大年终因胆管癌医治无效去世。归来离去之间，黄大年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不忘初心的爱国情怀，诠释着为祖国、为梦想全力拼搏的精神内涵。

黄大年从未离去，他精神的火炬，还在照亮无数人前行的道路。按照黄大年生前设计的战略规划，黄大年团队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地壳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创造了7018米井深的新纪录，智能化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搭载平台已建成，航空重力梯度仪工程样机研制重点研发项目已启动……这支平均年龄35岁的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正以饱满的拼搏精神不断前行。两年多以来，吉林大学按照黄大年生前“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平台、一流团队”的设想继续前进，成立“吉林大学黄大年创新试验班”，吸引许多优秀学生学习和践行黄大年精神；组建“吉林大学黄大年创新团队”，在重力探测方向取得重大突破；建立“吉林大学黄大年实验室”，凝聚智慧力量；持续推进黄大年生前倾注心血的吉林大学移动平台中心发展……回顾黄大年报效祖国、追逐梦想、热衷科研、勤勉教学的辉煌一生，再多的语言与再精致的描写也难以写尽一个科学家的伟岸。他的精神感染、鼓舞和激励着各地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和一代又一代学子。“黄大年”，不仅是一个名字，它还是标志、是精神、是时代的榜样，更是奋起的力量!



# **黄文秀：以秀美人生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当会上宣读到“黄文秀”的名字时，镜头转向了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替女儿戴着大红花的他红了眼眶、悄悄抹泪。这位正值芳华的壮族姑娘黄文秀，长眠在了广西百色市的百福园公墓。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她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1989年4月，黄文秀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据她父亲黄忠杰回忆，他们家之前住在贫瘠的大山深处，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搬出大山，获得了新耕地。因此，父亲经常教育她要记得这份恩情，并在自己有能力时涌泉相报。回馈社会的种子自此在黄文秀心中扎根。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如此写道：“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誓言并不是一纸空话。在参与“启功教师奖”评选期间，她踏踏实实去贫困山村走访，发现那里缺乏人才，教育落后，于是更坚定了回到乡村工作的想法。2016年，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考上了选调生。起初，黄文秀被分配到百色市市委宣传部，这本是旁人眼中的安稳工作，可她接下来的选择又让人惊讶——2018年3月，她主动请缨，到边远的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当许多农村大学生选择从大山中走出来，到大城市生活时，黄文秀却成了一个“逆行者”，选择为振兴乡村而奋斗。她说：“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来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初到百坭村，黄文秀并不适应。一方面，她缺乏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实际经验，摸不清门路；另一方面，当地人对这个年轻的“女娃娃”也不信任，觉得她这个硕士生不可能真心来帮忙，因此总是冷言冷语。但黄文秀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而是虚心向老书记取经，学习经验，一心为民。之后，黄文秀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深入了解了全村195户贫困户的情况，使扶贫之路有了好的开局。

黄文秀担任过第一书记的百坭村，在了解了村民致贫的原因后，黄文秀有针对性地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当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时长较多，气温较高，光热充沛，水系发达，正好适宜发展杉木、砂糖橘、八角、枇杷等特色产业。为此，黄文秀特地引进了先进的砂糖橘种植技术，帮助群众利用科学方式种植，大大提高了砂糖橘的质量和产量。虽然在技术的帮助下这些特色作物长势喜人，但百坭村位置偏僻，产品打不开销路，黄文秀就想到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她为此筹集资金，在村里建了电商服务站，一下子增加了农产品的销量，极大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了发展多种经营，黄文秀还到外村考察养蜂产业，计划在百坭村推广养蜂技术，让知识发挥作用，为村民增加收入。从课本到田野，从理论到实践，思想政治专业科班出身的黄文秀，把知识用在了加强村“两委”干部队伍建设和提升管理水平上。她建立百坭村新时代讲习所并作为主要讲习人员，向群众讲解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等。每天都在忙的黄文秀，只有在日记中才透露一点自己的脆弱：“我是我们村扶贫攻坚的第一负责人，我还不够勇敢”“我们村产业园的牌子一直在努力中，5个致富带头人也在培养中，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黄文秀曾在驻村日记里写自己去乡村一线扶贫的原因：“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在于嘲笑民众的落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明白这个道理，从而提出要教育扶持一批人脱贫，并且扶贫要扶志和扶智相结合。这样一个切实为群众谋发展、谋福利的党，怎么能不响应它的号召呢？”带着这份责任感和青春热血，黄文秀在扶贫路上不断奔波。  
 2019年6月16日夜间，黄文秀告别病重的父亲，准备回到百坭村，临行前，因为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家人劝她等第二天早上再走。然而，黄文秀却有一定要回去的理由：前些天，村里的灌溉水渠被冲毁了，严重影响了百姓的耕作，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她必须回去参加17号早上的扶贫会议。黄文秀独自上路了，谁知回去的路上，小雨忽然变成暴雨，引发了山洪，6月17日凌晨，黄文秀不幸遇难。  
 黄文秀牺牲以后，身边人回忆起关于她的点点滴滴。一个朋友说：“文秀买过一条裙子，当时朋友劝她，平时在村里也穿不上，她说，等我们村整村脱贫了，我就穿。2019年，百坭村真的脱贫了，但是在整理文秀遗物的时候发现，那条裙子连吊牌都没有摘。她没有来得及穿上她喜欢的那条裙子……她也喜欢穿裙子，她也喜欢拍照，但是，为了心中的扶贫事业，她把一切都割舍了。”  
 黄文秀曾说：“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她不忘初心，不负韶华，她对信念的绝对忠诚，对使命的不懈坚守，让人看到了理想激扬的力量和青春勇敢的担当。

# IMG_256**廖俊波：苦干实干 造福一方**

廖俊波，福建浦城人，中共党员，1968年8月出生，生前曾任福建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政和县委书记。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2017年3月18日，廖俊波在赶往武夷新区主持召开会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廖俊波先后在邵武、浦城、政和、南平市和武夷新区工作过。从走上工作岗位到主政一方发展，他始终牢记入党誓言，夙夜在公、勤政为民；这个生前用“樵夫”做微信昵称的“砍柴人”，为人民送去光和热。

1998年，廖俊波任邵武市拿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百年不遇特大洪灾的灾后重建。他挨家挨户探访情况，很快就把受灾的几百户都走了个遍。农民吴炳贤盖新房时不小心砸伤了腿，眼睁睁看着别人盖房干着急。廖俊波得知后，多次上门看望，并帮他出钱请人代建房。1999年春节，吴炳贤在内的500多户居民在新房里高高兴兴地过上了新年。“拿口镇到朱坊村的水泥路，直接受益的群众差不多有1.3万人，占全镇人口近一半，竣工时几百名群众自发敲锣打鼓给镇政府送匾。”时任拿口镇党委书记熊贻荣至今记忆犹新。在邵武市任副市长期间，他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专业化产业平台，新建了占地26平方公里的省级循环经济园区，规模工业产值三年翻了近一番；他先后化解原国有企业不良债务1.3亿元，盘活工业用地近200亩，为13家担保企业解除了债务链。在南平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城区地质灾害防治、配电站房整治、夏道山后村用地纠纷、马坑路锦达房地产项目历史遗留土地证办理问题等一个个硬骨头被他成功啃下。2007年，廖俊波走马上任荣华山产业组团管委会主任，面对一片待开发的山包，没有规划，他找规划单位来做规划设计；没有土地，他与浦城县委县政府沟通协调征地拆迁；没有基础设施，他带领大家建路、挖沟、排水；为了招商引资，他四年间驱车36万公里，常年奔波在浙江、广东等地。四年间，完成征地7000多亩，招商引资签约项目51个，开工项目23个，总投资28.03亿元。浦城人惊呆了，直呼廖俊波创造了奇迹！

曾几何时，政和县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市民广场，没有文化中心，没有像样的桥梁，甚至没有红绿灯、斑马线。2011年6月至2016年4月，廖俊波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将政和县城的城镇化率从31%提高到46%，迎宾大道建起来了，主街改造好了，政和广场、文化中心投入使用了，9座市政桥梁竣工了，宁武、松建高速公路通车了！25年高考没有人考上北大清华的历史结束了，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工业园区已经开发完毕3600亩了！政和县石屯镇石圳村曾是一个出了名的“垃圾村”，村里的河沟淤积了近三十年的垃圾无人清理。廖俊波当县委书记后，听说石圳村的十个妇女成立了村巾帼理事会义务清理垃圾，专程到村里走访。他鼓励她们不仅要整理卫生，还要恢复村容村貌，申报“美丽乡村”，想办法搞旅游项目。巾帼理事会会长袁云机记得，那时每个月廖俊波都要到村里来三四趟，问她最近有什么想法，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需要他帮助解决的。在他的帮助下，水、电、桥、路灯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石圳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有100多名村民回到本村从事旅游等相关产业，村民人均收入翻了几番，村里的老人们都说日子好得“像是掉进了蜜罐里”。

铁山镇东涧村在2013年的时候人均年收入仅5千元，村里900多口人中有三分之一外出打工。2012年10月，廖俊波来到村里和村民们座谈，帮他们想办法增收。“能不能流转土地，搞花卉种植？”看到村民们渴望的眼神，廖俊波主动找到一家花卉种植基地负责人周胜，邀请他落户东涧村，发展了400多亩的花卉基地，带动了本村村民就业。

外屯乡洋屯莲子合作社负责人许仁寿2010年创办合作社时，怎么也没想到，三年不到的时间，合作社种植莲子的规模居然从100亩扩大到了2700亩。“多亏了廖书记帮我们出主意，办理了小额金融贷款，我们的莲子合作社才能逐年不断扩大规模。”2014年，合作社由于周转资金短缺，找到银行却因承包的土地无法抵押贷不了款。在廖俊波到外屯乡调研时，许仁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提出了贷款的难题。廖俊波立即找县邮储银行等多个部门商讨，由县财政将扶贫贴息的350万元作为风险保证金，帮助他们开通了小额金融贷款项目。

廖俊波工作的岗位，都是“背石头上山” 的重活累活，他却从来都是不怕苦不怕累，冲锋在前。他常说”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廖俊波以务实担当的作风，推动了当地干部队伍精气神为之一新。2011年，廖俊波到政和担任县委书记。经前期调研，到任3个月后，他抓住中央支持福建加快发展和省委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提出要建设政和自己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廖俊波给全县干部加油鼓劲，大家充满了干劲。“要发展就要敢担当、敢担责，勇于改革创新。”他对时任政和县副县长的何宋林说，要以改革创新来提升服务，以高质量的服务来吸引客商，还要将高质量的服务形成制度，给客商吃下定心丸。

为提升项目落地的效率，首先要解决审批环节互为前置、手续繁琐的问题。他为开发区创新推出并审联批制度，将所有与项目落地相关的审批部门联合组成并审联批工作组，自己任组长，亲自过问每一项审批中的难点，大大提升了审批效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秉持这样的信念，廖俊波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真正做到了事事带头、时时带头、处处带头，推动了一个个地方旧貌换新颜。

“每年都要给老百姓一个惊喜。”2011年6月，来到彼时困难重重的“省尾”政和县任县委书记，廖俊波没有皱眉，他扛起一方责任，对当地百姓许下庄严诺言。思路快人一招，动作快人一步。上任伊始，他马不停蹄开展了近两个月的密集调研，召集政和县200名副科级以上单位负责人，主持召开了为期3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务虚会，确立发展工业、城市、旅游、回归“四大经济”的发展思路。“让23万政和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在政和县脱贫攻坚大会上，廖俊波深情地说道。在廖俊波的带领下，2013年—2015年，政和蝉联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甩掉了全省末位的帽子；2012年—2015年3年多时间，政和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万多人。廖俊波到任第一年，政和启动了31个城市建设项目，随后每一年，政和都有至少30个城建项目在建，实现一个个“零”的突破：第一个红绿灯、第一个停车场、第一个市民广场……他用实际行动，兑现每年给政和百姓一个惊喜的承诺。正如廖俊波的微信昵称“樵夫”一样，他兢兢业业，在生命的最后45天，有22个晚上在开会，14个晚上在外出招商或者赶路；3天跑了4个省，拜访了6家公司。

廖俊波因公殉职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

# IMG_256**樊锦诗：一生只为一事来**

“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这24个字浓缩了樊锦诗的不凡人生。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北平。北平沦陷后，樊锦诗一家南迁谋生，定居上海。父亲没有重男轻女思想，把女儿也送进学堂。樊锦诗成绩好，高中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并选择考古专业。此后半个多世纪，樊锦诗没有离开过考古，始终与敦煌洞窟在一起。

　　1962年，大学毕业前樊锦诗到甘肃敦煌实习。当时，进石洞工作要爬树枝做的“蜈蚣梯”，樊锦诗看着就害怕。那段时间，她几乎天天失眠，原本就体弱的她因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进石洞都走不动路。老师怕樊锦诗出事，让她提前离开了敦煌。然而，毕业时樊锦诗偏偏被“发配”到敦煌这片贫瘠的大漠。父亲担心女儿身体，写信请求学校重新分配。但樊锦诗决定服从分配，不管条件多苦也要去。她还暗下决心，这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绝不能中途折返。当时的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也对樊锦诗寄予厚望，叮嘱她去敦煌后要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樊锦诗说，来到敦煌是自投罗网，没想到却日久生情。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雕像让年轻的樊锦诗如痴如醉，第45窟的菩萨塑像精美绝伦，第112窟的伎乐天婀娜多姿……对樊锦诗来说，敦煌的洞窟就像成百上千双眼睛，每一双眼睛都写满沧桑和神秘。她说：也许，我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这座人类文化宝库的谜底。1967年，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结婚不久便两地分居，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虽然惦记家庭，但樊锦诗不舍得离开那些洞窟。直到彭金章追随樊锦诗来到敦煌，二人才结束长达19年的异地生活。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从业务岗转到管理岗，千头万绪，本该退休的樊锦诗只能边干边学。在任期间，不少人想把莫高窟变成“摇钱树”，樊锦诗对此非常愤怒并拿起了法律武器。在她的推动下，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也得以颁布实施。为了让千年壁画永续留存，樊锦诗带着团队为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活”下去。经过十多年努力，“数字敦煌”2016年正式上线，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数字展示中心也投入使用。

为守护敦煌文明奔走大半生，樊锦诗被亲切地称为“敦煌女儿”。

敦煌文物保护卓有成效，但樊锦诗却欠下了“一笔债”：在敦煌工作了近40年后，还没有完成一份有关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宿白先生甚至因此批评她不好好做学问。给敦煌数百个洞窟做全集记录性考古报告，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国际上也无先例可循。为了早日“还债”，樊锦诗带着团队迎难而上，查资料、深入思考、艰难探索。最终，《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正式出版。随后不久，第二卷的编纂工作也开始推进。回忆往事，樊锦诗说，老师们的叮嘱让她不忘自己作为石窟考古工作者的使命，使她下了不完成一卷敦煌石窟报告就不罢休的决心，也教会她一辈子无论做事、做学问，都要守一不移。

　　宕泉河畔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樊锦诗忘不了他们，正是他们在大漠戈壁筚路蓝缕，开创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基业，创立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成为一代代莫高窟人薪火相传的力量源泉。如今，樊锦诗也成了莫高窟人信念的守护者。多年前，一位很有研究才能的武汉大学博士来到敦煌研究院。几年后，他因为家庭萌生离开敦煌的念头，却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樊锦诗知道，有一处房产很重要，就主动把自己在兰州的房子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卖给他，“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

　　2020年高考，湖南女孩钟芳蓉选择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消息一出就遭到一些质疑，被认为“没钱途”。钟芳蓉回应时提到，选择考古专业是受樊锦诗先生影响。樊锦诗得知后，为钟芳蓉送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还写信鼓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

　　樊锦诗说：“中华文明五千年，其实不止五千年，那大家是怎么知道这些没有文字的历史的？就是要靠考古。是考古告诉人们历史，把未知的事情慢慢变成已知，这样的工作是需要人做的。”比如，《敦煌石窟全集》的规模大约将达到一百卷，只有一代代人不断接力才有望完成这一世纪工程。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樊锦诗就是真实历史的守护者之一。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中，樊锦诗深情表白：“敦煌是我的宿命”。她说，保护、研究和弘扬包括莫高窟在内的灿烂文明，任重而道远，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

# **中船重T载人深潜英雄群体：胸怀祖国 心向大海**

浩瀚海洋蕴藏着无尽宝藏。在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征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奋斗者，他们勇攀高峰、锐意攻关，他们无惧风险、百折不回，他们舍生忘死，以身许国。载人深潜英雄集体、中国船舶集团（原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抗灾抢险英雄群体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2020年11月10日，马里亚纳海沟，载有3名潜航员的“奋斗者”号成功坐底，下潜深度达10909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从“蛟龙”号，到“深海勇士”号，再到“奋斗者”号，向深海进军，中国起步虽晚，却迎头赶上。这背后是载人深潜团队无数日夜的接续奋斗，他们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

先后担任“蛟龙”号主任设计师和首席潜航员、“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奋斗者”号总设计师的叶聪，见证了我国载人深潜的每一次跨越。

2009年起，叶聪驾驶“蛟龙”号进行了数十次下潜。茫茫海面上，经历过潜水器与母船“失联”；5000米深海中，机械臂突然断裂造成油污泄漏让潜水器成了“睁眼瞎”；7000米的海底，大量沉积物覆盖采样篮让“蛟龙”号难以作业……面对一次次险情，他从未退缩，为中国潜航事业积累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与载人航天一样，载人深潜也秉持“一棒接着一棒跑”的传统，形成了一批领军科学家队伍。徐芑南、何春荣、胡震、杨申申、杨波……载人深潜事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伴随着他们大胆决策、锐意攻关、无惧风险的奋斗身影。

为完成“奋斗者”号的研制工作，我国组织近百家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开展攻关，近千名科研人员“没有单位、只有岗位”，为“奋斗者”号倾注了全部心血。钛合金载人球壳、固体浮力材料、操控系统、通信系统……一项项技术难题被攻克，“奋斗者”号部件的国产化率超过96.5%。

自2020年7月起，“奋斗者”号先后赴南海、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海域分阶段进行了海试验证，累计完成30次下潜，其中8次突破万米。

“参研参试人员克服了多个台风的阻挠，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考验。向世界最深处进军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叶聪说。

国有重器，以身护之。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守护重点试验平台，将生死置之度外，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生命壮歌。他们是“时代楷模”——中国船舶集团（原中船重工）第七六○研究所抗灾抢险英雄群体。

2018年8月20日，台风“温比亚”过境辽宁省大连市，受其影响，停靠在中国船舶集团（原中船重工）第七六○研究所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出现重大险情。危急关头，第七六○研究所原副所长黄群等17名同志，面对台风和巨浪，挺身而出、英勇无惧，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

监控摄像机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狂风怒吼，大海咆哮；10余米高的巨浪呼啸扑来，将10多个身影掀翻、湮没在白色浪花里，浪头一过，这些身影又顽强站起来；大浪猛袭下，码头上7吨重的铲车，被生生地横拍出两米！但是，没有人退缩。

“浪打在身上很疼，睁不开眼睛，那时候考虑不了个人安危，就想赶快过去，把平台控制住，把平台上的人保住。”当天参与抗灾抢险的孙逊说，“黄群副所长就是那样一个人，如果还有一次这种情况，他还会是同样的选择。”

一个大浪打来，正在作业的黄群和姜开斌被卷入海中；剩下的人和平台上的人一起营救，又一波大浪打来，又有人落水。各方紧急施援，4人先后被救起，而黄群、姜开斌和宋月才，壮烈牺牲。

勇士们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平台。

“只有奋斗的一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一生”“牢记使命，勇于担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英雄生前留下的手书催人泪下、感人奋起。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激励着无数人坚定理想信念，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之中。

# **“硬骨头连”：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硬骨头精神”**

在解放军的军史上有这样一个连队，它被称为“硬骨头六连”，甚至国家邮政局还专门发行了一套“硬骨头六连”的纪念邮票。而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的血与火中所锻造出来的“硬骨头”精神，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人。

解放军六连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抗日根据地，在成立之初就遭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日军正在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六连所在部队突破日军的包围圈后，准备东渡子牙河，当行进到一个叫马家营的村子时，与300多名日军遭遇。六连奉命占领马家营，掩护大部队渡河。六连在连长陈砚庭、指导员张会田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六连官兵利用残垣断壁节节抗击日军，与日军整整激战一日，先后击退了日军的5次进攻。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六连阵地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在最危急时刻指导员张会田带领战士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喊杀声，刺刀碰撞声，爆炸声不绝于耳，此战六连共毙伤日军60多人，成功的掩护了大部队安全渡过子牙河，而指导员张会田却英勇牺牲。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著名的爷台山战斗中，六连作为突击队与国民党胡宗南暂编59师所谓的“长胜连”针锋相对，在向敌人阵地发起冲锋时，一座敌人碉堡发射出密集的子弹封锁了部队前进道路，战士们被压制得抬不起头，一班副班长张殿山带领本班战士尹玉芬、孙正中、赵春霖勇猛地冲进了敌军阵地前沿，冲在最前面的孙正中英勇牺牲，张殿山利用手榴弹爆炸腾起的烟雾突然冲到敌人碉堡的射击死角，猛地伸出双手紧紧抓住了敌人滚烫发红的枪管，硬是把机枪从敌人的工事里给拽了出来。这时六连全体官兵趁势全部冲了上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士尹玉芬一人连续刺倒了几名敌人，最后还活捉了爷台山国民党最高指挥官、加强营营长黄日升。爷台山一战六连战士杀得国民党士兵魂飞魄散，在战后国民党不少俘虏心有余悸的说：“八路军的手榴弹和刺刀真的太厉害了！”

六连在解放战争中更是越战越勇，威震敌胆。1948年的宜川瓦子街战役中，六连更是打出了解放军的威风。据战史记载，“处在敌人拼死突围地段上的714团表现尤为突出，全团指战员与敌展开激战，团长、参谋长先后牺牲，政治委员负伤……但这丝毫不影响该团的战斗力，该团二营六连打得极为顽强，到最后全连打得仅剩下13位勇士！”该连在这次战斗中诞生了一名传奇英雄刘四虎，在战斗中作为班长的他身先士卒，带领全班冲锋在前，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他以寡敌众，一人就刺倒了七名敌人，但是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刘四虎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跌倒在了深沟里昏迷过去，这时后续大部队冲了上来才将刘四虎救起抬了下去，后来在救治中发现他全身已经负伤11处。为了占领敌人主阵地，六连连续发起冲锋，不幸的是连长赵贵荣，指导员郭志山相继牺牲，六连伤亡惨重，连队建制几次被打乱，到最后整个六连仅剩下6名手拿步枪的战士，加上炊事员、通信员等，一共有13个人，副连长胡开珍将全部战士重新编组成了一个班，他对战士们说，现在起我担任班长，就是全拼光，也要和敌人战斗到底。在最后发起总攻时首长没有派他们上去，但是六连这仅存的13名战士再三请求，最终还是加入到了冲锋的行列。这就是我们伟大的解放军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六连在战争年代所铸就出来的“硬骨头精神”支撑下，又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抗美援朝、战备执勤、老山轮战、抢险救灾等一系列重大任务，1964年，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解放军某部六连“硬骨头六连”荣誉称号。1985年，中央军委授予该连队“英雄硬六连”荣誉称号。党的十八大以来，六连官兵牢记强军目标，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发扬光大“硬骨头精神”，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被陆军评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表彰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如今的“硬骨头六连”，正带着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硬骨头精神”，以昂扬的斗志，在新时代的强军之路上拼搏奋斗。

硬骨头精神就是在任何困难面前绝不低头，敢于拼搏、勇于牺牲，直至夺取全面胜利，六连的这种硬骨头精神不仅战争年代需要，在和平时期同样需要。其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要代代传承下去。

# **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英雄群体：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有这样一群人，直面危险、迎难而上。他们有的推迟婚期，有的勇闯隔离区，有的上阵父子兵，有的母女相携请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一架架飞向湖北的飞机，一列列驶进武汉的列车，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最美逆行天使。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紧急行动，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医疗支援行动。调动全国医疗资源和力量，全力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医疗救治。自1月24日除夕至3月8日，全国共调集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19个省份以对口支援、以省包市的方式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16个地市，各省在发生疫情、防控救治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集中优质医疗资源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人民解放军派出4000多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承担火神山医院等3家医疗机构的医疗救治任务，空军出动运输机紧急运送医疗物资。各医疗队从接受指令到组建2小时内完成，24小时内抵达，并自带7天防护物资，抵达后迅速开展救治。大规模、强有力的医疗支援行动，有力保障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救治，极大缓解了重灾区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压力。

眼前的护目镜凝结着水汽，病房内用于制造“负压”的风扇嗡嗡作响，防护服、隔离衣、手套等让行动变动迟缓，医务人员为了交流清晰只能提高嗓音。“作为战士，我们进入了战场，战斗打响了！”

疫情初期，病毒感染者急剧增多，我国把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作为首要任务。抗疫一线医务人员慎终如始、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位患者，从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至100多岁的老人，不计代价抢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对伴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患者，一人一案、精准施策，只要有一丝希望绝不轻易放弃，创造出了一个个的生命奇迹。病房之外，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和30个省份的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疾控和公共卫生人员，与湖北的同志一道组成防控小分队，下沉街道社区，落实网格化防控措施，实现对所有小区（村）24小时封闭管理，筑起了阻断病毒传播的坚固长城。抗疫一线的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涌现出一大批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先进典型。

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6家医院组建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成为援鄂抗疫的重要力量，承担着艰巨复杂的危重症患者救治任务。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疗队挺进武汉金银潭医院，整建制接管一个独立病区，发挥了中医药在防控救治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辽宁、上海、广东支援雷神山医院医疗队上千名医务人员同病魔顽强搏斗，全力以赴救治患者；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先后转战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区，为患者带来生的希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共派出175名医务人员紧急驰援武汉，接管了7个危重症病区，挽救了数百名患者的生命；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队全力以赴，迅速提高流行病学调查速度和质量，为当地留下一支作风过硬的疾控队伍。

2020年9月23日，中宣部向全社会发布了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等10个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 **航天科技团队：同心共圆飞天梦**

离地390公里的轨道上，神舟十二号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交会对接，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36000公里，这个轨道高度上，北斗卫星遥看地球，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距离地球38万公里之遥，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分别在月球的正面和背面留下中国印迹，嫦娥五号更成功将1731克月壤带回地球，上演了“月宫取宝、月轨对接、太空投递”的壮举……

所谓壮举，皆因奋斗。成就的背后，离不开航天报国的“嫦娥”“神舟”“北斗”团队，他们自主创新、不断突破，在我国航天史上书写了一页页绚丽篇章。

**“嫦娥”团队：九天云外揽月回**

2020年12月17日凌晨，如同茫茫草原上的一颗流星，嫦娥五号划破天际，以百米冲刺的姿态回到地球，惊起一团烟云。作为21世纪人类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实施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一大步。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优异成绩，不超预算、不降指标、不拖时间，如期完成“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在月球探测领域向全世界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回首“嫦娥”团队所走过的艰难探索之路，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绕月探测的圆满成功，让中国人“到月宫一探究竟”的梦想有了成真的可能。

“我们飞向月球的大门一经打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说。一次次闯关夺隘，一场场拼搏会战，开拓进取的“嫦娥”团队，秉承着“以国家任务为己任”的誓言，以自主创新为团队成长的驱动力，又为嫦娥三号、嫦娥四号铺就了一条完美的落月之路，让“中国探月”的“金字招牌”闪耀在茫茫太空。

“一个人没有想象力、没有好奇心是没有动力的。”从力主嫦娥四号到月球背面去，到嫦娥五号获取最年轻的月壤，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人民科学家”叶培建院士始终认为，“要想得更远一点。”从嫦娥三号、玉兔号到嫦娥四号、玉兔二号，再到嫦娥五号，一个个中国探测器成功到访月球所勾勒描绘的，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逐梦足迹。

**“神舟”团队：托举千年飞天梦**

“心至苍穹外，目尽星河远。”这是中国航天人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此刻，举目仰望，3名中国航天员正遨游太空，中国逐梦空间站迈出新步伐。

2021年6月17日，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乘神舟十二号飞船成功飞天，成为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首批入驻人员，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从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到屈原《天问》、李白“举杯邀明月”的文学想象，自古以来，飞离地球、遨游太空就是中华民族的梦想之一。为了圆梦，一代代中华儿女在实践中探索着飞天之路。

当神舟十二号成功发射，卸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多年的戚发轫院士第一次有机会在现场看飞船发射，他的眼眶一度湿润了，但面对记者，他却退到一边，把接受采访的机会留给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年轻的女总设计师容易，还笑着说：“看见她，就容易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面对载人飞天的巨大挑战，谈何容易！“神舟”团队就是这样顶住压力，把困难变得容易，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几代“神舟”团队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像拧螺丝一样把自己拧在工作岗位上、拧在祖国的航天事业中，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着不平凡的人生理想，以实际行动兑现了“用成功报效祖国、用卓越铸就辉煌”的庄严承诺。

**“北斗”团队：中国北斗耀苍穹**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京举行，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26年间，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时代北斗精神。

“关键核心技术一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北斗”团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让中国北斗星耀苍穹。从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分步实施的战略决策，到中国特色北斗卫星导航体制的设计，再到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和500余种器部件国产化研制的突破，无不彰显着北斗团队创新的志气和追求。

“这是中国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大国重器的又一次胜利。”令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倍感自豪的是，“北斗已成为中国享誉世界的一张名片。”“我们的卫星除了上天之外，更需要‘落地’，需要跟经济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效益。一句话，航天最终要造福老百姓。”孙家栋说。

到2035年，中国将建成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进一步提升时空信息服务能力。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更优的性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